



第十二辑

韶
關
文
史
資
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韶关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印

韶 关 文 史 资 料

第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韶关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印

一九八八年八月

目 录

- 李汉魂主粤时期广东财政与经济建设……………秦庆钧（1）
- 路易·艾黎与韶关“工合”……………邓重行（19）
“工合”曲江事务所……………潘祖岳（28）
回忆曲江樟脑工业合作社……………殷杰（33）
- 解放前的韶关市场……………赖 灏（39）
抗战前后的曲江（韶关）工业……………梁观福（55）
韶关运输行……………陈业顺（71）
连县的会馆和商会……………周南杰（77）
曲江大桥的倡建与设计……………卞 知（84）
韶关商品的流向……………砚 农（88）
粤北名果南华李……………江作良（91）
抗战期间韶关的放衣业……………砚 农（93）
“大三元”的创业与经营……………刘荣忠（95）
解放前韶关市粮食商业概况……………蓝 江 杨枢华（97）
生活书店曲江支店生活琐忆……………毛 丰（100）
民国时期韶州货币流通概况……………金 戈（103）
日伪占领期的“储备券”……………梁宗奇（111）
旅居韶关外地人的职业情况……………谢昌寿（113）
- 三见张发奎将军……………饶纪寰（116）
儒将欧震……………欧 美原作 古 衡整理（119）

- 欧震关心家乡二三事……………钟 健 (123)
 著名水利专家麦蕴瑜……………文 箫 (125)
 沈秉强任新会县长的几件政绩……………何坤巽 (131)
 江子韶先生……………潘 达 (134)
 韶关富商陈公言……………陈顺业 文 蔚 (137)

- 七战区司令部生活漫记……………陈方绛 (146)
 乳源瑶族婚俗……………丘 玉 (152)
 粉乡掌故漫录……………嘉禾叟 (158)

纪念张九龄诞辰1310周年…………… (164)

张九龄年谱简编…………… (168)

张九龄《曲江集》选注……………李世亮 (174)

开凿大庾岭路序

请诛禄山疏

奏劾林甫

劾牛仙客疏

唐尚书右丞相中书令张公碑…………… (183)

梅岭张九龄祠……………庄礼味 (187)

韶关风度楼……………古 衡 (192)

· 参考资资 ·

广东龙洋…………… (27)

我国历代都城所在地…………… (90)

韶州的食井…………… (112)

韶州的鱼塘…………… (157)

李汉魂主粤时期广东财政与经济建设

秦庆钧

财政与税收

广东税源虽比邻省较为丰富，但历次革命费用的支出负担亦重，而且常因驻军就地筹饷而割断税源，故历年来都入不敷支，常藉借债、发行公债、库券以及滥发纸币以为平衡。平时如此，战时则更感困难。

日寇入侵，广州沦陷之后，滨海滨河各富裕之县多为敌伪所占据。而政府需要飞刍挽粟、救死扶伤，支用则更大。尤其是香港沦陷后，救济归侨，安置妇孺，需财尤亟。

李汉魂接任广东省府主席后，整饬吏治，起用财会人员，厘订税制，加之人民爱乡爱国，踊跃输将，故各项费用，不但应付裕如，而且工商企业之投资，凡六七千万元。至财政系统改制，撤消省级财政时，省库尚存现金二千二百多万元，拨作建设特种基金，打破我省历年年财政收入不敷出的纪录。现将主要情况概述如下：

一、抗战初期广东省财政概况

广东人素以爱国爱乡著称，每有公益事业，解囊输将，

毫无吝嗇。如1932年4月，为建筑广东沿海要塞，以巩固广东国防募集资金，发行“广东国防要塞公债”，旬日间，即募得680万元；1938年3月，又募集“广东省国防公债”，用以建筑要塞堡垒，巩固本省国防，亦即募足1500万元。但有防不守，不战而退，殊失广东人民的期望。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广州，广东八和粤剧协进会，即于当月22日在海珠戏院演剧，筹款劳军。该会将全部收入尽汇前方，用以慰劳二十九路军全体抗战将士。并通电慰勉。以后还多次义演劳军。如由体育委员会主办，也是在海珠戏院，由全市技击家登台表演精采节目，观众争先恐后，整个戏院挤塞，收入颇丰，这次演出收入也全数汇往前线劳军。

1937年12月，广东各界组织“募制寒衣慰劳前方将士委员会”，募得寒衣十多万件，转送前方。1938年8月，广州、香港同时举行了“抗日救亡献金运动”，广州在永汉北路（现北京路）盖搭一座献金台。人民登台献金十分踊跃，闻香港方面募得献金一百多万元；而广州方面募得献金多少，迄无公布。

1936年10月11日，日军自惠阳澳头地方登陆。20日，直捣增城，我军不战而退。21日，日军所谓机械化部队，不过三千多人，长驱直入广州，如入无人之境，广州遂告沦陷。

当年10月19日，广东省府主席吴铁城等撤至翁源，29日，又退至连县。广东财政厅长兼广州市长曾养甫则暗中在广东省库将一百万元拨入市库，并率同全部税警团撤至广宁。旋在广宁组织“西江八属游击总指挥部”，自任总指挥。

当广东省政府撤退时，在财政上却毫无准备，只得沿途滥发库券，并截收关税及其他国税。11月9日，财政部电广东省政府，请严令各地驻军保护国税机关，不得强占或接收关税机关及攫取国税税收，情况才略有好转。

二、财务人员的整饬

1939年，广东省政府撤至韶关并进行改组，李汉魂担任省府主席。他上任后，深感财政对抗战之重要，提出“除弊重于兴利，实干重于理论”的原则，以建立广东战时财政。他首先整饬人事，废除厅款，严惩贪污；然后调整机构，改革税制；最后加强缉私，对敌伪政权实行反封锁。

广东省政府改组后，首任财政厅长为顾翊群，顾以中央后台力量大，看不起省政府，尤其是重用科长李云良，其自以为是，铺张浪费，以副厅长自居。主任秘书桂竞秋，亦老气横秋，每逢会议都姗姗来迟。李主席曾当场对之申斥过数次。当曲江县试行新县制时，财政厅竟不顾法令，死死握住县财政和税收，不肯下放。李汉魂忍无可忍，乃向重庆国民党中央申请，于民国29年（1940年）8月27日将顾翊群调走，由邹琳接任广东财政厅长。

邹厅长接长财厅后，首先在财政厅增设“整理财务委员会”，聘请社会上有财政税务专长的人士为委员，协商整理和改革税务。同时，分配各委员到各科室工作，使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对于财政厅及其所属各机构的干部职员，则一方面甄审有学识和经验的人员，一方面招考社会上的优秀青年，以讲习方式，施以短期训练，考查合格者，然后任用。此项训练班，曾经办过八次，简列如下（见第4页）表：

抗战时期广东省财务人员训练及任用表

时 间	名 称	人 数	受训时间	受训人员 来 源	任用情况
民国二十八年 (1939) 二月	连 县 财 务 班	19	两周	在连县的 集训学生	派任财政厅办 事员
民国二十八年 五月	曲 江 马 坝 税 务 讲 习 班	135	十天	前中央军校 广四分校财 州特别系学 员	派任各税务局 职员
民国二十八年 十月	南雄县人 员训练所	161	三个月	前曾担任财 机年关以上 职员	派充各税务局 征收所及稽 长
民国二十九年 (1940) 三月	曲 江 马 坝 税 务 讲 习 班	136	一个月	各方介绍 的政行员少 数	派任各税务局 会计所及稽 查员
民国二十九年 四月	南雄本省 干训团	73	三个月	依章招考 录取人	派充各税务局 及各县捐处 员
民国二十九年 六月	马 坝 税 务 讲 习 班	67	一个月	中 央 警 官 学 校 选 送	派任各县查 缉所及查缉 员
民国二十九年 十二月	曲江桂头 干训团	10	两个月	三青团受训 结业学员	派任财政厅职 员
民国三十年 (1941) 九月	曲江马坝 财务人员 讲习班	89	两星期	各大学经济 大会系毕业 生及各方人 员	派任各税务局 局长、课所 稽征所副科 长、各所副科 长等

三、税收财务机构的调整及设置

广东沿海沿河富裕之县，当时多已沦陷，我财政当局利用人民爱国的情，在沦陷区与敌伪争夺税收。广东省海岸线绵长，所有进出口货物运输线，均趋向沿海一带及接近游击战区。针对这种形势，即沿海及接近游击战区的地域，密布税收征收网。

当时的税收机关谓之“税务局”，局之下均设“稽征所”。税务局分特等及一、二、三共四等；每等分三级。二等级以上的税务局，均设秘书以及总务、税务两课和会计室。三等局只设税务课和会计室。各局设局长一人，各课设课长一人，会计室设会计主任一人；其下设置税务员、会计员、办事员、佐理员，其人数按照编制办理。稽征所则按照其等级和编制，设置所长一人，税务员及佐理会计员若干人。

据1941年间的统计，全省有税务局61间，稽征所91间，遍布全省。

为了扩大税源，我方税收人员以无畏的精神，深入沦陷区与敌伪争夺税收。倘敌伪军队到来，我方税收人员则就近转移。然而人民爱国热情高，仍然向我方纳税。例如淡水稽征所原设在淡水墟，淡水沦陷之后，该所即转移到镇龙。潮阳税局原设于潮阳县城内，伪军进攻潮阳时，税局即转移到陈店，仍继续稽征。

关于舶来物资，东南方面多由香港运入，我方在宝安县设置税局，并在香港设办事处。直至香港沦陷，以上机构仍暗中设置不变。西南方面，则大宗的由广州湾（现湛江市）输入。当时的广州湾是法国属地，乌烟瘴气，为走私漏税之

藪。但其運入內地的物資，必須通過寸金橋。我方即在寸金橋中方橋頭設置遂溪稅務局，並在毗連廣州灣之麻章墟及大埠設置稽征所。縱觀在抗戰時期的本省稅收，便以寶安和遂溪兩稅局為大宗。

為了嚴格劃分“稅收行政”和“現金出納”系統，使之互相牽制以杜絕流弊，於是，創造條件，厲行公廉法。乃採取“存款制”，以省銀行為代理機關。至於沒有設立分支行之地，則由當地郵政局代理。如果稅收機關距離所在地遙遠，則由公庫派員駐局收款。

四、租稅的戰時化

自廣州和富裕的縣相繼淪陷後，廣東的稅收一落千丈。省政府針對這一情況，首先物色、甄審、培訓有膽識的財務稅收人員；然後建立起遍布全省的稅收和公庫網，深入淪陷區和游擊區與敵偽爭奪稅收。因此，必須將繁雜的租稅，使之簡便化、統一化，以適應於戰時的需要。茲舉其荦荦大者如下：

（1）營業稅

本省以往的營業稅率，分類既多，等級亦過於細碎。為此，自二十九年（1940年）起，將等級歸并，調整稅率。其次以營業額課稅，稅率由千分之五至千分之十。其以資本額課稅者，亦由千分之五至千分之十五。後來，重慶國民黨中央頒發修正營業稅法，廣東省即遵照執行，不分行業，其以營業額為課稅標準者，一律按月征收百分之一；其以資本額為課稅標準者，一律按月征收百分之三。

至于征收方法亦彻底进行改革。废除以前由商业团体包征或由商业团体估定的方式。实行查账计征，严密复核，应纳税额由税务局核定。所纳税款，则由纳税人直接缴交公库，以防止弊端。

普通营业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度）半年实收一百一十多万元；二十八年（1939年）全年只收得九十多万元；二十九年（1940年）度收得二百四十多万元；三十年（1941年）度收得约三百万元。

至于特种营业税，如从前独立的典商营业税，亦已归并于普通营业税征收。

煤油贩卖营业税，征收的原意是用以保护新生的但基础又较薄弱的土制煤油业，凡是进口贩卖的煤油、汽油、柴油，均在课征之列。其后奉重庆方面令，放宽汽油、柴油入口，一律免税，故只有征收煤油一项。二十七年（1938年）半年征得三十五万元；二十八年（1939年）度征得二百五十万元；二十九年（1940年）度征得四百二十万元；三十年度未详。这项税收，为抗战时期收入较大宗的。

（2）临时地税

我省钱粮制度向系操之胥吏之手，积弊甚深。乃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间举行了田亩调查，评定地价，废除钱粮制度，改征临时地税。查定全省税地面积为3122.1万亩，评定地价为139,329万元。按照地价值百课一，估计应征税额1393.29万元。比诸原征钱粮额的829.7万余元，计溢出税额567.35万余元。至征得的税额，规定以五成解省抵补原有的钱粮，五成留县抵原有随粮附加。

历年实收金额如下（单位：千元）：

民国二十四年度（1935年7月至1936年6月）9，195

民国二十五年度（1936年7月至1937年6月）11,856

民国二十六年度（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9,854

民国二十七年度（1938年7月至12月）4，550

民国二十八年度（1939年1月至12月）3，034

民国二十九年度（1940年1月至12月）9，052

及至三十年（1941年），各属地价高涨，原评地价已不适合实际，为适应财政需要起见，乃按照各县原评地价，一律增加一倍征收。本年1至7月实收818.4万元；8月份起田赋改征实物，遂无“临时地税”收入科目矣。

（3）流动商人营业税

在抗战时期，商业经营变迁靡常，有不少不设店号随时随地播迁的摊档。民国二十五年初，各税局亦就各摊档稽征营业税，收入虽不大，亦体现了战时财政政策。

（4）桐油管理费

抗战时期，桐油颇感重要。本省的海岸线长，桐油的走私之风甚烈。为了协助做好统制运销，严防桐油走私资敌，特制定战时管理桐油运销章程，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2月1日起施行。

对省内运销的桐油，凡由省外运入者，于进口之后，分别不同情况作不同处理。在本省生产者，应于装置成件时，填具报单向当地税务局报验，缴纳管理费（每件在36公斤以下，纳费2元），领取省内运照，并在各件桐油上逐一贴检验票，这样，方可运行。其运往禁运区域者，非有财政部特许证者乃不得运行。自实施管理以来，桐油的走私之风稍

载，且省库所收的管理金，年约有150万元之多。

(5) 卷烟管理费

广东人吸食卷烟至为利害，虽然是战时，外国产卷烟（如英美烟草公司的三炮台独占鳌头）的输入亦在两千万元以上，实为我省一大漏洞。针对这一情况，广东省府及时制订“广东省战时管理卷烟运销章程”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6月1日施行。

其管理及稽征手续是：凡外国卷烟的运入，必须贮存于管理卷烟机关指定的仓库里，以便稽证。管理费的征收照原价的百分之三十五收取。其通过本省而运销到外省者，所征收的管理费照其价百分之二十收取。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收入为189.5万元；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为768.2万元；民国三十年（1941年），1至3月收入276.7万元。平均每月收入达九十多万元。以后各月的收入有多无少，为战时财政一大支柱。

(6) 舶来物产专税

广东地濒滨海，为物资的吞吐港口。外地物资输入广东，或经广东而输往内地者为数甚巨。广东省最先开征黄豆、花生入口税，名为“舶来农产品杂项专税”，其实黄豆、花生都是产自我国山东，并非外国之舶来品也。以后继续开征“洋纸专税”、“匹头专税”、“蜡类专税”和“颜料专税”等等。国民党中央曾以这些税都是重复税之理由，令飭撤消。但广东方面则以舶来物产倾销，给广东经济带来很大打击。为了保护农村经济，扶助新兴工业为理由，继续征收。

此项专税的收入颇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实收入为676万元。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下半年为283万元。

到了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乃将进口物产分类，重订税率，统一征收，于是年6月重新颁发“舶来物产专税战时税则”，分为下列12类：

1. 舶来农产品；
2. 舶来木材木料；
3. 化妆装饰用品及玩具；
4. 舶来磁器、玻璃及金属制品；
5. 胶类制品；
6. 颜料；
7. 洋纸；
8. 洋布匹头；
9. 糖类；
10. 皮革；
11. 京果海味；
12. 洋腊。

在抗战时期，内地各省都来香港或沦陷地区抢购物资，其运输必定要经过广州地区，因此，舶来物产专税的收入突增。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收入为684万元；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收入为2500多万元；民国三十年（1941年），增至5600万元。故舶来物产专税成为广东抗战时期财政的主要支柱。

五、改革缉私，加强考核

广东为华南重地，海岸线漫长，港湾河叉纷歧，是私梟

出没之地。此外，时有日本、越南等外国浪人混迹其间，更趋复杂。故财政特派员公署（稍后改隶财政厅）设有“广东省水陆缉私总处”，并配有税警团三个团以及巡查电船数十艘，以为查缉，这是必要的。无奈任用非人，尾大不掉，缉私队变成走私队，税警团变成敲诈勒索团，为世人诟病久矣。

抗战军兴，私枭更形猖獗。一方面走私漏税。运入仇货；一方面偷运违禁物品，出口资敌。李汉魂主席乃下大决心，彻底整理缉政。于民国三十九年（1940年）一月颁发“广东缉私处组织规程”，成立“广东省财政厅缉私处”，其下分设“查缉专员办事处”6所，“查缉所”45所，“查缉哨”25所，“查缉组”一组，于是，缉私网遍布全省各地，私枭为之敛迹。

税警总团系缉私的武装机关，亦隶属于财政厅，负责训练团员，整饬风纪。但其办理缉私事务时，则要受缉私处的指挥调遣，通力合作。

当时，本省经济作战的重点工作是“反封锁”。东起饶平之柘林，沿海岸线及距敌三十华里之军事包围线，迤迤而南，直达防城东兴。除规定之货运通行线外，均严密封锁。其执行方式，系参照国民党中央之规定，组织联合检查所。制订了“广东省对敌经济封锁线出入总口联合检查所组织暂行办法”，呈奉战区核准施行。货运经此一次检查，即可通行无阻。所有缉私员警均与担任封锁的驻军部队加强联络，分工合作。驻军部队担任警戒，缉私员警担任货物检查，权责分明。这样，使缉私工作颇见成效。每月缉获私货不下二三十万元。所缉货物以卷烟、桐油、煤油、电油、布匹为多。

税务、公库、缉私等机关既然密布全省，就不能不严加督导和考核。自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二月起，分区设立“税务督察”，全省分为东、西、南、北、中和琼崖共六区，每区设专员一人，担任所辖县境征收机构的调整。税务人员的考核，财务政令的宣传，稽征方法的改良，缉私案件的纠察等等，办理以来，颇著成效。直至同年10月，改设“轮回稽核员”，派赴各县轮回稽核。这些稽核员，除稽核各县账务，督促税款报解外，实际重要的任务是：对贪污人员的检举，税款留挪的防杜，尤其是查察税务人员的操守，以贯彻“除弊重于兴利”的主张。

六、抗战三年来收支概算决算

兹将抗战时期自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至民国三十年（1941年）广东省财政岁入岁出预算决算列下，以供参考。

抗战时期广东省财政岁入预决算表

单位：千元

年 别	民国二十八年 (1939)		民国二十九年 (1940)		民国三十年 (1941)	
	预 算	决 算	预 算	决 算	预 算	决 算
课税收入	16,295	16,878	18,331	40,179	89,412	100,307
管理规费	2,537	1,678	5,550	9,990	8,044	13,398
公营事业盈余	500	374	6,680	4,819	7,667	5,150
补助协助收入	1,905	1,481	3,390	3,705	12,031	17,369
借款收入	5,620	5,460	19,097	5,500	962	151
其他收入	566	1,675	1,110	851	34,062	28,796
合 计	27,423	27,546	54,158	65,044	152,178	165,171

抗战时期广东省财政岁出预决算表

单位：千元

年 别 科 目	民国二十八年 (1939)		民国二十九年 (1940)		民国三十年 (1941)	
	预 算	决 算	预 算	决 算	预 算	决 算
各机关经费	3,322	2,708	6,080	5,285	11,527	11,527
教育文化费	1,609	1,747	2,943	2,669	9,256	9,256
卫生保健费	1,487	1,130	2,626	2,513	4,263	4,263
经济建设费	1,650	4,243	4,607	4,748	41,693	41,693
财 务 费	1,177	1,099	3,551	4,975	5,283	5,283
协助补助支出	7,091	4,638	8,360	7,789	10,424	10,424
保安经费	5,719	5,670	9,885	9,219	22,721	22,721
营业投资支出	—	—	1,240	1,107	16,911	16,923
债务支出	2,400	3,375	6,606	6,612	19,636	48,636
其他支出	2,968	3,145	8,260	9,161	10,464	10,514
合 计	27,423	27,755	54,158	54,078	152,178	151,2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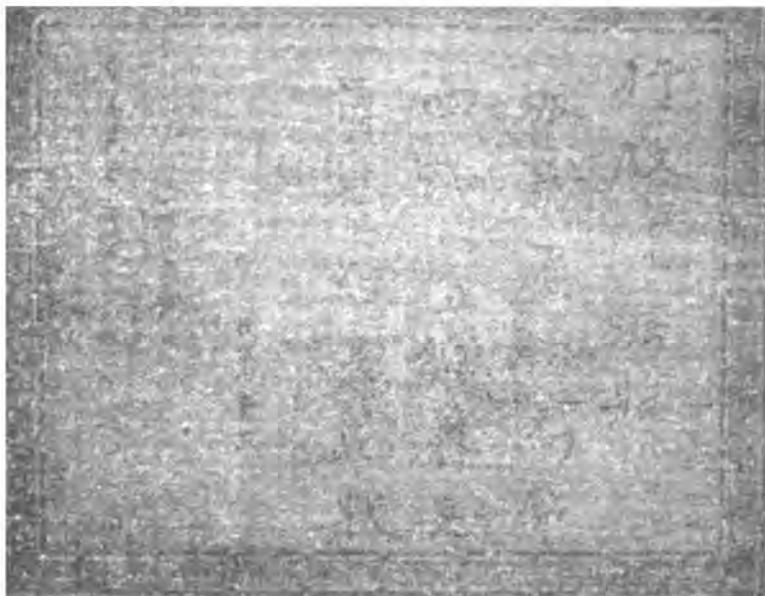
广东经济建设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广东全省已处于分崩离析之势。李汉魂将军于此时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他日夕忙于与敌伪作斗争，但仍不忘广东的经济建设。

李汉魂将军就任广东省府主席时，发表了《告民众书》，即强调指出：“……现在积极从事于生产之奖励、水利的讲求，以及整理交通而利商运，提倡合作以救困穷；更利用灾区难民授田垦殖，转移都市资本开发农村，庶见乡村

经济得以逐步兴盛，人民生活得以日就改良。”

笔者长期追随李汉魂主席工作，历任广东省政府建设厅和财政厅会计主任、平远县长和省府参议等职务，并曾兼任第四战区经济委员会委员和组长，故对于当年经济建设的情况，略有所知。现将亲身所历、所见、所闻，如实忆述出来，以供参考。



这是当年秦庆钧的派状

一、整饬吏治，增加财政收入

经济建设与吏治、财政等息息相关，不能孤立地进行。

因此，李汉魂主席就职后，即颁布《公务员五守约》：1. 不得营私舞弊贪赃枉法；2. 不得庇纵烟赌；3. 不得擅加人民负担；4. 不得玩弄功令；5. 不得擅离职守。并申明，违此五条者，定当依法严惩。

整饬吏治，李汉魂还认为，首先要铲除官僚习气，否则政治实无希望。对于职员之不遵守办公时间、精神不振和不遵守法纪的，一律严加申戒，以造成整肃良好的政治风气。当时，财政厅主任秘书杜竞秋，老气横秋，架傲不恭，有次开省务会议时，桂迟到，被李汉魂当场申斥。

广州沦陷之后，税收锐减，使广东省的财政收入更加不敷支出。李汉魂就任省主席后，首先着重铲除贪污，废除厅款、涓滴归公。更加改良税制，加强税收机构，培训财务人员，深入敌后而至港、广州湾等地，与敌伪争取税收。由是税收蒸蒸日上，除供员各项行政和保安费用外，还有财力以作经济建设投资。自1939—1941年财政改制的三年间，投资于经济建设的总额达六、七千万元。结财时省库还结存现金二千二百多万元，划为特种基金，作为省库没有收入时，用作经济建设。

二、物色人材，开办实业

李对经济建设人材很重视，常留心物色，除在曲江的陈济棠时代办理省营工业的专家全部起用外，并向四处招聘。例如纺织厂、麻织厂的技师和熟练工人多聘自上海；制糖厂及酒精厂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则向沦陷地区搜聘；机械厂、农机厂的技术人员则由香港聘回。

至于机器及设备的搜求购买，尤为困难。首先搜罗粤北

各地所存的旧机器设备，修修补补应用；其后逐渐通过沦陷区向香港抢购，东罗西搜煞费苦心。设立工厂，在战时殊不象在平时想象的容易。

广东战时经济建设以实业公司为枢纽。该公司于1940年初设立于韶关市内，资本二千万元，由陆冠莹任总经理。陆氏年富力强，指挥得宜。横向与湖南、江西和本省兴宁等贸易机构切实联系。将剩余的土产物资推销于沦陷区和香港；然后抢购回需要的物资，运至筠门岭而转售于江西的寻邬和福建的武平等地。同时购备了大批车辆和运输工具，搞好交通，使货畅其流，把粤北的经济搞得活活泼泼。

三、设立农林局，发展粮食生产

广东是一个缺粮的省份，平时靠购进安南（越南）和暹罗（泰国）的米来救济，战时洋米来源断绝，第四战区存粮委员会虽曾与湖南、江西等省订有益粮交换协定，但外省来米总不多，东江和四邑一带，常发生粮荒现象，不得不自力更生，作出决定：1. 大搞农田水利，2. 改良稻种，3. 推广冬耕，4. 广种杂粮。

为了做好农林事业，首先要加强其行政管理机构。在广东省建设厅下设农林局，由刘荣基任局长，聘请大学农科教授七、八人为技正、技士，并有富于农业经验者十多二十人任视察员，随时深入基层督导工作。并在农林局设立稻作改进所，聘请中山大学著名稻作教授丁颖为所长。

据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统计：在安全区内已测定的耕地面积有344,000多亩；经详细勘定的耕地面积有303,700多亩。

由农林局直接办理的农田水利工程有三宗，受益田亩31,000多亩；人民办理的农田水利工程四宗，受益田亩136,000多亩。并在各县推行“一保一塘”运动，全省各县共开发4,914口水塘，受益田亩784,086亩。

是年一年中，粤北曲江、乐昌等17个县推广优良稻种面积共1,339,200余亩，增产稻谷825,400余担。全省冬耕面积18,349,000余亩。推广种植木薯达一百多万亩。

四、开办工厂，推广合作运动

为适应通讯的需要，李汉魂就职后不久，先在南雄开办一间电池厂，规模虽不甚大，但对当时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后，因地制宜，在产蔗的地区分别设立糖厂和酒精厂。又因外来面粉不多，乃在乐昌设立一间较大规模的面粉厂，生产面粉，解决了居民和饮食店制造糕饼点心的需要。不久，相继设立机械修理厂、纺织厂、麻织厂、农具厂等等。在抗战时期，广东工厂之多，甲于邻省。

为了解决农村市镇资金之不足，抗战时期，全国推行合作运动，本省即在建设厅属下设立“合作事业管理处”，由谢哲声任处长，派出督察和技术人员往各农村市镇督促和指导办理。截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底止，全省各县成立各种合作社共计1,677间，社员149,176人，股本18,924,853元，盈利积累达140多万元。

当时国民政府为鼓励合作事业的发展，历年举行“全国合作事业工作竞赛”。我在平远任县长时曾创办供销合作社，在第三届比赛中，亦得到社会部的奖状。



这是秦庆钧所获的奖状

【作者简介】秦庆钧，番禺人，现年八十六岁。抗日战争时期，任广东省政府财厅、建厅会计主任、平远县县长。解放后，任广州市黄浦区第五届政协副主席。现已退休。

路易·艾黎与韶关“工合”

邓 重 行

新西兰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人民敬爱的朋友路易·艾黎，于1987年12月2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12月30



日，我国中央领导人和中外各界人士，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北京医院，向一生把全部心血奉献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告别。赵紫阳总书记在给艾黎治丧办公室的唁电中说：

“艾黎同志是新西兰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六十年如一日，同情和支持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并为之作出了宝贵贡献，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敬和

1986年夏的路易·艾黎在南戴河

爱戴。他的崇高品德和国际主义精神，将激励我们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发展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友谊而奋斗不懈。”

在伟大而艰苦的抗日战争期间，我在韶关曾与艾黎有过多次接触，亲身看到当时艾黎对广东“工合”的极大关心和帮助，对我国抗日战争的有力支持，使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现在根据记忆所及，将当时的经过情况叙述如下。

(一)

1940年2月，有一天，中共粤北省委宣传部长到樟脑合作社找我，通知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将从重庆来韶关视察“工合”工作，要我组织队伍去车站迎接，并要我同他密切联系，以利今后工作的开展。当时，我在韶关搞合作社工作兼负责《新华南》杂志的发行工作，觉得这样的事不是通过领导合作社业务的“工会”事务所来通知，而是通过组织的渠道来通知，深感到事情的重要性。

我按照中共党的指示，与陆飞、刘润、邓子华（邓球）等人，组织起有三四十位“工合”同仁参加的队伍，高举横幅，手持标语，浩浩荡荡地前往火车站，欢迎艾黎的到来。当我们到达车站时，与十多天前从赣州来到韶关筹建曲江县“工合”事务所的几位同志会合，一起走进月台等候。

火车徐徐开进韶关站，在月台边停下来。这时，从车厢里走出一个高高瘦瘦的外国人，大约四十多岁，背上挂着背包，左手提着一架小型英文打字机，右手挽着一个行李袋，脸带笑容，操着一口流利的国语（普通话），来到欢迎队伍的前面。“工合”事务所主任叶荣健向我们介绍说：“这位就是艾黎先生。”他笑容可掬，和蔼可亲地同我们一一握手。

当天晚上，“工合”事务所在市内风度中路平治巷举行欢迎晚会。会上，艾黎用流畅的中国话向我们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鼓励我们积极工作，支援抗战。并介绍同他一起从重庆来的东南区“工合”事务所主任黄毓麟与我们见面，说黄先生是台山亚伯（广东台山县人），在美国担任高级工程师。他响应国家号召，满腔热情地返回祖国，投身于发展工业生产，以支援抗战，对他不计报酬，自愿来“工合”工作大加称赞。

第二天，我陪艾黎等人参观樟脑、印刷两个合作社。

樟脑、印刷合作社是在1939年秋开始筹建的。当时，中共广东省委在韶关创办了一个省委宣传刊物《新华南》杂志，石辟澜负责主编，我担任经理。《新华南》杂志因受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和破坏，印刷十分困难，伤尽脑筋仍难以解决。正在这时，一位从赣州来韶关筹建工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工合”）的苏俊，持有介绍信找石辟澜，说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为了支持我国抗战，募集大批资金，发展工业生产，设立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各地设立“工合”事务所，新西兰友人艾黎和美国记者斯诺都是创办人之一，要我们在韶关把合作社搞起来。《新华南》杂志正急需解决印刷问题，于是由石辟澜、苏俊和我三人通力合作，共同协商，把筹建印刷、樟脑、机器三间合作社的工作确定下来。此事得到中共省委的批准和支持，及时调来一批干部，指定我负责筹建印刷社，陈振德、邓子华负责筹建樟脑社，机器工人钱树标负责筹建机器社。这三间合作社是韶关最早兴办的合作社，较之曲江“工合”事务所的建立还要早半年。印刷、樟脑两个合作社在建立初期，由中共曲江中心县委领导。由于两社办得有一定成绩，到了1940年秋，樟脑社改由

中共粤北省委秘书长严重负责领导，印刷社则由中共粤北（后北）特委书记李守纯（守信）负责领导。

樟脑社建立后，曾三次派专人到沦陷区将广州沦陷后才停产的天真药学社的原有制造樟脑薄荷的机器设备及技术工人较完整地转移到韶关来，重新组建了樟脑社。该社很快租赁到民房，正式投产。该社的主要产品有两个，樟脑饼和薄荷脑，均是军需、医药和工业的原料，价值很高，销量很好，获利不少。艾黎在参观时，认真地观看了这些产品和生产的流程后，大为赞赏，并对该厂能在山城制造出如此精美的产品，感到极大的兴趣，夸奖该厂创业精神确是难得。

印刷社正在紧张地筹办，做投产前的准备工作。我陪艾黎同志在新建的厂房里看了一下，由于还没有生产，故转了一圈便离开了。

当天晚上，“工合”曲江事务所召开座谈会。会上，我向艾黎汇报了印刷、樟脑两个合作社的筹建经过，汇报了1939年底因日寇进犯粤北，两社雇用四艘民船将全部机器设备疏散到南雄县，一个月后又迁回韶关，遭受不少损失等情况，提出要增加印刷社的贷款，才能投产。艾黎听取汇报后，答应给予支持，认为印刷社的规模可以扩大一些，樟脑社的产品很好，要尽量把生产搞上去。

次日早晨，我们到车站送艾黎乘车去南雄时，事务所主任叶荣健告诉我，艾黎同意批准再增加印刷、樟脑两个合作社的贷款各三万元。这样，连同第一次贷款合起来，印刷社共得贷款六万元，樟脑社共得贷款四万元。之后，两社尚有多次贷款，大大地解决了两社经济的困难。这样巨额的贷款，超出了我们的意料，对两个合作社实在是个巨大的帮助，充分体现了艾黎对我国发展战时工业生产的热心和帮助，无疑

是对我国抗战的大力支持。

1940年五六月间，艾黎从赣州返回重庆时途经韶关，再次视察韶关合作社的工作。这时，印刷合作社已经建立起来了，投产三个多月，有职工五十多人，初具规模，成为一间专门承印书报杂志刊物的印刷工厂。由于“工合”组织有一套较好的规章制度，大大地提高了工人当家作主的精神，充分发挥了工人们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把印刷社办得有声有色。印刷社工厂的建筑面积有三百多平方米，厂址原是一块晒布场，系荒芜之地。印刷社就在这块荒地上盖起杉木结构的厂房，美观大方。厂的东边是一片竹林，西边搞了一个篮球场，南边又搞了一个足球场，这些都是职工们利用业余时间辛勤劳动建设起来的。厂址定名为台儿庄一号，这是在庆祝台儿庄大捷时，为了表达我们发展战时工业生产以支持抗战和坚定抗战一定胜利的决心，而定下来的。

艾黎这次详细地参观了各个车间，绕着厂房走了圈，然后来到设在篮球场上的欢迎茶会上坐下来。在这个茶会的桌子上，陈列了印刷社几个月来生产的产品，有中共广东省委在韶关发行的宣传刊物《新华南》半月刊，有十多份进步刊物如《抗先通讯》、《广东青年》、《新军》、《新建设》、《国际反侵略》、《中苏友好》等，艾黎都一一翻阅，频频点头称赞。欢迎茶会上，艾黎还作了简短的讲话，赞扬这间工厂仅仅用了几个月时间就顺利投入生产，印刷了这样多的刊物，工作做得很好，十分难得，表示很满意。

（二）

艾黎处理事情认真细致，一丝不苟，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很快给予答复或解决。他在视察合作社时，认真听取我

们的汇报，一一记录起来。他随身带着一架小小的打字机，寸步不离，不论在候车候船，饭前饭后，白天黑夜，一有空闲就把打字机开动起来，把当天接触到的人和事，或是在笔记本记录下来的东西，整理成系统的资料。对各种问题能在当天解决的就马上解决，一时不能解决的，则将资料和问题储存起来，待条件成熟时再行一个一个地解决。当我们提出合作社的资金不够，难以发展时，他经过一晚的考虑研究，第二天就批准增加贷款，解决了我们的难题。他处理问题深入细致，无论事情大小都亲力亲为，绝不马虎。艾黎这种处理事情的态度和作风，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艾黎待人和蔼可亲，爱护工人，对工人的生活 and 身体健康十分关心。记得他在第一次参观樟脑社时，见到一个青年工人身体很虚弱，脸色黄黄的，面部有些浮肿，他便记在本子上。到第二次来参观时，立即走到这个工人身边，从口袋里取出一瓶白色的司各脱鱼肝油，送给这个工人，叮嘱他每天服食。1941年至1942年，艾黎又多次来韶关视察合作社的工作，每次都带一瓶鱼肝油给这个工人。艾黎这种无微不至关怀爱护工人的精神，不仅使这个工人极大地感动，也使合作社的工人都受到极大地感动和鼓舞。这个青年工人名叫邓权，是刚从沦陷区出来的，到社工作不久，因营养不良身体较为虚弱。抗战期间他一直在樟脑社工作，后来参加革命战争，是珠江纵队南三支队的队员，转战粤北，抗战胜利后北撤，参加两广纵队。解放战争时期随军南下，在广东地方工作，现已离休。据说，艾黎在我国工作期间，亲自收养了不少孤儿，八十年代曾任广东省外经委副主任的黎雪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艾黎对工人的身体健康极为关心，时时提醒工人要注意清洁，防止职业病。他在欢迎大会上讲了一个生动的故事。说他在上海工作时曾与不少印刷工人做朋友，知道印刷工人整天同铅字粒打交道，铅是个有毒素的东西，有些印刷工人因而染上职业病。防止这一职业病发生，一定要注意卫生，吃饭前要先洗手，以免病从口入，当时有一个印刷工人名叫刘润的，听了艾黎的话后，牢牢地记在心里，常把艾黎的话当作口头禅，天天唱“艾黎同志教导我们要洗手食饭。”从韶关印刷工业合作社唱到香港印刷工业合作社，一直唱了好多年。刘润后来参加解放战争，在粤赣湘边纵当游击队员，现已离休。

（三）

自艾黎视察韶关“工合”之后，有力地推动了广东各县“工合”的发展，许多县纷纷建立起“工合”。如南雄、始兴、乐昌、和平、连平、河源、梅县、兴宁等县的“工合”，就是在这个时期先后建立起来的。领导“工合”的事务所也在各县建立起来。曲江县的“工合”发展尤为突出，先后建立了二十多个合作社。1940年在犁市兴办的榨油合作社，就是得到曲江事务所贷款五万元建立起来的。在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下，该社成为中共党的革命活动筹措经费的重点单位。

特别是韶关的“工合”，在艾黎视察之后，得到他的大力支持帮助，发展壮大尤为迅速，积累起不少资金，并以此为基础，大大地扩展业务，在粤北各地设立工厂、商店，为中共党的地下革命活动建立据点，筹措资金起了显著的作用。

1941年冬，我担任中共粤北特委（前北特委驻清远县城）财经特派员时，由于特委系新建机构，除了仅有一间作

交通联络用的车衣店外，其余一无所有。既无物资，也无经济基础，活动资金十分困难。据点既少，活动也较困难，且很不方便。如何去开设一些商店，兴办一些工厂，作为活动据点，成为当时的重要任务。设商店办工厂，首先要解决资金。于是我向特委建议，并经批准，去韶关找点本钱，以利工作的开展。我到韶关后，以樟脑社为据点，利用该社的招牌和银行存款，派人到江西省农村采购大量樟脑、薄荷原料，运回来加工，制造樟脑饼和薄荷脑，掌握市场对这些东西货缺价高的特点，赶制大量成品，推向市场，获取优厚利润。仅仅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赚取利润十多万元。该款经特委书记黄松坚与中共广东省委商量，拨出四万五千元给特委，作为建立经济据点之用。

资金解决了，随即在特委所在地的清远县筹建工厂和商店，经特委研究决定，一是在清远县城上廓开设一间茂昌隆族店，作为特委与所属各县联系的地点；二是创办一间日产十篓火柴，稍具规模的中国火柴厂，赚点钱维持特委机关的日常开支；三是开设清远粉笔厂，为中共地下党同志进行革命活动作掩护；四是利用群众关系，与群众合作，在文洞开设一间纸伞竹骨加工厂，作为开拓与沦陷区广州市进行贸易的据点。这样，利用韶关“工合”的资金，在粤北特委所在地的清远县，开设了几间工厂、商店，既为中共党的地下活动设置了必需的据点，利用这些据点的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又为粤北特委筹措了活动的经费，解决了特委机关的日常开支。而这一切，却是建立在艾黎大力支持而发展壮大的韶关“工合”所积累起来的资金的基础上的。

四十八年的漫长岁月过去了，艾黎老人也离开了我们，但他当时来韶关视察“工合”，支持广东“工合”的光辉业

绩，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本文作者是广东省百货公司顾问，已离休。）

广东龙洋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见市面流通的全部外国银币（主要是鹰洋——墨西哥银元），便奏请自制银元，以谋抵制。随后由广东银元局正式开机试制。此币正面为汉文光绪元宝，中央有四个小满文。也译为光绪元宝。背面是蟠龙图案。每枚重量为库平七钱三分，较当时流通的鹰洋重一分，称为“七三番板”。因原想抵制鹰洋，故币面用中英满三种文字《图1》。但由于制币略重于鹰洋，造成民间私自收藏或毁钱化银，鹰洋继续流通。因此不久即行改制。此币流通极少，成了币中珍品。1890年仍改铸为库平七钱二重，这就是“七二番板”《图2》。因户部审核认为正面用英文不妥。于是又重新改版，这就是后来广泛流通使用的广东龙洋《图3》。“七二番板”也成为币中珍品。（坚）



图3

图2

图1

“工合”曲江事务所

潘祖岳口述 古 衡整理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战火蔓延于京沪一线的沿海省区。工厂倒闭，大量的难民涌入内地，六七十万失业工人流落街头，坐以待毙。为了生产自救，把这些有一定专长的难民组织起来，建立起抗战的工业而为抗战服务，新西兰籍的国际友人路易·艾黎（1897—1987）在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及共产党人周恩来、博古等人的帮助和支持下，于1938年8月5日在武汉正式成立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简称为“工合”（据艾黎回忆，“工合”来由，是艾黎为上海第一个工业合作社促进会到一家商店制作珐琅质徽章的路上想出这个简单名字的，意即“一起工作”），由艾黎任代理总干事。以后，“工合”总部迁至重庆。

GUNG HO



“Working Together”

图为“工合”标志

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的成立，引起了全世界支持者的极大兴趣和关注。为了争取国际上的支持，另一名国际友人美籍著名作家和记者斯诺（1905—1972）在孙夫人宋庆龄的指点和协助下，做了大量工作。结果于1939年1月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合作社国际促进委员会，由何明华主教任主席。这个委员会的成立，为“工合”获取资金、贷款和物资援助等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个委员会，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是独立的。它不受国民党政府的控制，可将募集起来的

大批资金直接或通过上海一家银行汇往国内最需要的地方。于是，全国各地（包括解放区在内），都纷纷建立起“工合”分会。东南地区“工合”办事处，亦于1939年初在江西赣州成立。

1939年秋，苏俊从江西赣州南下韶关，与在广州沦陷前从珠江三角洲北迁韶关的邓重行等人商量，开始筹建韶关的工业生产合作社。当时，只要有技术，有原料，有销路，又有利于抗战，就可以成立合作社，获得“工合”总部的贷款和支持。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建，韶关很快办起了多个工业合作社。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曲江事务所（以下简称“工合”曲江事务所），也就在这样的形势下组建起来，该所隶属于江西赣州的东南区“工合”办事处的具体领导。

“工合”曲江事务所由主任（负责领导事务所的工作）、指导员（负责了解下属各工业合作社的情况，进行业务指导和财务检查、审核贷款等）、助理指导员、财务（包括会计、出纳）、总务等若干人组成。所内人员的薪金，直接由总部下拨。

事务所成立初期，由叶荣健任主任职。他是个华侨工程师，他把“工合”当作一项事业来抓，尽职尽责地工作。可惜不幸染上伤寒病，不久去世。1941年，陈志昆接掌办事处主任，他同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关系密切，与中共党也有联系，是个热心抗日救亡的进步人士。他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但不太懂中文，所以，他上任后，事务所设秘书职，由毕平非担任；指导员由潘祖岳和毕的爱人吴知因负责，姚迅为助理指导员；会计先后由赵洪英、程子韶、邹逸卿担任，出纳是关蝶英。1941年底，陈志昆调往赣州，毕吴夫妇俩也随同前往。陈走后，梅炳财接主任职，走马上任不到两个月，便撤了下来。后调来柳休担任事务所主任，柳带来的

工合股份证书

件經
責任

曲江縣河西印刷工業合作社股份證書

曲字第

北 號

茲有潘林君請求加入本社業經第一次理事會通過及報告第
一次社員大會准許加入為本社社員當於四月三十日繳到股金國
幣 貳拾 元合股股份貳股特給此證書存照

理事會主席

鄧重行

監事會主席

岑 寧

經理兼司庫

駱 世

中華民國三十九年四月

三十日



这是当年印刷“工合”的股份证书

卓一鸣、罗海波和潘祖岳一起担任事务所的指导员。

韶关工业合作社，自1942年开始，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了1943年，已经先后建立起二十多个工业合作社，分布于市区和东西河畔及郊区。在犁市，有樟油工业合作社（当时是中共广东省委经营的，由饶彭风化名黄德庆担任该社理事会主席，通过“工合”贷款5万元作开办经费。1942年中共广东省委事件之后，许多中共党员干部曾以该社作掩护，隐蔽下来）和农具工业合作社；在龙归，有榨油工业合作社和面粉工业合作社；在芙蓉山脚，有织布工业合作社；在东河坝，有机器工业合作社、锯木工业合作社和制鞋工业合作社；在西河，有樟脑工业合作社、印刷工业合作社和油墨工业合作社；在市中心，有家具工业合作社、缝纫工业合作社。1942年底，在市区又成立一个“韶关市工艺合作社联合社”，门市部就设在现在的风采路，由潘祖岳担任联合社经理。

而不少合作社，则集中在西河建立起来的“工合”中心区内（即现在的西河韶关汽车站一带的地方）。如营造工业合作社（专门建造抗战时那种竹织批荡简易房子的）、纺织工业合作社、电镀工业合作社、皮革（制牛皮）工业合作社和卷烟工业合作社等。为了保证中心区、各社电源的供应，中心区内还建有一个专门从事发电的机器工业合作社。“工合”曲江事务所原设在樟脑工业合作社附近，以后中心区建成，事务所迁入中心区新建的房子内。

这些工业合作社，少则十多人，多则七八十人。如东河坝的机器工业合作社，连同聘用（非社员）工人在内达两百多人。河西的印刷工业合作社也具有相当规模。所有这些合作社，都是通过事务所进行了解，听取情况介绍后，认为符

合条件后才准予成立的。因此，产供销都不错。有些合作社，还由事务所派人担任会计，掌握财经。如东河坝的锯木工业合作社、龙归的面粉工业合作社和芙蓉脚的织布工业合作社，都是由事务所派员担任会计的。

1944年，我离开“工合”曲江事务所。后来得知，该所主任柳休也离开韶关，由林达辉接任。6月，国民党反动派对韶关的“工合”进行破坏，不少人员被捕入狱。年底，“工合”曲江事务所的工作也随之结束。

整理者附言：本文是根据潘祖岳同志关于“工合”曲江事务所的忆述并参照有关资料整理而成的。

（潘祖岳，原系广州广播电台台长，现已离休。）

回忆曲江樟脑工业合作社

殷杰

(一)

“七·七”全面抗战后，很短期间国民党军队溃败，在沿海的大、中、小城市及北平、南京、上海等地相继沦陷。沦陷区难民大量逃到内地，工业生产主要基地几乎全部丧失，国外的民用、军需工业品运输阻断。虽然军事受大挫折，经济遭受困难，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更坚定。际此之间，国际反法西斯侵略战士以路易·艾黎、斯诺为首，以及爱国侨胞、侨领，在道义上、经济上、人才技术上，通过各种渠道支援中国抗日战争，更为积极。略举一例：艾黎等国际友人及爱国侨领，就自动发动各方面捐献款项，筹集巨资，建立工厂；在中国后方的部份大、中、小城市，建立各式各样的工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工业商品，一方面支援抗战军需、民用（包括医药和日常商品）；另一方面为了解决逃入内地难民的衣食住问题，吸收他们参加各种工业生产合作社（尽可能利用其所长来组成合作社），进行生产自救。

为了顺利而切实发展“工合”事业，专门成立了“中国工业生产合作协会”，以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等和国内进步民主人士参加组成，统筹发展“工合”事业。在国外筹集资金，由该会统一管理、借贷，专款专用。有条件组织“工合”的市县，则成立“工合”事务所，垂直领导。所里设主

任、督导、会计、审核等部门，负责审查组织“工合”条件，批准无息贷款，以及生产技术和业务指导，财务监督、审核、社员生活福利等工作。对以上各项工作，协会制订规章制度和生产情况、财务盈亏、分配使用等报表，按时上报审核。还经常派员巡回“工合”事务所，视察“工合”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促进“工合”的发展。“工合”业务独立自主，垂直领导和管理，不让国民党的党、政、军干预、插手、过问（我分析是为了预防国民党乘机包办，排斥异己，贪污舞弊）。

曲江“工合”事务所的几任主任，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或进步华侨，所有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是中共地下党员或进步群众。他们诚心诚意领导“工合”，发展生产，解决问题，目标基本一致。

（二）

中共粤北省委认为协助发展“工合”事业，有利于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另一方面又可安置和组织从沦陷区逃难来内地的难民参加“工合”，生产自救。

1939年秋，中共广东省委指示邓重行负责筹建机械、印刷、樟脑“工合”。

樟脑“工合”前身，是抗战前邓在其家乡南海大榄村开设的一间樟脑薄荷家庭作坊。成员有邓重行夫妇、母亲、妹妹，以及弟妇苏连、堂弟邓子华等人。产品——薄荷冰、精制樟脑饼。在广州市设有销售店。邓受命后，在河西租用一间民房（房东姓胡），有二房一厅（约五六十平方米），作为工场和宿舍。邓分三次将家乡的机器、设备、工具及生产成员和儿女迁来曲江，办理组社手续及申请贷借生产资金。

1939年冬，正式成立“曲江樟脑工业生产合作社”。樟脑社成立后，有压制樟脑饼的手摇机器二台，压制薄荷冰的手摇机一台，提炼精藤脑铜罐数十个和修理工具一批。初时，社员不足十人，只供社员食饭。制造樟脑饼和薄荷冰两个产品。后来，随着市场对产品的需求日益扩展，社的规模逐步扩大，获利日厚，积累渐多，除了扩大再生产外，还适当增发社员零用钱，每月约二、三元，并改善社员的伙食。

(三)

1940年5月，中共南路特委派我参加粤北省委在南雄办的学习班（设在赣粤边山区）。后因敌情变化，学习班转移，我又折回韶关，奉命派到“樟脑工合”任经理、党支部书记，由中共省委直接领导。当时交给我的任务是：千方百计闯开产品销路，扩大生产规模，多产商品，多赚钱，全力支持省委解决经费的困难。此时，樟脑“工合”实质成为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下的一个经济实体。

“樟脑工合”的原始财产、技术力量（机器设备、生产经验、技术积累、人力等）都是邓重行私人所有，他无条件地献出来，并亲力为创办“樟脑工合”。费时半载，为“樟脑工合”的发展打下基础。我是继承他的业绩和基础的，并履行中共广东省委交给的任务。

(四)

发展生产的关键，是产、供、销三方面统筹兼顾。既要平行配合，又要互相促进。生产薄荷、樟脑，成为主要赚钱的商品。当时樟脑饼、薄荷冰的产、供、销，都是得天独厚：①全国独家生产；②产品独占全国市场，推销到两广、云南、

贵州、四川等西南市场；③薄荷原料产地在江西吉安，我们派专人去收购，当时属独家采购（有一个秘诀是：原料产地对客户保密）。樟脑粉，是在粤北山区向农民收购。不论产品销售，还是采购原料，都没有竞争对手，可以说是独家垄断。因此原材料价格较低而又稳定，产品能按市场需求酌量提高价格。

到了1940年冬，“樟脑工合”从两方面打开产品销路，一是派专人到桂林、柳州和韶关等城市推销，送货上门，同时洽商订购期货；二是在各大报刊登广告，广招顾客，办理函订期货，按期邮寄。这办法收效很大，招来客商上门购现货，或定期货，或汇款订货，发货寄邮包。大宗顾客是西南厂商。所有订购期货，我们都先收全部货款（作为周转资金），按期发货。我们遵守信用：一是货真价实（以付货款时间的价格结算，因为当时物价不稳，原料随时涨价，产品也随之调整价格，新订货按新价格），付货按期，从不短缺。由于取得信誉，顾客盈门，经常出现供不应求，生意兴隆，蒸蒸日上。

1940年八、九月间，经营增盈，开始按月提取部分利润交给中共广东省委具体负责人严重。从1941年春开始，每月约交一万至二万元，剩余利润则扩大再生产，归还前后向“工合”事务所借贷款项约六万元。由于工厂增盈，这一年，租农民菜地建三座工场（即精制樟脑片工场，车制薄荷冰木盒工场，制造产品工场、包装工场）、一座宿舍、一间伙房，这些都是临时木屋。此外，还建有一座二层砖屋为营业部。社员陆续曾至六十多人。增加了社员伙食费，改善生活，每人每月发给五、六元零用钱。这一年多来，还有几次临时支付：一次交约三万元给中共广东省委，用以支援撤退

香港民主人士经费之用；一次交给中共前粤北特委约五万元；经严重同意，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大林三次向我取款约一万多元；又拨一万多元在郊区租数十亩农地办农场，作樟脑社产品必要时存放点和交通点。这一年多来，业务扩展快，产品销路最好，有供不应求之势，获利特厚。

更主要的，是全体社员上下一条心，各尽力气，搞好生产，不计个人报酬，以社为家，对社领导十分信任。我前后提给中共广东省委的钱，他们固然不知，但也从来不过问，不怀疑，财政上任由我处理。“曲江工合事务所”也从中给予极大帮助支持，不提出任何疑问，只有帮助解决问题。

（五）

好景不长，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恶潮，是后浪推前浪，从不停息。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时刻都有思想准备和应变措施的。1942年5月27日，中共广东省委被破坏，翌日，我把钱财转移，夜间另找住地。我还作好撤退准备，暂不回社里。六月初，我将所有款项（约四万元）全交给严重转给党组织应用。接着，根据当时的环境，由我尽量带一批产品撤去桂林，设法尽快出售，将贷款支援中共广东省委。还派邓子华去桂林协助我作推销工作。为了取得合法地位，尽快销售产品，后来，便在桂林公开设立“曲江樟脑工业生产合作社分销社”。通过新旧商人渠道，特别西南旧关系，推销货品。每月我都带贷款回韶关，同时汇报请示工作。

到了1943年秋，产品剩下不多。11月，生意结束，我把所有贷款和在桂林经营账目带回韶关，全部交给严重。樟脑社从投产到结束，总计产品出售连成本在内，共约20万元。

(六)

韶关失陷前夕，“樟脑工合”先撤去连县，后转梧州，日敌占领梧州，机器设备全部丧失无遗，社员流离失所。邓重行的老母亲带着孙子经过千辛万苦才回到老家。他们倒下去，又站起来，走上革命行列，为革命作出贡献，这是非常可贵的。

1958年，我因工作去韶关，特去河西旧地重访，“樟脑工合”已全无痕迹。缅怀往事，思绪万千。就在这块土地上，国民党反动派曾围捕过我们，一些纯洁的青年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更有一批忠心耿耿，默默无闻，尽力尽责劳动，把创造的财富，全部献给了中共党的社员，使我们深表敬佩。

于1988年5月6日

(本文作者是广东省建工局办公室副主任，现已离休)

解放前的韶关市场

赖 商（整理）

韶关历史悠久，地理优越，地处岭南广东北部。北与湘赣紧靠，南与广州相连，西与广西毗邻，东与江西接壤。京广铁路纵贯南北，浈武两江汇合成北江，流经韶关注入珠江，是南北交通的枢纽，是南北天然关卡，历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水陆交通方便，又是邻省边界商业贸易的中心和集散地，这对促进韶关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环境。

韶关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 20.5°C ，雨量充沛，年降雨量2,038毫米，无霜期短至310天，加上山多岭广，因而水力、矿产、农业、林业资源丰富，名特产不少。在市场上，广为传颂颇负盛名的有：粤北冬菇，马坝油粘米，英德红绿茶，南雄黄烟，翁源三华李，阳山同冠梨，仁化白毛茶，乐昌马蹄……

韶关市场的形成、发展与全国各地一样，经历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到综合，从衰到兴的道路。我国北京、洛阳、西安等地，历为帝王京都所在地，远在周朝就有“日中为市”、“前朝后市”的集市贸易，并设有“司市”，是专管商业和市场的官员。韶关市在隋朝初期建置后，进入唐朝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为岭南道属下的韶州时，管辖着曲江、始兴、乐昌、翁源、仁化、浈昌（南雄）等六县，这时全境有6.3万多户，31万多人。从唐朝起，有不少商贾

来韶经商，商品交换日趋繁盛，但市场方面的资料，从隋朝到元朝仍无法查考。据《韶州府志》记载：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在城北望京门外始建清平市场，为韶关市第一个市场。清朝修复。

抗日战争时期，广州于1938年10月沦陷。广东省政府由连县转迁来韶关，韶关人口从六、七万人骤增至24万。故在1943年设置韶关市。这时经商人员急增，行业齐全，市场与门店发展很快，街上甚为热闹，出现了虚假繁荣景象。

现就韶关在新中国建国前的市场简况，分述如下：

（一）韶关市场的形成

韶关市场的形成，据清朝同治十三年（1874年）版《韶州府志》中“马元修复清平市碑记”记载：“韶郡旧有清平市，在城北数武创。自明嘉靖丙午，南宁陈侯大纶埋二壕而亭其上。……父老相率而进曰：使君之惠我韶也，士安于庠，农耕于亩，商贾出于途，桔拳圉土虚无人也，将再辟三衢，若陈侯当时所为市肆，百五十区金于公，启之今日使废复兴、涣复，萃非公命之而谁命乎，余感其言，因檄曲江县令周君董而成之。……”即是说，在明朝嘉靖丙午年（1546年），（注：另处述为明嘉靖二十六年，即1547年），韶州知府陈大纶，在城北望京门外、笔峰山下，在那颓垣断壁的城墙下，人烟稀旷，“龙脉不团”之地，以建亭立圩聚财弥补也。后因寇毁而废。而马元修复市场并立碑以兹纪之。

时至康熙十一年（1672年），韶州知府马元，修复清平市场，并树石碑清平亭上。至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知府唐宗尧、曲江知县秦熙祚复建。后废。其旧址为今升平路废

品回收公司处。

到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韶州知府唐宗尧、曲江知县秦熙祚在南门外始建南皋圩。该圩为清朝在韶关市最早设立的一个圩（市）场，后已废。其圩址为原城外南门大街，即今解放路南门桥脚处。

韶关市历来街道狭窄，而人口逐日增多，鱼肉菜摊摆设街边，既影响交通，又有碍观瞻，市容很不卫生，不便管理。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十一月，韶州市政局长李晖南，择定三分建市场。（1）择定皇帝殿旧址建立第一市场，拆光华庙材料，招标承建，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一月十日竣工（见下图）。即现在的的市场。



〔说明〕韶州市第一市场，位于原皇帝殿旧址。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一月十日竣工。为当时韶州市市政局长李晖南手建。市场为砖木结构，单砖围墙，墙壁高9市尺，以

瓦作盖，水槽用锌铁片制成，30市尺设一管，傍砖柱导下，地台铺4寸厚灰沙，下筑暗渠。该市场即现在井巷内的第一市场。

(2) 择定康王庙及旧县学宫左侧空地为建第二市场。拆县学宫内崇圣殿和北门城墙的砖料招标承建，同年一月廿一日竣工，又叫忠信路第二市场，即今风采市场。(见下图)



〔说明〕韶州市第二市场位于原县学宫。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一月廿一日竣工。建筑结构与第一市场相同。为李晖南手建。该市场即现在的风采路侧的第二市场。

(3) 择定北门外睦相街附近的大菜地水塘边开设第三市场。拆用北门城墙砖料，于民国十八年二月十七日竣工。即现在的峰前路和中山路间的中山路市场，又叫北门市场、第三市场。(见下图)



〔说明〕 韶州市第三市场位于北门外睦相街附近。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二月十七日竣工。建筑结构和拟建人与第一、二市场相同。该市场即现在中山路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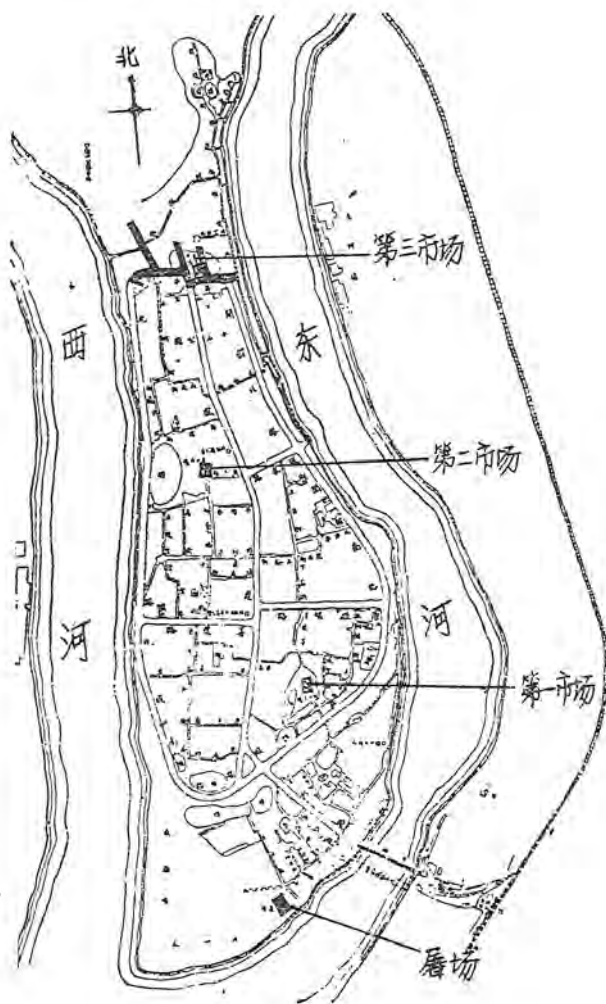
民国卅一年（1942年）六月，由余××科长负责筹建屠场，并于该月十五日在南门兴建南门屠场（见下图）。



【说明】韶州市市立屠场位于南门桥附近。建于民国卅二年（1943年）间。

自广州陷敌以后，韶关成为广东战时省会，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市区一度出现虚假繁荣景象。民国三十年（1941年）十月，市区有大小商店七千余间，市内重新兴建市场四处：第一市场设在漂布塘（即现在井巷、兴隆路内大市场）；第二市场设在中山公园后面（即现在中山路市场）；第三市场设在忠信路（即现在二市场）；第四市场设在河边路三界庙内（即现在南门桥脚）。据《韶关市政筹备处工作概况》记载：“民国卅二年（1943年）五月前，本市市场原有三座，经敌机炸毁一座，现新建市场六座，每座可容摊位40—60个，分布于河西、黄田坝、忠信路、抗日西路、五里亭等处。黄田坝一座，曾于卅二年（注：1943年）一月五日被敌机（注：日本侵略者）炸毁，现已在原址建成”。同时，“本市屠场新建两座，一位于南郊，一位于市区内”。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十一月，在南门桥附近开设第五市场，为肉菜市场。建国前夕，在南门桥脚有米行街，在民权路（现东河桥以上）亦有米市，在太平街（现东河桥脚）设有柴市，在风烈路（现解放路北段）为故衣杂家市场，在罗沙巷（现和平街）是洋杂货市场。当时故衣、杂货市场，云集各地商人，他们多是下四府（广州、南海、番禺、佛山等地）和兴、梅等地的坐商与行商所经营。而农贸市场，多是曲江、仁化等地农民进城出售大米、柴炭、蔬菜、三鸟、鱼类与肉类等。尤其米、柴市，随行就市，沿街摆卖成里之长，在南门桥脚的米行街，米市延伸至坝上，熙熙攘攘，热闹异常。自市政局长李晖南兴建一、二、三市场

韶州市市场屠场位置示意图



后，市场摆卖，基本上划行归市，分类摆卖，方便买卖，吸引了不少外地商人来韶经商。不仅市场秩序好转，而且日趋兴旺。

（二）韶关市场的管理

在叙述韶关市场的管理之前，纵观历史管理情况，兴许有所裨益。

我国市场管理，远在周朝就有专管商业和市场的官吏“司市”出现。《周礼·地官·司市》记载：“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余二十人。”当时，司市为主管市场的官，他的部下还有大夫、士级的官。他们的官职分别为质人、廛人、胥师、贾师、司虢、司稽、肆长、泉府、司门、司关等，对市场活动实行分工管理。同时，记载了他们的分工与职责：司市主管市场的治、教、政、刑、量、度、禁、令；大夫、士是司市副手文官；府人掌管财货官吏；史人掌管记事官吏；胥师管理市场货物；质人掌管市场财货及物价，主管市场秩序；廛人掌管市场的赋税活动；贾师评定物价；司虢掌管政府禁令；司稽维持市场治安；肆长执行市场管理规定；泉府掌管钱币；司门负责市门、稽查走私；司关负责关门和赋税；徒为在司市府署劳动服务之人。分工明确，管理有序，市场成为商品交换中心。

在汉朝设“五均司市师”，在首都长安、洛阳等五都设“五均公署”，委任市长管理市场和物价。到了唐朝，农工商文化教育繁荣兴旺，凡州、县三千户以上设市令一人，掌管市场，为地一级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的开始。宋朝在京都设

置“都提举市易司”，在州、县设立监官。元朝仿效唐、宋机构。明朝在京都设置“兵马司指挥”和“市司”，专事市场和度量衡与检查牙俭（经纪人）。清政府始以“公行”管制商业，后设农工商部商务司，管理企业登记、市场活动和度量衡等工作，省由劝业道，府、州由劝业员兼管。民国时期，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先后设改实业部、工商部、农商部、经济部，最后改为工商部。在省设建设厅或实业厅，在市、县设社会局，管理企业登记和市场。

韶关市在明朝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自建清平（即升平或叫中山路）市场后，每月三圩（即逢一、十一、廿一为圩期）。

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十一月至次年三月，当韶州市政局先后建好第一、二、三市场后，制定了市场管理规则和委派了管理人员。

《韶州市市场管理规则》共十四条。主要内容是：场内设管理员一人，特务警察二人，清洗夫二人；管理员应督率警察及清洗夫维持场内秩序及清洁事宜；每日早晨六时开市，下午七点收市；每逢礼拜六下午，全场大清洗一次。各摊位每月内部大清洗一次。每天上午十时、下午七时，在场内外清扫一次；各摊位垃圾秽物须自行设置箩桶收藏，不得任意抛弃场内；凡病死朽腐肉食及变质蔬菜，不得在场内贩卖，肩挑鱼肉蔬菜者，不得距市场五十丈以内街道呼叫及摆设，免碍场内营业；场内营业称码须遵用权度检定局所定称码执行；场内不准吸食洋烟（鸦片）及聚赌，违者拘罚；场内不准任意便溺，违者罚银一元。从公布时起开始实行。

韶关一、二、三市场投入使用后，市政局委派李仲平为第一市场管理员，曹绰堂为第二市场管理员，罗铁梅为第三

市场管理员，负责执行实施市场管理规则。屠场管理员为许念谟。

韶关市政局为了管好市场，首先对摊位实行严格管理，民国十八年（1929年），颁布了《韶州市承租市场摊位章程》。从此之后，市场各摊位一律公开投承，先由市政局议定底价再行定期布告投承，以超过底价最高者归其承租。市场摊位共分十二类，各类月租底价为：猪肉摊3.5元，羊肉摊4元，牛肉摊3.5元，鱼摊2.5元，烧腊摊3元，蔬菜摊1.5元，豆腐摊1.5元，咸杂摊2元，鸡鸭摊3元，水盆摊3元，生果摊3元。承租人投得摊位后五日内带同本人半身四寸相片二张，亲自到市政局填具申请书并缴足一个月租银，由局发给营业执照方得营业，如过期不到，即将该摊位另行开投。承租摊位必须觅殷实店铺盖章担保，如有欠租等事，为担保人是问。各摊位租金限于每月之起首三日内缴清，以后如过期在五日内罚缴加二，倘仍过期不缴，除追缴租金外，并将该摊位取回另行开投。如承租人歇业，必须在缴租之月内到局缴回执照，报请注销，如不在月内报销，则下月租金仍应照缴。各摊位所用电灯、食水等费均由承租人自理。租期以一年为满，届期经局体察各摊位旺淡情形，将租值酌为加减（加减租值之数均至五成为限）。各商人租得摊位后如有转租别人承项营业者，除将该摊撤销外，并酌量处罚。遇有空出摊位，开投时以超过各该类月租底价最高者为投得。

韶关市政局颁布并施行《韶州市市场规则》和《韶州市承租市场摊位章程》后，市场秩序较好，沿街设摆、乱摆乱卖的现象有所减少。

（三）韶关市场度量衡与物价

度量衡器是市场贸易重要器具，而度量衡与物价又有直接关系，因此，管好度量衡是管好市场重要的一环。据清朝《度量权衡总说》所述，从康熙帝亲自制定度以营造尺寸为淮，量衡均根据营造尺制定，漕斜为量之本，库平为衡之本，并制定铁模以兹划一。从此，度量衡制度才算划一。为了统一度量衡，清朝各省设立专门厂家制造，实行专卖，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度量权衡局负责管理；规定“市场应用之度量权衡须与现时通用者一律”。

民国政府对度量衡也作了统一规定。规定从民国十九年（1930年）一月一日起施行。各县市附设度量衡检定所监督执行。

清朝对度量衡在严格管理的同时，对物价亦进行管理。首先对粮食、食盐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进行管理，限价出售，调价收购。其次，储存商品，遇市价高涨时，平价抛出，平抑市价。第三，调拨调剂，减少地区差价。第四，限价出售。第五，审核价格。第六，严禁囤积，私运居奇。如乾隆七年（1742年），粤东、广州、肇庆、惠州、潮州等处米价腾贵，即从广西省仓运谷21万石，运东平糶，每石定价四钱，于秋后买补。

民国时期自抗战以来，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投机商人囤积居奇，买空卖空。如上米，每市斤计：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六月为0.09元（国币），民国三十年（1941年）十二月涨至0.95元，比二十六年涨了10倍，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十二月，又涨至4.20元，比二十六年涨了45倍。

面粉、猪肉、红糖、棉花均涨至40—50倍。尤为甚者，生盐，民国二十六年每斤从0.10元，涨至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达14元，为140倍。棉布，民国二十六年六月每市尺0.09元，民国三十年十二月涨至3.60元，已达40倍，到了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又涨至15元，比二十六年涨了166倍（见《广东教育战时通讯——当前管制物价问题研究资料》）。

国民政府为了控制物价，规定民国卅一年（1942年）十一月卅一日及十二月卅一日的平均价格为最高价格，以后不得任意变动。并从掌握物资、增加生产、节约消费等方面去平抑。规定“其价格非经县市政府呈请上级主管机关核准，不得超过规定之最高价格”，并指定“在广东第一期实施限价地区，先由韶关、曲江、乐昌、仁化、南雄、始兴、连县、连山、阳山、乳源、英德等十一县实施以次推及东江……”。（同上引）

广东省政府为稳定物价，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七月颁布的《非常时期评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法令，严令各市县坚决执行。因此，在韶关市设立了广东省会评价会，以绥靖主任公署、广东省政府、韶关警备司令部、曲江县政府、国民党县党部、县商会、警察厅等机关为委员，以控制物价，安定人民生活，组织开会评定物价34次。但因权责不清，不但不能控制，而且与日俱增，造成空前暴涨状态。民国廿九年（1940）四月三十日，评定米价每元6斤12两，五月十七日为5斤，八月十日为3斤12两。实际形同虚设，无济于事。民国三十年（1941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韶关市府筹备处重新组织评价委员会机构，以市政处、警备部等15个机关组成，评议内容主要为日用品、服装、食品、工业原料等各项物价。时至民国三十

一年（1942年）一月，先后召开五次评议会，然而米价由每元约1斤12两，突涨至只能购12两至14两。

物价飞涨无度，主要是当时政权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货币失信，不断贬值，尤其在民国三十年（1941年）前夕，国民政府滥发国币“金圆券”，币值更为猛跌，甚至早晚时价不同，上午纸币可用，下午只作废纸一张，因而曾一时出现以米谷为准价，交换日用品则“以物易物”的办法进行。不久，又以“银圆”为流通货币，可也挽救不了败局。所谓平抑物价，安定大众生活，成了纸上谈兵。此时，富商巨贾趁机大量抛出国币，抢购货物，囤积居奇；穷人贱卖农产品后所得的纸币“金圆券”，因贬值成了烧不着的“湿柴”，弄得伤心落泪，怨声载道。

（四）韶关市场的诸禁与管理

韶关禁止上市物品，早在何时何物何禁，未得资料查证，不过，在民国时期已有明文禁令。

市伪之禁，远在周朝《周礼·地官·司市》就有记载：周官司市，……圭璧、金璋、命服、车、宗庙、戎器、圉器、兵车、奸色、锦纹、珠、玉，凡此在工不得作也。六畜、布帛、衣服、饮、食、五谷、果实、木、禽、兽、鱼鳖，凡此在民不得蓄积。到了隋唐，“兵器及诸禁物，并私家不应有”者也。同时，对盐、铁、酒、严禁上市，私卖盐五石，皆捉拿坐牢至死。宋元明清有过之而无不及。

国民政府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二月，发布非常时期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经营本业商人和非经营商业与非经营本业商人，取缔囤积粮食类的米谷、麦、面粉、

高粱、粟、玉米、豆类；取缔囤积服用类的棉花、棉纱、棉布、麻皮、皮草；取缔囤积煤炭、木炭；取缔囤积日用品类的食盐、纸张、皂碱、火柴、菜籽油、菜和其他经济部指定的物品。

民国三十年（1941年）二月七日，第八次广东省党政军联席会议通过《广东省非常时期限制粮食输出省暂行方法》规定“本省境内无论属本省出产或从外省输入，除经省粮食管理机关核准外，均不得输出省境。”。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一月，曲江县政府施行粮食限价供应数额办法，限定每月供应韶关市粮食1.2万市担。同年八月十八日发布《布告》，在新谷登场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论购买多少，“均须持有省粮食局许可证，始得在各乡采购粮食。”该项办法实施之后，稍见收效，早谷价格由每市担800余元，跌至500余元。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一月，省决定在重要县市设置粮食管理处，对粮食市场进行严密管理。保护正当粮商，惩处不法粮商。监督执行国民政府《非常时期违反粮食管理治罪条例》，取缔囤积、私运和暗盘交易。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三月，为减少粮食消耗，颁发了《广东省禁酒办法及施行细节》，强调“本省粮食尚未称缺，现将届青黄不接，各地粮价日高……对于米粮、杂粮酿酒既运售宴饮该项酒类一律禁止。”随即，曲江县公布《禁酒办法》。规定：“所禁之酒，除跌打酒、果汁酒外均属之”；“宴饮米酒及杂粮酒者，处宴主人1000元以上5000以下罚金”；“凡甌户之酒甌，……20日内报请县市政府封存”。当时韶关市均在执行之列。

民国十八年（1929年），韶州市政局对屠店出售肉类亦

有规定：“凡出售吹水吹气或有病自毙之畜者，除将该肉没收焚毁外，初犯者处10—20元罚金，再犯者处20—50元罚金，三次者勒令停业。”“凡鸡鸭鹅吹水吹气或有病自毙之禽类售卖者，除将该肉没收焚毁外，初犯者处5—10元罚金，再犯者处10—20元罚金，三次者勒令停业。”

韶关市政筹备处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十月，在黄田坝查获私宰生猪一头，被市税处传讯受罚。对自制土纸烟均严禁上市，一经发现，便缉拿严办。对无证开业的医师和江湖求神问卜治病的人，也予以取缔。

（五）韶关市场的关卡与关税

韶关是以取韶石的“韶”和半岛上水旱三关的“关”而得名。

东关设在东河（即浈江）太平桥（前有浮桥，今为东堤北码头）边，名为太平关。解放前，凡江西入粤市场的客货运输，多用木船载运，必经浈江太平关。这是清朝的摧税钞关。

太平关原设于南雄。据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林述训撰《韶州府志》记载：“康熙八年，以部司摧南雄太平桥税九年移于湘江门外，并理遇仙、浚光二厂（笔者注：厂即税关）。又据光绪三年张希京撰《曲江县志》所述：“太平桥在湘江门外里许，即东河浮桥，今为摧税钞关。”乾隆三年（1738年）移建九皇宫前。

太平关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改归巡抚委员监收。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归南韶连道经理，每年应征正额税银5.2万两，木税正额银650两。嘉庆四年（1799年）起停

止三年。咸丰十一年（1861年），木税盈余约征银6,000两，加江海关代征丝税共每年征银13.48万两；但从咸丰八年以来均未征收足额，每年少征2万余两。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二十四日抚部院蒋益沅奏改关务，裁撤书吏家丁，而设立太平、遇仙北关，浚光四分厂派员经征。经整顿后，开关试办起计，经一年核计，共征正额盈余洋银18.98万两，又江海关代征丝税纹银4.29万两，比定额数增加9.77万余两。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裁巡抚为总督兼管。民国十年以前设监督督征，十一年曾一度改为商办，十四年改委总办，十七年至二十二年（1933年）又为商办。

韶关的另一个水关为西关即遇仙桥关。设在半岛上西门外，为西河（武江）浮桥桥头处，即现解放大桥位置。武江上通泷水，为楚（湘）入粤要津。据明朝嘉靖阮元撰写的《韶州建置略》所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始税商舶”，“清朝仍之至康熙九年（1670年）奉部差专理而摧政始有专司矣据此则今原大平桥钞关在焉。”

韶关的另一关为旱关，据同治十三年林述训编撰《韶州府志》记载：“又有旱关一处在郡城北门。”即现在升平路处。

抗战前，曲江列为全国五关之一，另四关为洛阳、上饶、西安、兰州。曲江关设立公路、铁路、北江、浚江四个分卡，专事缉私和税收。据民国二十二年编纂的《广东财政纪实》记述：各关税标准一般为：生猪每头税银1钱4分，生油每百斤税1钱8分，黄白糖百斤税8分，小木每根税8钱4分，大木每根1钱6分4厘，粗茶每百斤税1钱2分，烟叶每百斤税2钱4分5厘，土酒每担税2分，火柴每百斤1钱2分等。至于其他税收多如牛毛，就不一一列举了。

抗战前后的曲江（韶关）工业

梁 观 福

曲江（县治亦称韶关或韶州，以下统称曲江），资源丰富，地居粤汉铁路中点，水陆交通频繁，北控湘赣，南联广州，是粤北经济中心。其工业在抗日战争以前就为“粤北之首位”。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州沦陷，省治迁韶5年多，曲江更是“工商荟萃之地”，其情形可谓“发展甚速”，“盛极一时”。随后虽有萧条之势。但曲江的工业在抗日战争前后，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工业的行业分布较广，参加各行业工会的工人达一万余人。现就所掌握的 有关 资料，按当时所列入工业范围的曲江工业之大概情形分述如下。

一，火柴生产业

火柴工业为曲江抗日战争时期的新兴工业，也是当时日用品工业最大的一宗，创于1940年。是年9月，广东振济会以振济技工养成所，投资开办韶关振工火柴厂，也称第一火柴厂，该厂当时被称为“该业之口蒿矢”。厂址曲江城西北上窑村、资本额国币42,000多元，经理刘克平，员工144人，其中职员6人，工人138人，年产火柴3,600笠（每笠400盒），价值287,000多元。继起的还有民营的金星、兴利、仁济等五六家。其中较大的两间火柴厂，合计资本国币48,000元，

工人115人，年产火柴7,2000筮。工人日工资最高7元，最低3元，普通5元。

1944年左右，省火柴专卖局在韶关成立，由财政部火柴专卖公司统筹配给韶关各火柴厂的原料，以两成利润之给与，交厂商代制火柴。这样一来，韶关火柴各厂大都无利可图，纷纷改业。连较为有实力的振工火柴厂，也难以维持，于1945年春宣告结束，专卖局旋亦瓦解。

抗战胜利之初，进口的火柴，尚未输入，一些较为有钱而又流动的商人，认为火柴业轻而易举，销路既畅，弋利颇厚，于是，在曲江设厂制造，火柴厂多如雨后春笋。1926年是韶关火柴厂的全盛时期。当时，加入火柴业工会之正式厂商，约40余家，家庭式小型厂约50家，以此业糊口者约四五千人。惜此黄金时代，为期甚短，仅半年即告衰落，大小厂家，十有九破产，勉强能挣扎者，只剩10家左右。直至1948年春，湘赣客帮十分重视火柴的生意，经常来韶大批采购，曲江火柴业才渐复苏。但又由于原料缺乏，成本过高，复呈不支之势，至下半年，仅存寥寥四五家而已：一是设于西河韶西南路22号，由李思普经办的广大火柴厂，产品商标有月明、飞龙、嘉禾、广大四种，月产量约600筮；二是民众火柴厂，厂址东河坝新生园19号，产品商标为民生、民众两种，经办人关崇振，1948年前每月产300筮，1948年后改机制，月产1500筮；三是设于东河坝中正五横路8号，由司徒庆科经办的世界火柴厂，月产金狗牌火柴250筮；四是燧人火柴厂，厂址光孝二横路3号，经办人毛炳；五是在河西卢星辉经办的爱国火柴厂。此外，还有一间由关兆鹏主办的民生柴技盒片厂，地址东河坝新生园。以及由卢星辉在黄田坝仲元16横路5号经办的曲江县火柴手工业联营社。以上各

厂，除广大火柴厂成立于1942年12月，资格较老外，其余均是1945年9月后成立的。广大火柴厂设备有动力蒸汽发动机50匹马力、45匹马力各一部、14匹马力两部，规模颇大，但由于资金短缺，业务未能充分发展。民众火柴厂产品当时相当畅销，但又由于当时改用机制，而火柴盒片和火柴枝，尚须假手外求，因此生产也不很理想。世界燧人和爱国等火柴厂，生产形势亦不很乐观，可谓“已入冬眠状态”。

1947年，曲江火柴业生产之所以停滞不前，除原料、资金缺乏和设备简陋外，纳税的不断加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1947年曲江货物局火柴业税收情况就是很好的实证：1月份为378万元（国币，下同）；2月份为685.5万元；3月份为716万元；4月份为1107万元；5月份为5991.4万元；6月份为1400.5万元；7月份为2285.6万元；8月份为2877.8万元；9月份为3115.4万元；10月份为5230万元。上列税收数字，在6月份以前，征税率每筓1万元，自6份起加税，每筓1.7万元；8月份起每筓3万元，10月份起每筓4万元。

二、烟丝加工和卷烟业

粤北各地，土质和气候较为适于种烟，尤以南雄、始兴等地，黄烟产量最为丰富，而曲江便是散集之地。因此，加工烟丝和卷烟，又为曲江传统手工工业的一大宗。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省府迁韶，人口猛增，香烟之需求也随之剧增。加上内地洋烟税重价昂，而土烟品质香醇、价格低廉，人皆趋之，使曲江土烟丝和卷烟工业得到蓬勃发展。据1940年和1948年有关资料统计，曲江全城就土烟丝加工和销售商号，有二、三十家。其中经营历史最长的有成立于清代

年间，在风度北路的中兴商号和成立于民国元年（1911年）在风度中路的江有商号，而资本最多（5千元）的是1937年7月成立于风度中路的信隆商号。当时曲江城的烟业虽然盛行，但对于烟厂、商家来说，收入并非可观，其原因有三：一是资本短缺，极少藏储周转；二是制法不务改良，故步自封，只求有货应市；三是烟税很重，不断加码。就1947年为例：1月份1539.2万多元；2月份1759.6万多元；3月份2059.7万多元；4月份2222万多元；5月份2537.6万元；6月份3345.4万元；7月份2037.7万多元；8月份6785.1万元；9月份6450万元；10月份5125万元。

抗日战争前后，曲江的卷烟行业也很盛行，除家庭手工卷烟外，在城内还有不少较为进步的土制（半手工半机械）卷烟厂，主要有如下几间：一是由吴拜虞经办，设于东河坝的利华卷烟厂，香烟商标为“嘉宝”、“金力士”。1947年之产量，7月份89大箱（每大箱5万支装），8月份128大箱，9月份96大箱，10月份73大箱，11月份80大箱，12月份213大箱。1948年平均月产120大箱；二是华成卷烟厂，经办人江昌梓，厂址风烈路65号、香烟商标有“金牛”、“花塔”两种。由于规模小，资金困难，产量不高，就1947年下半年生产而言，7月份才产2大箱，8和9月份停产，10月份仅25000支，11月份5万支，12月份又停产；三是联南卷烟厂，负责人江主扬，厂址风度南路，香烟商标为“长鹿”。该厂生产形势更不乐观，以1947年下半年计，7月份才生产6千支，8、9月份均停产，10月份和11月份合产1大箱，12月份又停产。

以上三间卷烟厂，到1948年上半年，由于税收标准过高，资金短缺，原料缺乏，外货侵扰，交通困难等因素，日

趋衰落，只有利华卷烟厂勉强能维持生产。该厂前身原为澳门民有烟厂、因澳门战时混乱，于1943年抢运内迁，设厂于曲江马坝。第二年因曲江沦陷，被日军强占，迁至韶关东河坝，改名“东亚烟厂”。抗战胜利后，该厂大部分机件散失，几经经营，于1946年1月被当地接收复工。但是，由于器材仍未能尽量补充，生产十分困难，产量锐减，日产只有20大箱，后来虽有一定进展，但由于上述原因，至1948年也逐渐衰落下来。其余规模小的厂家，如联南卷烟厂，就因无法生产于1948年1月依章取缔。

三、食品加工业

曲江属粮产区，加上毗连湘南和赣南，各地粮产品汇集曲江转运各地，故碾米业向来颇为发达，也是食品加工业最主要的一宗。

曲江碾米，农村最初采用土法人力舂米。利用水车（俗称雷公车）碾米，远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出现，是为曲江代替人力碾米之始。采用机器动力碾米，称为米机碾米（其设备，初期主要是柴油发动机），在曲江据有关资料所载，二十年代末就已出现。1933年间，曲江省属米机厂两间，每日可碾米可达6万多市斤。

1947年前后，曲江县有动力而规模较大的碾米厂主要有四间：一是利农米机，负责人黄寿余，厂址民生路74号（一说14号），建于1937年，设备有发动机、煤汽机、抽水机一副。该厂1948年碾米14.4万担；二是由关侣经经办于民生路38号的阜民米机。该厂创办于1929年3月，属合资经营；三是同裕米机，据有关人士回忆，早在1928年前后就已经设

立，厂址西河的河西尾，1948年年产量14万担；四是利生米机，厂址西河的河西尾，四间厂的设备与同裕厂大致相同。

曲江粮情，一般都随广州市行情而转移。1948年，广州、清远等地粮价日涨，又由于各地运韶之谷，大量为外地吸收，致使该地谷贵米平。因此，当时买谷碾米，很不合算，再加上粤北各地普遍采用水力碾米，价格较廉，对曲江的碾米业打击很大，动力碾米出现停工多于开工的局面，生意每况愈下。

四十年代曲江的食品加工业，除碾米业外，还有其他一些副食品加工行业。

（一）、制糖业。制糖，当地人称榨糖，是曲江浈、武、北江两岸乡村的民间季节性手工业。因这些地方多为坝地，适于种蔗。榨糖历史在曲江比较长，三十年代开始较为盛行。制糖的场所，当时称糖寮。其制糖方法大致这样：工具使用石磨，每次用两头水牛拉旋转石磨，每间糖寮至少配有六头水牛轮班，每天一般在夜间二更时开工，至次日下午3时左右停工。每间糖寮一天普遍可榨蔗汁十四五桶，每两桶汁可煮糖一锅，制成片糖二三十斤至四十余斤不等。煮糖方法，是用一灶座锅三口，一口叫做水锅，其它两口称为熟锅，先把蔗汁倒入水锅，倒时要用疏竹筛隔去汁中蔗渣，并放入纯石灰若干于汁中同煮。一边煮一边要用木棒频频搅拌，如有污泡浮上，要尽快拨去，汁煮至显红色时，再分入两口熟锅中煮，煮好的蔗汁，便倒入凝糖器中搅拌，然后倒入草席上马上拨平，待凝结后切成小片，逐成片糖。1928年左右，每斤片糖只值一毫至一毫半。所产的片糖除供本地用外，多运销南雄、始兴等县。1933年，据有关资料统计，曲江制蔗糖2,000多担，价值1.4万元，片糖六七万斤，价值

1.2万元。1940年，曲江有正规的民营制糖厂两间，资本总额2.1万元，工人22名，年产片糖4,800担，主要在本县销售。

(二)、榨油业。榨油业也是曲江民间传统手工业。主要产花生油和菜油两类，早期多为自产自销。榨油采取人力加工法。据有关资料统计，1933年间，曲江较大的榨油厂，产花生油500余担，价值1.5万余元。1940年间，曲江较有规模的民营榨油厂有8间，资本总额1.3万多元，工人35人，年产生油15.13万市斤，主要在本县销售。

(三)、制酱业。1940年间曲江有制酱厂一间，资本总额4千元，工人10名，年产豆酱200担，约2万市斤，在本县销售。

四、机械和金属制品工业

曲江的机械和金属制品业，起源于小农具的加工，其场所开始称为打铁铺，在各乡村都有之。而真正制造大型机械的，是以陈济棠主粤时，在韶关（今中山公园内）创办的飞机制造厂开始。该厂建于1935年，聘请美国人为顾问和总工程师，特邀留日、德等国学生谢电耀等56人为设计师。厂内设工务、总务两处，职工500余人。1936年，该厂利用国外的发动机、仪器和各种机械设备及原料，生产出首批9架名为复兴号双座侦察机，试飞性能良好，时速为160英里。陈济棠下台后，蒋介石委派在南京航委会工作的梅龙要接任韶关飞机制造厂厂长，改名为第一飞机制造厂。该厂先后生产飞机六七十架。抗日战争时期的1937年至1939年，该厂多次被日机轰炸后，不再复存。

抗日战争时期，曲江的机械各行业发展较快。就金属制品业而言，在1940年间，小型农具厂就有25间，资本额1.5万元，职工138人，每日工资最高1.5元，最低0.5元，普通0.8元，年产农具1.44万件，价值1.2万元。其中较大规模的是1941年5月成立于东河遂德路的“万成打铁工厂”（经理人张福，资本近千元）和1941年于老隆街成立的“安然铁工厂”（经理人谢福）。同时，有修车厂（包括汽车、单车、手推车等）20多间，资本额15万元，从事人员1500人，年修车625辆，价值43.75万元。纯汽车修理装配厂12间，其中规模较大资本最多的是“志成厂”，1941年3月成立于凤烈路，经理人许日，资本5万元。其次是“万里”汽车修理厂，1941年成立于九成路，资本7千元，经理丘利。此外，较为正规的机械工厂，是省建设厅投资于1939年11月16日在曲江茶山兴建的机器制造厂。其总资本额11万元，总员工75人，其中职员7人，技工68人，年产人力车300辆。

五、电力工业

曲江的电力工业创建于1915年，由华侨集资4万元成立韶光电灯公司，办起一所电厂。它不仅是曲江最早的发电厂，也是曲江城解放前具有动力最大之厂商。经营后很有起色，并逐渐得到扩充，至1929年，始改名为韶州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属民营性质，发电量715瓩，1934年经理陈广材，于1941年奉准立案专利。曲江沦陷时，电厂被日军所占据，备受蹂躏。

抗战胜利后，被曲江县前县长黄干英自行组织的临时管理委员会所接收，继续营业。当时，原公司经理陈照鑫，曾

申诉归还业主，被县府指为有汉奸嫌疑，拘禁许久，出狱后病死。直至1948年8月，广东省政府建设厅以维护华侨集资办实业积极性为由，判决该厂归还原业主自办。当时电厂动力设备，有美国发电机一部，英国制140匹马力单缸机一部，德国120匹马力双缸机一部。每夜发电500余度，用户600余家，每度收费6千元，而实际收费者，只得300度，以致亏蚀日深，前途岌岌可危。当时有人呼吁政府应给予扶持。

六、日用化工业

抗日战争前后曲江的日用化工业主要有几项：第一，肥皂（亦称梘）生产业。据有关资料所载，早在1934年就有“造梘厂”一所。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曲江人口速增，肥皂需求量大，生产的厂家不断增多。到了1940年，民营肥皂厂就有3间，资本总额2.5万元，工人26名，工人日工资1.5元，年产肥皂6400箱，运销本省各县。规模较大的省营肥皂厂在曲江也有两间。一间是省府迁韶后，由省建设厅投资于1940年3月在韶关东河坝兴办的肥皂厂，员工23人，其中职员8人，技工15人，开始只有资本19,097元，原只产洗衣条皂和方皂。由于品质优良，取价从廉，在市面十分畅销。所以，又增拨资金2.35万元，增设巨型制造锅槽，扩大生产，并购存各种原材料。故生产发展很快，产品种类增加，有卫生药皂、松香皂、化妆香皂等，达到月产肥（香）皂600箱。

另一间是1940年9月，由广东省振济会投资在曲江沙头儿童教养院兴办的肥皂厂。资本额5.9万多元，经理吕可权，员工72人，其中职员7人，技工65人。产品种类有洗洁、松

香、卫生、化妆等皂，年产1.8万箱，价值31.32万元。

第二，电池制作业。1939年12月，省建设厅于韶关东河坝兴办电池厂一间，资本额3.35万元，员工29人，其中职员7人，技工22人。年产二号电池7.2万打，产值12.95万元。

第三，酒精和油漆业。1940年3月，省建设厅在曲江筹建酒精厂一间，资本额为10.7万元。厂主任1人，技工2人，技佐3人，助理员3人，事务员2人，会计员2人，工人46人。（日工资2.63元），年产93度酒精4632担，价值1,736万多元。曲江的油漆业，以桐油业为主，早在1932年就有7间，资本虽只有1千多元，但产值很高，工人每月工资最高可达18元，最低也有9元，普通的13元。

曲江日用工业，除上述火柴、肥皂为大宗之外，还有牙刷制造业。三十年代末，曲江城有私人经营的牙刷厂两间。1940年底，广东省振济会又投资兴办牙刷厂两间。第一间厂址在曲江上窑村，资本原有1千多元，收容难民7人。起初因资金困难，厂房狭隘和采购牛骨猪毛等原料困难，只作小规模生产，每日可制骨柄400支，穿毛300支。后来增加投资14,155元，并加搭棚舍，大量购存原料，扩大生产。第二间是在十里亭，资本1万多元，经理陈华勋，职工51人，年产牛骨牙刷2.4万支，价值13.62万元。

此外，还有不少小型制鞋厂商。其中1941年成立于忠孝路的“忠倍鞋厂”，较为大间，资本4千元，由郑耀德任经理。

七、纺织和皮制工业

曲江的纺织业，据一些老人回忆，二十年代前后是有人

专门从事麻布手工纺织。1932年有织布、织袜手工业。1934年，曲江城有民办毛巾厂一间。抗日战争省府迁韶后，人口速增，纺织品需求量大增，曲江纺织业有一定发展。就1940年至1941年间，曲江范围内就有纺织、织染厂十多间。其中民营染布厂一间。1941年民营厂发展到五间，人数不多，每厂只有2至3人；私营织布场有十间，资本额5千多元，工人20多人，年产布5万匹。当时，较大的纺织行业，是广东省振济会于1940年9月在韶关东河坝投资兴办的第一缝纫工场。该场主要为安置有缝艺专长的逃难妇女而设，资本6万元，员工187人，其中职员17人，工人170人。年产被、服、帽一万套，产值15万元。

此外，省妇女生产工作团在曲江设有纺织工场四个部，从事纺织生产。第一为织布部，有铁机木机140架、打纱机26架，拉纱床1副，拉纱凳2副，纱筒4百只，工作人员140人，年产2千多匹。第二为毛布部，有织毛布机50架，工作人员56人，年产毛布3,900多打。第三为织袜部，有袜机14架，工人15人，年产袜100打。第四为车缝部，有缝纫机80架，工人100人，年产衣服4万多件。

曲江制皮革业，1940年前民营制皮厂有两间，工人7人，资本1,800元，年产皮100张，运销本省各县。制皮革（包括制皮鞋）28间，资本3.3万余元，工人272人，月工资最高20元，最低8元，普通15元。年产皮革6千对，价值6万元，其中制皮鞋小厂商8间。

八、印刷工业

曲江印刷业，早于1928年在韶州风度中路，就设立宝元印

务局。抗日战争期间，曲江成为广东省会，学校、新闻等文化机关剧增，大小报社林立，各种刊物有50多种。因此，当时曲江的印刷工业发展迅速。1940年，印刷行业就有20多家。现列表如下：

印局所在名称	负责人	地 址	机 械 设 备
粤强印刷厂	伍颖辉	曲江五里亭	16度机2架，6度机3架，照镜机2架，铸字机3架，发电机1台，摄影机1架，1至3号铅模约2万颗，字粒2万磅。
中山印刷所	李伯荣	曲江河西3路 中山日报社	6度机1架，照相机2架，铅字1千5百磅。
复兴书店 印务部	黄仙岩	西河二段25号	6度机2架，照镜机1架，铅字4千磅。
文化印务局	林孟皆	西河	6度机1架，照镜机1架，铅字3千磅。
建国印刷工场	梁定慧	东河曲江公园 侧	6度机2架，照镜机1架，铸字机1架，2号字1副，2号字5副，铅字6千磅。
先导印刷公司	何振	西河韭菜地 右侧	6度机2架，照镜机2架，铅字5千磅。
文华印务局	胡芳	西河韶西北路	6度机2架，照镜机1架，铅字机5千磅。
南汉印务局	罗纯义	西河西路52号	6度机2架，铸字机1架，平板机2架，打孔机1架，铅字4千磅。
利民印务局	钟瓚	东河坝	6度机2架，照镜机2架，铅字1万磅。
三民印务局	黎华巨	黄田坝韭菜园	6度机2架，手板机1架，铅字2千磅。
中国文化服务 社广东省分社 印刷所	薛君义	东河上街74号	6度机1架，照镜机1架，针孔机1架，铅字8千磅。

中国印业公司	李良	黄田坝教育路	6度机2架,照镜机2架,铅字8千磅。
宇宙印务局	何慰农	东河钱7村	6度机1架,照镜机1架,铅字3千磅。
明艺印刷局	李照业	东河聚龙下街19号	6度机4架,平板机1架,铅字1千磅。
复兴印务所	许寿征	西河复兴村	6号机2架,照镜机1架,铅字8千磅。
河西印刷工业合作社	唐宇棉	河西台儿庄1号	8度机1架,照镜机1架,铅字4千磅。
万兴石印局	王秀标	风烈路65号	手摇石印机1架
广东文化印刷公司	郑秀楷	曲江马坝	对开机1架,6度机2架,小型6度机1架,照镜机2架,手板机1架,头号老宋铅模6844粒,3至6号老宋钢模各7千粒,铸字炉及木型影机各1部。
兴业印刷公司	李兴业	黄田坝	旧式6度机1架,14寸照镜机和手摇机各1架。
大成印刷局	李伯韶	西河台儿庄2号	6度机2架,照镜机1架,铅字1万磅。
明德印刷所	陈云陶	中山路	6度机1架,照镜机3架,铅字3千磅。

此外,曲江原有一间印刷厂,资本额7万元,工人52名,每日工资最高12元,最低5元,普通7元。为了适应印刷业的需要,曲江还设有一间民营的小规模铸字厂。

九、造纸和竹木工业

曲江及邻近各县竹、木、芒的资源很丰富,因此曲江的竹木制品以及造纸业素来为当地传统的手工业,也有悠久的历史。造纸业早在清末就有了。1932年前后,曲江的沙溪、

灵溪等处私人土法造纸小厂有十余间，每厂只有3至4人，由于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不佳。1933年4月统计曲江产土纸5万担，价值10万元，粗纸2千担。1939年期间，曲江民营造纸厂有六间，资本很少，仅有5百元，工人20人。由于规模小，年产仅有4百担，运销本省各县。1940年6月，广东省振济会，以技工养成所在韶关东河坝开办制纸厂，经理刘克平，工人12名，资本额1.3万多元，年产包纸价值3万元。1947年前后，曲江丽水、新溪等地为纸的散集地点，每墟期销纸约5万担。

曲江竹木加工业，历史较长，也为民间重要手工业之一，占有一定经济地位。抗日战争前后，专门从事的人和厂场不断增多。竹器加工多见于粪箕、谷箩、竹搭和部分家具。抗日战争期间，据有关资料统计，曲江有竹器厂场18间，资本1.2万多元，年产竹器1.5万件，价值1.5万元。从业人员95人，每日工资最高7元，最低3元，普通5元。木器加工，有锯板和制造木器两大类。锯板又分一般木板和棺（寿）板两种。专门从事锯板的厂场，较早的有1920年创办的“昌源做船板厂”，地址韶西北路由郭焕章经营。抗日战争时期，较大的锯木工场有东河坝的“材隆”、“源安”两间，以及韶西南路的“添兴”锯板厂。“材隆”锯木工场，成立于1940年3月，资本1千元，经理人高维。“源安”锯木场，成立于1939年5月，经理人朱南，资本2千元，“添兴”锯板场，成立于1940年5月，经理人吴天为，资本1千5百元。

木器制造主要有木屐、棺木（即棺材）、木船三种。木屐加工初为自制自用，或在集市出卖，1940年9月，忠孝路专门设有名为“和合”木屐加工集商号。专门经营棺木加工

和销售的商号在曲江早在清末就已出现，抗战期间最多。据1940年有关资料统计，县城就有8间，其中最早的是“利贞”寿板商号，成立于清光绪28年（1902年）。其次是“其昌”，成立于1914年。资本最大是“许泗源”棺木商号。

抗战时期，由于战事频繁，铁路公路经常受阻，交通运输主要依靠水运。因此，造船业为木器加工的最大一宗。曲江的造船历史较长，多分布于浚、武、北三江河岸之乡镇，多属于民间手工业。县城较早设立造船的厂场，是成立于1912年的“信利做船厂”，抗战期间厂址在韶西北路，经理人黄坤。抗战期间有由刘生才经营的“刘兆记造船厂”，成立于1939年，厂址在韶西北路。据有关资料统计，1940年曲江造船业实为可观，共有城乡造船厂场54间，资本额2.7万多元，从业人数235人。年产大客船972只，小客船4050只，价值共100多万元。

此外，省振济会于1940年10月在曲江沙头村（一说马房背），兴办的第一竹木工厂。是将以前之竹木工场及技工养成所竹木工厂合并而成。原有资本1.3万多元，后又增拨一百多元。收容技工养成所土木工程部毕业生42人，由张发鸿负责，全厂员工86人，其中职员7人，技工79人。每月制成竹木器578件，约值2千多元，年产值62,124元。

十、建材及工艺雕刻业

曲江建材业，特为大宗的是烧石灰和砖瓦，较大的乡、镇、村几乎都有。1940年，曲江增设有专门经营烧石灰的公司。同年9月，省振济会投资，以技工养成所在曲江开办一间石灰工厂，由刘克平经营，工人33人，资金1万元，年产

石灰2,000担。同年9月,省振济会又在曲江黄岗东瓜岭兴办起第一砖瓦工场,资本总额1.36万多元。经理林伯球,全场员工32人,其中职员7人,技工25人。年产瓦7.6万多件,砖5700多块,阶砖1400多块,产值6万多元。

曲江工艺业,早在1934年前在县城就有官办平明工艺厂两所。抗战期间,曲江工艺业也有一定发展,计有广东民义工艺厂一间,广东省妇女工艺厂一间,儿童保育院工艺厂两间,孤儿工艺厂一间。1940年间,曲江城雕刻颇为一些手工业者所重视,其雕刻间(档)26间,资本额5千多元。年雕数1.2万多件,价值1500多元,其工人日收入有时高达17元,低至9元,普通也有12元。

主要参考资料:

- 《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续编》1928年;
- 《广东北区善后委员会公署月刊》1928年;
- 《广东西北区绥靖月刊》1933年;
- 《广东全省地方纪要》1934年;
- 《粤汉铁路备览》1937年;
- 《广东统计季刊》1941年;
- 《广东年鉴》1941年;
- 《广东经济年鉴》1941年;
- 《广东省政府施政报告》1941年;
- 《两广工商经济特辑》1948年。

(作者是韶关市档案局副局长)

韶 关 运 输 行

陈业顺

韶关地处粤北，握三省要冲。自民国初期粤汉铁路通车之后，货物经此而转铁路可直达湖南、广州等地。加上韶关市属公路运输和浚、武、北江的航运，来往的货物转运繁忙。因此，韶关运输行业顺时势而兴旺。初时，有几家运馆建立起来。后来，随着代运货物的增多，发展到十多家。创始人有苏鹤筹、苏畅鹏、苏练（均为南海人）和邓鉴秋（韶关市人）等。这些代客运输的运馆，就是民间所说的三馆（茶楼酒馆、摊〈赌〉烟〈鸦片〉馆、运馆）之一。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广州于1938年10月沦陷，铁路交通受阻。这时的民间货物运输，大都由个体户（水客）经营。他们自营自运，随货同行。有些则以驿站方式靠肩挑人抬。更多的货物，还是靠水运。因而，这些代客运输的运馆相继停业倒闭。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百业俱兴，运输业又开始转旺。但多以广州为总行，而在韶关设立分行，重新组建起来。此时，这一行业不再称为运馆，都称作运输行。1946年2月，就有利通、民信、联成、联和、新中等数家。货物的运输量增大，仅以韶关而言，运出的资源矿产、土特产甚多。其中土纸、茶叶、瓜子、板鸭、禽蛋、药材、烟叶、木材等居首；从广州运来韶关，或从韶关而转运出去的，大都是工业品。如百货、布匹、水泥、玻璃、建材、以及家用简

单电器用品等。如新中运输行，1947年在韶关分行一年就运出南雄烟叶近2万草包；从赣南经韶关中转的生猪约5000多头。有一次用电船拖木船3条共载烟叶400多包。而一次运猪竟用了16个火车皮。可见当时运输行转运货物量之大。

运输行所收劳务费，一般为代付费用的百分之六、七不等，牲畜则更高。收入大、支出费用也大。因为不可预见费和预计费用所占比例多，只有争取营运多，才能获得较大好处。为争取多营运，各运输行很重视把好“三关”，一是服务态度好，把货主作客人招待食宿；二是货运快捷，使顾客的资金周转次数多；三是计价合理、公平，从而提高自己运输行的信誉。

运输行除个别独资经营（属小商贩性质）外，绝大部分属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成员对象集中在殷商富户，既争其“名气”，又争其掌握的货源，以达到营运之目的。而股东的投资亦有自己的两手打算，一是可得优惠收费待遇，二是可得精心关照货物。一般筹建时，占股多者当成为自然的经理人，但亦有以能力强，足可信任者聘之为资方代理人。运输行内部机构成员也得备齐。

因其受独立色彩的服务性业务所决定，运输行必须具备如下10个条件才可开业：

一、必须在经营线段的主要城镇设有分支机构，互相接应当地起点或终点的货物及中转的货物。如中新行（陈公言任经理），在广州设立总行，在韶关、南雄、赣州、衡阳、长沙、汉口、上海均设有分行或办事处。对于无分支机构的地区，则设置“联号”，代理本行委托的业务，委托行给其一定的报酬；

二、必须在货物到达目的地后，连同起始站所附计费单

据一并有人结算收费；

三、起点站要有熟悉业务，精通铁路规章制度和税务政策手续，尽快办理货物过境查验放行的人，职务称为“跑站员”。这种人文化不要求很高，但属于本行业能工巧匠的业务尖子；

四、每批货物同一终点者必须有随货同行看管的押运员。尤其是牲口，中途需要饲养，以免顾客遭受损失。所以，这些押运员必须是不怕苦、不怕累的人；

五、起点站要有办理铁路、航运、汽运的申请计划，联系派车派船、缴费、安排装车装船、准确计算容积、指挥调度搬运工人的技术人员。这是本行业的治“厂”能人；

六、必须有专职外勤人员。这些人要有竞争的思想 and 不断开拓新货源对象的应变能力。每日都外出联系客商转运商品往来去向的各种信息，而争取更多的交运货源；

七、必须自身有一批装运卸送货物的基本工人队伍，有看守员留守仓库，看管货场未运出去的货物；

八、必须有刻苦耐劳的高效率的业务人员。在派车(船)后的几小时内，能将客商交运的货物分清代支运费收费，按货主所运货物运价计算清楚，随货同行，以便货到收款。即便是半夜发车(船)，半夜要办妥。因此，业务员日夜基本留店，以便完成应急任务；

九、必须能垫支货物来途车船运费(叫包封费)的资金。又须有发点站至目的站所需全部费用的垫支。一句话，要有雄厚的资金为后盾。有些还设有贸易机构以利资金周转。在运输总行，还得为客商解决办理汇兑、搞活资金渠道、调剂余缺等问题；

十、需要配备必要的设备。如铁路部门派出平板高边无

篷的火车卡，必须有遮盖的帆布，做到随派这样的车皮随搭卡篷。对露天货场所堆放的大量待运货物，也需备有大量防雨的帆布和大量的垫货用卡板。还需备有照明和防护设施，使货场的货物堆到那里，那里就有这些设施。

抗战胜利后，韶关所开设的代客运输行，大都集中在东河火车站的站道路，自成一街。运输行的房子，都属竹棚瓦顶的临时建筑，防火设备简陋，结果于1949年5月14日一场大火，把它夷为平地，至使各运输行相继倒闭破产。

1949年10月7日，韶关迎来解放。大局稳定后，铁路畅通，货物流量增大，这给运输行带来生机。1950年，运输行又先后发展到12家。利通、联成、新中、民信、利商、恒泰、广韶、佐昌和专营运输三鸟的三兴、东南，还有专营运输牛只的合安、万生。除后4家专营外，其余8家，互相竞争，不择手段，十分激烈。

1950年11月至1951年1月间，办起了运输行的同业福利社，这是集体经济的萌芽。办社的原因、主要是缩小竞争，互助互利。但却因分配不合理，各店之间有矛盾，如业务大的店未能多得，而父子店却坐享其成，多营运的店吃亏而补贴其他店，结果，同业福利社仅办了3个月就流产还原。同年11月，又办起同业业务联营社，为运输企业合营作过渡。这次办联营社，总结前段时期福利社的教训，集思广益，采取了集中营运，“分灶吃饭”，按承运货物来源所收运费提成分配的方法，体现了多劳多得的精神。直至1952年2月1日，联营社同仁一致认为，现在条件成熟，应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走合营的道路，做到三集中（即资金集中、人员集中、劳动资料集中），成为一家企业。

合营社成立后，黄德甫任总经理，社里自始至终有固定

职工108人，分工明确，职责分明。领导敢管，民主空气浓厚，管理干部业务熟悉，还设有一位“顾问”，负责参事、咨询、协调人际关系。当时的机构，在韶关设立总社，广州设立分社，南雄和赣州设办事处。总社职能管理有如下四组：

总务组：负责文书通讯、职工福利、财产物资、人事接待工作等。

运务组：负责生产计划、调度安排工人、装卸、货场安全等工作。这是总社关键的经营部位。

业务组：负责结算运费、招揽货源、收集信息、业务交际等工作。

会计组：负责资金调度、核算本社盈亏、分析成本向股东报告、年终安排利润留成等工作。共11人，占职工比例的百分之十强，从中可见私营企业重视财会工作。

合营社成立后，其分配制度真正体现按劳分配、不搞特殊，不搞平均主义。每月每人平均发放伙食费15元，这是基本生活费。工资待遇差距不大，以每月工资计，总经理65元，副经理60元，组长50元，组员45元。工人工资分三等，最低的38元，最高的47元。由于该社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1953年被韶关市税务局评为市二家“查帐计征户”。1954年春节，该社还给每位职工一套新装，并以迎春名义邀职工家属几百人大聚餐。当时工人对合营社很有感情，有个搬运工人欣喜地说：“火车站有梁山泊（因职工恰108人），联合经营只一家，人强马壮齐羡慕、称兄道弟（彼此都与义哥相称呼）够气魄！”

合营后的货物运输量很大，每天进出口货物达50吨左右（平均每日一个40吨卡和零担货物10吨计），在合营后的一

千日的经营期间，代转运货物（包括零担）竟达5万吨。除此之外，还有大量输出的货物未计算在内。一、从韶关至北京、天津、唐山等地专运木材1500多卡，约6万吨；二、从韶关发至北京等城市板鸭（赣南一带货从韶转运）1700大桶、近200吨；三、从韶关发至广州纸把1300多卡，约4万吨；四、从韶关发至广州烟叶、生猪、药材、禽畜及蛋品、鸭毛等约1000车卡，约4万吨；五、从广州到韶关及经韶关中转到毗邻地市的百货、布匹、水泥、玻璃、钢材约2万吨。据不完全统计，共代劳转运的物货总计20万吨。

这种代客运输行，在当时的情况下，确是起到其应有作用的：它减少购买不多货品单位派员采购的麻烦，可用通讯委托运输行代提；避免了山区货物运不出去，而需要的货物又调不进来；可为客商办理托运、装车和押运货物的人力，为工业、农业、商业等的发展，提供了方便，亦为沟通城乡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发挥了作用。

运输行在兴旺时期的1951年成立了店员工会，全称是“韶关市进出口运输店员工会”。韶关市运输店员工会的成立，为团结运输工人给客商提供优质服务及谋取工人福利起到一定的作用。

1954年11月23日，这个经历了两年又十个月的合营社，因形势不断发展，掌握着铁路、公路、航运交通运输工具的部门各自开始办理货运业务和联运业务，使得代客运输的合营社货源缺乏，业务减缩，在这样的情况下，合营社只得歇业。

（文蔚整理）

连县的会馆和商会

周南杰

编者按：连县地处粤北，与韶关原有的市、县，有着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关系。为适应形势发展要求，该县今年已隶属新建的清远市。但这篇资料，对我们工商界仍有参考价值，故予以刊登。

解放前，连县会馆之多，在粤北各地是罕见的。有南海、清远、楚南、顺德、东莞、惠州、常宁、嘉应、江西、八邑（在星子）等会馆。会馆之兴起，一般都旨在利己利民，繁荣经济，是爱国家、爱民族的。现将它的建立和工作，分述如下：

会馆的建立与发展

连县毗邻湘、桂、粤边陲，汉代隶属湖南桂阳郡隋唐置连州郡，包括阳山、连县、连山三县，均处在崇山峻岭之中，文化、政治、经济、生产等方面都很落后。唐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韩愈被贬阳山令时，咏《湟水答张十一功曹》诗云：“未报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又说：“阳山是天下之穷处也。”连县与阳山接壤，也是“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自唐代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刘禹锡贬为连州刺史后，开始传播文化，形成连阳三属文化、政治、经济、交通中心。有湟川，全长181公里，水差

70米，虽弯多、滩险，仍可通舟楫，直抵清远、广州、三水等地。到了明末清初，连州市集初具雏形。开始有手工业作坊（打铁、织布、榨油）及一二间盐店。迄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州人绅士廖元章，独任盐务，负责连州及湖南部分县州，每人每月供应食盐九两计算，上缴盐饷给清政府光洋9500元，其中连县有5237元。到清代中叶，鸦片战争失败后（1840年）列强侵入，瓜分中国，霸占沿海通商口岸，掠夺经济，廉价收买工业原料和农副产品，从此，连县农村市集的自然经济，大大受到影响。1846年，南海县的商贾捷足先登，来连州从事商业工作，收购当地的竹、木、豆、油、米谷、生猪、药材等，运往清远、广州，又从广州运回食盐、洋油（煤油）洋火（火柴）、洋纱、洋布等商品。因有利可图，一传十、十传百，南海人来连经商的逐渐增加，生意日益发展。公益事业，也油然而生，这使南海商民安心定居连州。到了清代末叶，湖南、江西、八邑（在星子）会馆，东莞、顺德、惠州、常宁、嘉应等会馆，相应建立，连州更趋兴旺。到了民国时期，推翻帝制，军阀混战，铁路阻塞，湖南衡阳、永州、宝庆、宜章、临武、郴州、零陵、道县、兰山、江华和广西八步、阳朔等县商民，也来连州贩运食盐和洋货，并输出农副产品（谷米、豆油、生猪、药材、烟麻等）。到了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广州沦陷，在日军铁蹄下，粤汉铁路失控，物资阻塞，三省边陲等县，幸有连州湟川（小北江）可以通航，一切物资全靠水运。连县在经济上和交通上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城市。加上广州沦陷之前，广东省政府曾由广州迁来连县，各大专院校中学等40个单位，将近万人，也纷纷迁来连县办公和上课，这使连县商业成为最繁荣时期。据调

查，商户（包括工业）有6500户，从业人数有9600多人，其中大商户有40多户。杂货业有：利盛祥、福泰来、鸿兴庄、大信安、大同号；布匹业有孔怡记、成昌、聚和等。据统计，湖南人来连州担盐并带来米谷、豆油、生猪、药材等货的商贩，每天有2000多人，最多达4000人，约占连州人口五分之一。每晚连城郊翠仙街的伙铺都住满了。

由于各商店兴旺发达，会馆、商会对会员就抽收一定的福利公益事业费，如办育婴堂，设医赠诊，设立消防措施……他们都很乐意。会馆也有了群众的基础。

会馆概况

据了解，南海商人来连县经商，是较早的，他们资本大、人数多。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由于对外通商，中国的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资本，都乐于投资新兴工业。如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南海县创办了“继昌隆缫丝厂”，因此，南海商人也来连县寻找商场，认为连州是个好商埠，大可经营获利。此时，南海商人在连县占居优势，他们首先建立了南海会馆。到1888年，江西会馆成立。1891年至1892年，星子八邑会馆（南、番、顺、水、清等县）、楚南会馆又先后成立。从此，连县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被冲击解体了。

在清代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西学东渐记》一书里记载：“连州南风岭（南风坳）地处湘潭市广州之中央，为往来必经之孔道，道旁居民咸藉肩挑背负为生，劳动人民，肩货往来于南风岭者，不下十万人。”（笔者认为应包括湘粤沿途伙铺商在内）其时，通过东陂线和星子转运湖南货物

也不少。

上述的会馆，均在清代中叶产生的。其宗旨都是为本会馆商民在连县经商谋利益，互相团结、支持。如南海会馆商户，在生意兴隆时，捐资购买商铺二十多间出租，以其收入，兴办“达善堂”，使商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苦有所济，死有所葬”。并设立“秉义堂”和“敦义堂”，专司其事。

楚南会馆，设于抗日路（现连州镇二中校址），会员多从事小商，以挑盐、贩盐，开伙铺（供客商住宿。供炊具柴草，是较便宜的旅店）等行业较多。在公益慈善事业方面，仅亚于南海会馆。也办有乐善堂，请医生常驻赠诊。对会馆商人，老死无靠者，送棺还乡埋葬。其他八邑会馆、江西、东莞、清远等会馆，均有类此做法。

历史不断发展，形势也不断变化。民国初期，军阀割据，兵荒马乱，土匪蜂起，到处抢劫；抗日战争时期，抽丁捐税，敌机骚扰、日军进袭，人民生命财产，难保安全。各会馆也难于应付这个混乱局面。后经各个会馆馆长商议，缩小原有机构，成立广商会和楚商会，有些商会因人少，也加入广商会。据了解，如筹备捐款给国民党官兵时，广商会占派款的60%，楚商会占派款的30%，其他商会占10%。从而稳定了连县工商业的经营。

商会的成立

连县商会，最初有广商会、楚商会之分。民国后，改组成立县商会，会员系属广府籍商人，土商也加入。民国三十六年（1947）九月开始，辖有一、二、三区三个分会及十二

个团体分会、十六个行号会员，成为商界团体统一组织。实际是由广商团体所形成。

十二个团体包括：粮食、衣服、屠宰、盐商、烟商、国药、新药、火柴、卷烟等公会。此外，还有酿酒、竹木、杂货等十五个公会在连城；一区商会又有八个公会在连州；二区商会有三个同业公会在星子镇。由于广、楚商会共领导了二十八个同业公会，故对连县抗日前后的经济促进，起了一定的作用。

商会成立后，都订有章程。如广商会的章程是：

1. 以私人工商业及对外贸易之发展增进公共福利为宗旨。

2. 会员分为公会员，非公会员。无同业公会会员之工商业输出公司、行号，或他区、城工厂所设售卖场所，经依法登记者单位，加入本会会员者，为非会员。

3. 本会设理事长一人，常务理事二人，理事六人，监事二人，均由会员大会就代表中选任之。遇有缺额递补，以前任期满为限。

4. 会员大会，分为定期会议、临时会议两种。

5. 经费分两项：甲、事务费——由公会及非公会员负担；乙、事务费——由会员大会决定，经地方管官署，核准筹集之。

抗战胜利后，不少商户都返广州经营，人口大大下降。据1944年冬季调查，私营工商业有2,788户，从业人员4,200人。因主要铁路恢复正常运输，湖南来连州挑盐的也少了，这也是个原因；另方面，全国即将解放，工商界一些人有所顾虑，抽走资金歇业，也有关系。

广、楚商会主办的公益事业

一、慈善公益事业方面

1. 设立育婴堂（地址在烟墩脚）。目的是为了救济抚养无衣无食的贫苦农民遗弃的婴儿，或父母双亡的孤儿。

2. 设立回春所（地址在连州镇抗日路，以南海会馆为主）。对有病同乡、商民，如生活有困难的给予赠诊，聘请谢怀甫等医生常驻所内。

3. 设立达善堂（在抗日路），由广商会黄博庭、沈植生等人，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捐献千多元创建，每年聘请医生一人，驻堂赠诊，无地域之分，一视同仁。遇有贫穷者，赠医送药，死后棺殓还乡。

4. 设立乐善堂（在建国路）。由楚南会馆主办。光绪八年，由楚人创建，内分济生所、停柩所。济生所聘请中西医各一人，驻堂赠诊，赠药；停柩所，凡是楚商人如无依无靠者，死后无钱收殓，赠柩埋葬；每遇早年荒岁，施粥济贫。

二、设置五个水车公所，义务救火

水车形状如轿，两端有柄，手握用力压吸。水车公所，义务分工明确，各司职责。一是督令（会长负责）；二是击鼓鸣锣；三是在瓦面开火路；四是举喉笔射水；五是压水柜救火；六是收牌（清点人数）；七是持藤牌上屋；八是司钱奖励挑水（入水车）等。火灾一经扑灭，救火人员，奖以烧猪、烧酒。有义务而不到者，罚谷200斤或白银五元。这种做法，一直延到解放后五十年代。当年孔寿朋老板任会长期间，指挥过几场救火有功，群众赠以“见义勇为”横匾，藉以鼓励。

二、组织护商团

护商团配备枪支弹药，其一切费用，由商会向商户征收。执行之后，收到良好效果，很少被土匪抢劫。

四、捐款修建桥梁

如良江大桥。是由楚商会捐款建造的石桥。还有双溪亭浮桥，也是商会捐办的。

五、筹饷和派款

连州地处粤湘要塞，军阀过境较多，筹款任务，层出不穷。为了筹款、派捐合理，由商会统一筹划，使负担户满意。

六、支援红军和抗战

据说，红七军于1931年1月中旬过连州，而国民党县长叶日嵩的儿子叫放火烧城。红军将火扑灭后，人民无限感激。广商会派人送去烧猪十头劳军，表示谢意；又筹集军饷三万银元，支援红军。

抗战时，在连州南门设有“抗日献金台”，商民捐款，甚为踊跃，从沦陷区逃出来过的难民，商会都出款救助。

综上所述，会馆、商会的建立，是适应形势的要求，对团结商民、乡亲办理公益事业等，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作者是中共连县县委统战部干部）

曲江桥的倡建与设计

卞知

曲江桥（南门桥），于1935年4月竣工。它是韶关桥梁史上第一座钢筋混凝土桥。这桥的设计人，是著名水利专家麦蕴瑜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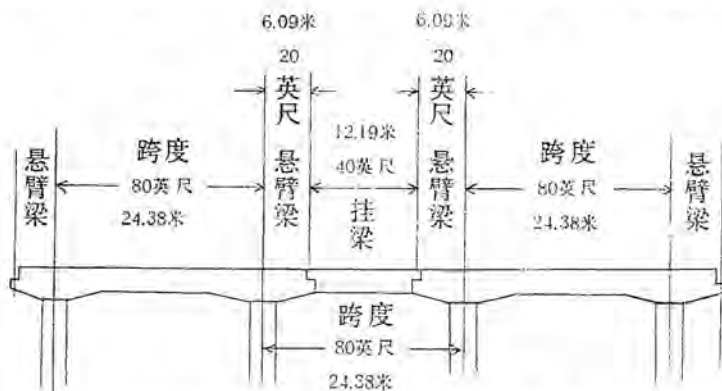
在这座桥未兴建以前，位于三面临水的韶关城，向来都是靠浮桥沟通东、南、西方向的交通。每年春夏季遇到浈武两江的洪水暴发，只得拆除浮桥，依靠木船横水过渡，据说，每年因翻船落水浸死的达二、三十人。特别是粤汉铁路广韶段于1916年建成通车后，韶关成了南北经济交流和物资转运的重镇，来往旅客、客商增多，货流量大，群众对建筑固定桥梁的要求更为迫切。1928年，由社会各界人士倡议，成立了“韶关市南门河桥委员会”，确定经费来源，主要以铁路火车货运及河运费加一征收和一部分捐助。后来，李汉魂任广东省西北区绥靖委员公署委员，驻节韶关，也感到要迅速将桥建成，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

李汉魂起初想聘用建筑广州海珠铁桥的德国马克顿公司担负建桥（铁桥）工程，但索价90多万元。后来，他们的建设科科长李袞卿因知道留学德国的水利专家麦蕴瑜在南路任广东南路公路分处处长时，曾设计一座长600英尺（183米）宽18英尺（5.49米）钢筋混凝土公路桥，具有建桥经验，便向他举荐。后请麦先生商议。麦主张建筑钢筋混凝土桥，认为除钢材需向国外购进之外，其余均可在国内解决。如水泥

可用广州西村厂生产的，这样可以节约不少外汇。粗略估算总造价只需40多万元，比德国专家设计的铁桥几乎节约了一半。麦说：为了节省外汇和人民负担，我愿意义务设计。李汉魂半信半疑，经过考虑后，才欣然同意。1933年将曲江桥设计图纸经由蔡汉升审定复经当时省建设厅批准后，招标承包，由孙炳南经理负责的一间南记工程建筑公司以44万元中标承包了。这间公司的经理、工程师、技术人员，经过调查、了解，都很称职和富有建筑几次铁路大桥经验，所以就交他们承包了。

1933年冬曲江桥开始动工，接着，因材料运输困难且遇洪水暴涨，曾一度停工。至1935年4月，才竣工通车。桥中部“曲江桥”石碑上三个大字由当时的驻军军长余汉谋所题写。通车仪式很隆重（李汉魂已他调），由韶关老绅士蔡溥泉剪彩。

根据麦蕴瑜先生的回忆，他当时设计的曲江桥，跨河部份全长256米，是采用“双悬臂梁”与“单挂梁”结合，缝



这是麦蕴瑜提供的曲江桥“双悬臂梁”与“挂梁”示意图

口是在双悬臂梁的末端，即使坏了或遭受破坏，也容易修复。到1988年止，算来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都没有出现事故，说明基础工程是牢固的。

1981年麦蕴瑜将所有该桥图纸和建桥前后的相簿两本交给当年在韶关的广东矿冶学院，后来赠送给韶关市档案馆保存。从所赠图纸中的《韶州市南门河钢筋混凝土桥全图》的原始资料看到，这桥的设计和施工是精密细致的，从趺、挂桥、悬臂桥、栏杆、路面、桥灯……都有工料项目、单价以及意外、工程管理费、承办人利益等；每期工程的设计人、制图人、审定人都签字负责，有每期工程的完成时间。全桥连同引桥和拆迁补偿费总造价数为482325.0元。

曲江桥是建筑在一条洪流汹涌的山区河流“湓水”之上。洪水时期有被山洪冲下的连根大树或漂流而下的杉排，威胁桥梁的安全。因此，曲江桥的桥梁底应高出前水历史上最高洪水水位5英尺（1.52米）。桥趺要顶得住漂流物的冲击。河中桥趺共十个。长20英尺（36.6米）双悬臂梁桥5道，长40英尺（12.2米）的挂梁6道，全长840英尺（256米）。桥东6个桥趺是采用10英尺宽（3.05米）、30英尺长（9.14米）的钢筋混凝土沉箱，挖到河床下20~30英尺（6.09~9.14米）的岩石上；桥西4个桥趺是采用红松木桩为基础，并用30英尺（9.14米）长钢板桩围绕，以防被洪水淘空木桩基础。

10个桥趺中有5个桥趺顶上埋藏一条略能摇动的钢筋混凝土横梁，高0.8米，宽0.5米，长6米，横梁底和面各加一块厚2厘米，宽30厘米，长6米的铅片，以承托悬臂梁。最重要的是单挂梁末端与悬臂梁末端的联合处。施工时先将两厘米厚，40厘米宽，6米长的不锈钢块置于梁凸出部份之

上，然再用同样宽的铜片，但厚度0.3厘米，置于该不锈钢片上，然后再用石墨粉末厚0.2厘米，均匀铺于铜片上，再用同样大小的铜片和不锈钢片盖上，然后灌注挂梁。石墨粉末是一种优良润滑剂。由于韶关全年温度差约摄氏30度，桥梁伸缩度很大，在设计与施工时应特别加以重视。

曲江桥以承载10倍重辆路机和每平方米人重400公斤为计算标准。

当时1：2：4的纯混凝土每立方米约38.8元，钢筋每吨264元，钢板桩每吨220元。

韶关商品的流向

砚 农

粤汉铁路未通车前，韶关大部分商业都是零售业，只有少量批发，供应本市及曲江、仁化、南雄、始兴、乐昌、乳源等县。迨粤汉铁路通车后，形势大为改观。当时食盐、煤油、火柴、香烟等大宗商品，都可由火车运至韶关，因此，批发业务相应发展起来，业务亦延伸到湘南、赣南各县。由于当时未有公路通往各县，陆路只靠肩挑运输，商品流量仍不大。后来，一些商店通过与南雄、乐昌、坪石、仁化城口、长江等联号合营，用木船水运，使市场更加活跃起来。南雄则销往赣南的大余、信丰、崇义、上犹、南康及三南等地；长江亦销至崇义、上犹；乐昌、坪石则销往湘南的郴州、宜章、桂东、桂阳、汝城；城口则销往桂东、桂阳。营业额相当巨大，韶关整个零售业，望尘莫及。

经营批发业的，大部分都是资本比较雄厚，粤北各地均有联号，加以享有代理权，生意稳操胜券的。如慎安代理美孚，常丰代理德士古，使煤油几乎属于专利，别人难予与之竞争。火柴、香烟，亦有代理；食盐则属专卖事业，非有财有势，不易承包专卖。除上述商业外，布匹、百货、五金、日用品、咸杂，亦有部分输往湘赣，而当地的土特产，如郴州的茶油；桂东、桂阳的红豆、三鸟、蛋品；赣南各县的土纸，南安腊鸭，信丰瓜子，塘江蜜枣及菜丝、菜条、鸡鸭等，亦不断输粤，互相交流。广州沦陷后，食盐、煤油两宗

来源困难，而敌机又经常对韶关空袭，富商跑往港澳，大宗批发几乎陷于停顿。不久，芦苞、沙坪开放，下游物资均集中此地，走帮客商即从此地将大量商品运至韶关，市场又复活跃。加以湛江、鲨鱼涌及江西等公路均已通车，大量物资也从湛、鲨运来，其中主要的有洋纱、汽油、煤油、颜料、海味等。这时，韶关的代客行亦纷纷创立，有如雨后春笋，批发业务又进一步兴旺。除粤北土纸流向下游外，其余大宗商品，运往湘赣全省。长沙、衡阳、南昌、赣州还派有专人来韶采购。赣州的土特产亦不断用汽车运抵韶关，然后交代客行销售；卖出后则买回食盐或当地短缺的商品回去，熙来攘往，货如轮转。

日本投降后，部分原广州或香港商人均返回原地开业，但韶关市场依然繁荣如故。其中尤以花生油最为活跃，每天成交达100桶以上（每桶约100市斤），全部均由广州油商购买，出口香港，成交额破韶关商品纪录。茶、生油产地为郴州、赣州、塘江等地。这些产地油商，经常运来托售，其余韶关都派人到产地进货。经营者既要消息灵通，又要配合得体，否则便要吃亏。因金融动荡，纸币贬值，消息不灵，便会被人“放盆”（倒闭的意思）；配合不好，销出迟滞，卖出货款就不能买回原商品出售额，所以商店与采购员每天至少通一次电话，互相通报行情。如涨落稍有苗头，立即再用电话通知。其次，当放盆前，必先通知采购员马上进货，进得三十桶则放盆三十桶，成交后不用顾客交款，只要他挂电通知广州该号，限当天将款送某路某号便可。自己的采购员在产区进货，也不用付款，用电话通知商店将款交广州某号。本号卖出货后，将这一责任委给买方，依时交到，这就是先进后出，避免货币贬值。而产区油商，则在广州设有庄口，当

天销售货款，当天都可在广州收到办货，也不会吃亏。各方为了维护自己信用，从来没有爽约。这是金融动荡时期一种独特的交易。（韶关市工商联供稿）

我国历代都城所在地

- 商（后期）——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
西周——镐（hào）京（今陕西西安西南）
东周——洛邑（yì）（今河南洛阳）
秦——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西汉——长安（今陕西西安）
东汉——洛阳（今河南洛阳）
三国：魏——洛阳（今河南洛阳）
 蜀——成都（今四川成都）
 吴——建业（今江苏南京）
西晋——洛阳（今河南洛阳）
东晋——建康（今江苏南京）
隋——大兴（今陕西西安）
唐——长安（今陕西西安）
北宋——东京（今河南开封）
南宋——临安（今浙江杭州）
西夏——兴庆府（今宁夏银川东南）
辽——上京（今辽宁巴林左旗南波罗城）
金——中都（今北京）、开封等地
元——大都（今北京）
清——北京（今北京）

粤北名果南华李

江作良

韶关南华李，早负盛名。据说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当初，比较大量的是产于韶关与马坝之间的落春坪、山子背和附近乡村。二十年代期间，每年的产量有数十万斤之多。后来，韶关东北部乡村如新庄水、周田和湾头等地，也有种植生产上市。但从果形与味道，都比不上上述产地之佳。落春坪等地出产之李，皮青爽脆，肉甜滑，核边肉亦无酸味；李形亦有区别，它是圆中带长形，李身带扁，底部平凹，面上有微薄灰白粉状，因而，内行人一望便知真伪。有人分析，南华李之所以质量优良，是因有扶溪的流水。

韶关南华李，是与韶关互为关联的。由于南华李质佳味美而驰名中外。来韶关的旅客、客商，必然会谈起南华李。每年南华李成熟之时，凡有来韶之旅客，均以能亲尝佳果为快。如离开韶关，亦购买携回送给亲朋（当年贩卖者，皆用特制的小、中型的竹笼装载。）据说，清朝时期，此李还是一种贡品。

南华李成熟期，约在农历六月间。在那时，市场供应，真是盛极一时，有商店摆卖，也有街边摆卖，有的挑担过街叫卖。在大商店出售的，如风度中路的“盛合”、“和利”，风度南路的“陈兴记”。由于他们货式多，服务周到，所以在那时期，他们的销流量是首屈一指的。

在1930年前后，本市北镇街（原民生路，现为东堤北

路)，有间“常兴”豆豉铺，该店在韶关东南面的东联地区大莲塘开设一间果园，以种植南华李为主，蜜桃为副。它生产出来的南华李，皮薄爽脆，肉滑清甜，比其他地区生产的，更为优美。据说，年产量约三数万斤。在上市时，每天运来二、三千斤，货到即售光，因此有不少顾客，要求定货。日常在店门所销的，实际均是“脚货”而已。

南华李佳果，久已驰名，由于历史上种种原因，正宗的南华李几乎绝迹，甚感可惜。这种佳果落产韶关曲江，可能与气候、水质、土壤有极大关系，确实值得研究和广为栽培。（韶关市工商联供稿）

抗战期间韶关的故衣业

砚 农

广州沦陷后，广东省政府初迁连县，再迁韶关。人口突然增加，住的问题最为突出。原有房屋，无法容纳，迁来的人大感困难，租赁既无可租，自建又经济条件不许可，最后只好在郊区搭建竹棚木屋或竹织批荡房子，暂作栖身。继而香港沦陷，爱国人士都不愿在敌人铁蹄下生活，纷纷逃回内地，投亲靠友，另谋出路。韶关成为全国的南大门，联系各省交通比较便利。故由港回国的各省同胞，均先驻足在此，然后转车北上。因此，人口更多，房屋更为紧张。市面出现一片虚假繁荣。风度路一到下午及晚上，人如潮涌，熙熙攘攘（上午走避空袭）。

一些港澳同胞滞留韶关，有些投亲不遇，所谋未遂，加以盘费所带无多，坐吃山空，生活困迫。在无可奈何之际，只得将自己所带衣物、手表、日用品等进行拍卖。最初，韶关市内，只有一两档，随后，多至十多档、几十档，均集中在原罗沙桥西岸左侧的山坡间（现武江北路）。初时，每人均是一个皮筐或一手提包，用报纸铺在地下，将物品摆出待估。露天设档，彼此相连，成行成市。所摆物品，大部分为衣物，有毛料西装衫裤、毛料唐装衫裤、男女绒褸、羊毛外套、羊毛内衣裤、羊毛袜、机恤、毡帽、尼龙袜、皮鞋等。此外，还有手表、烟斗，派克笔、西非利墨水笔、餐具、小刀、指甲钳等等。化妆品有香水、唇羔、胭脂、指甲水、香

皂。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在当时内地一切物资奇缺的情况下，摊档所摆之物有的虽为旧货，亦能引起人们兴趣，抢着成交。市内居民每天早上均要走避空袭疏散到郊外，无所事事，都乐意到故衣市场看看，遇到有适合自己的东西，买回一些，因此整个上午，故衣市场人头涌涌，甚是热闹。至于摆摊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无不衣着时髦，不敢说他们是穷苦。由于故衣畅销，有的人就前往沦陷的广州及沿海地区，搜罗大批故衣、日用品运韶应市图利，并以此为职业。这种状况延续了两三年之久。

郊外市场每天只有半日生意，而且要摆摊抛头露面，有所不便。有些充裕者，即在风度北路正式开设了两间拍卖行：一间在原中山公园前江福记隔邻（忘记店名）；一间在原风度楼靠西北边附近，名“中原拍卖行”。除自营外，还代客寄售衣物、手表、玉器、项链及一切物品，成交后收取百分之五手续费。手续是将物品交其估价挂牌，如认为估价太低，也可以自己作价，摆出几天如无人问津，可以改低牌价，仍卖不出，可以收回原物，不收手续费。如确需急款应用，也可按照估价再低一些卖与该行承受，双方自愿。这两间拍卖行开业后，郊外市场仍然活跃，一个时期，还发展到南门原飞机场（现中山公园）一带，也有流动兜售的故衣小贩，直至韶关沦陷。日本投降后，港澳及广州人士纷纷他迁或返回原地，故衣贩运者大量减少，因而再不成为“行业”了。（韶关市工商联供稿）

“大三元”的创业与经营

刘荣忠

韶关“大三元酒家”，创办于抗日战争期间的1941年，1942年春正式开业。酒家设于韶关的闹市区风度中路。它的前身是“大同酒家”（地址在现在的人民戏院）。因大同酒家被日机炸毁，大三元酒家便在这片瓦砾中重建起来的。

起初“大三元”是由刘荣忠、黄甜集股合资经营，共有股份40余股，每股资金是当时的法币5千元。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后，由一些外地疏散来韶的饮食业爱好者符盈、符英、符炯、宾颂硕、杜荣坤、曾宇生等集资租赁一年，接替营业，改名为“大三元胜利酒家”。一年期满，经过双方协商，同意新、旧股合作经营，一直到解放后参加公私合营。

大三元酒家面积有200多平方米，有二楼一座，除生产部使用的面积外，店堂可安放方桌110多张、座位400—500多个。

经营各式茶点、粉面、饭菜、烧腊等，承办大小筵席、社团按位数包餐。此外，还经营中秋月饼等。

经营时间分早、午、晚三市。早市：6时—9时；午市11:30时—下午2:30时；晚市：晚上7时—11时。这一日三市既有重点，又有变化。早市，以供应各式茶点为主；午市则以粉面、锦卤云吞为主，晚市除经营饭菜、承办筵席外，着重供应甜品、夜宵等，另外，还有著名的鸡鹅饭，作为快餐。

筵席饭菜，不论煎、炸、蒸、炒，都保持传统制作，讲

究刀法、锅气、调味、芡头。如点心中的干蒸烧卖、排骨烧卖等，虽然是一般品种，但制作和配料都相当讲究，干蒸烧卖的面皮，采用传统的春皮制作，馅料鲜美甘香；排骨烧卖，用豉味调和；叉烧包，带有蚝油味。菜式方面，推出有特点的太爷鸡、煎软鸡、炒鸭掌等，均受到食家的称赞。中秋月饼都特聘名师巧制，材料真、斤两足。

经营宗旨，以忠诚、实惠、清洁、卫生，薄利多销、信誉第一为本，博得顾客的好评。

对业务的管理，采取民主管理，分工合作。设经理、副经理各一人，内分点心部、厨房部、楼面部、保管室，以及采购、验收、会计、出纳都各有专人负责。除经理脱产外（负责巡场），其他管理人员一般都是半脱产。全店在业务旺盛时期，用110多人，冷淡时期只用70多人。

在工资方面，采取收入提成，分下栏为主，固定工资只有三几元。提成工资（包括下栏），每五天分一次，按每天的营业收入金额总数的10%扣出；“下栏”包括瓜子、芥酱（除出本钱）以及三鸟的内脏、毛、血和一些下脚料、顾客结账时剩余的小费等。分配办法，按工作人员的职务定分，等级有：一份五、一份二五、一份、七五、五成共五种。职工的收入，随营业额多少而定，水涨船高，使职工能安心、积极。

全店职工一日三餐膳食、每月二次和节日加菜全部由店里负责供应。职工都很满意。

大三元酒家，从开办到解放后加入公私合营，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主要是坚持了民主的分工和管理，职工各守岗位，各司其职，树立“以店为家”思想，不论业务是盛是衰，做到同甘共苦，因此，一直能维持下来。

（韶关市工商联供稿 骆文整理）

解放前韶关市粮食商业概况

蓝江 杨枢华

在旧中国，由于长期受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缚，粮食生产上不去，故商品粮一直供不应求；加上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军阀战争，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反人民的内战，使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的破坏。因此，粮食问题，也一直成了一个难治的“痼疾”。现就解放前的韶关市粮食商业变化情况，作一概要的整理，以供参考。

一、集市贸易

韶关市位于广东的北部，是岭南山地的中段，地形结构上属于华南褶皱带的一部分。境内山峦起伏，山地丘陵居多，是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区。是具有鲜明的山区特色的农业经济地区。粮食作物的耕地面积，较集中地分布在蔚岭、大庾山系、大东山石人嶂山系和起微山系三列山系之间的盆地和谷地及南武两江、北江、小北江、南水、翁江等沿河两岸的平原上。地势大体是北高南低，落差很大。在粮食生产上，发展很不平衡。一般是平原地区粮食产量较高，山区较低。平原地区的粮食一般能自给或有余；山区和经济作物区则粮食不足，需从余粮地区购买。因此，粮食的调剂余缺，在韶关显得十分需要。

历代的统治者在粮食管理问题上，是“只管军需，不管民食。”有的虽然也在粮食管理上颁布过各种禁令和条例，

但始终是一纸空文，收效不大。因此，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粮食的自由贸易市场，以此互通有无，调剂余缺。这种习惯，历代相沿。

粮食的集市贸易，是按各圩镇所定圩期（一般隔五天为一圩）进行的。凡圩日便把粮食集中到市场，产需直接见面，双方议定价格成交，是一种自由贸易的形式。这对当时调剂粮食余缺，起到了一定作用。如韶关市区以每月的一、六为圩日，谷米分别集中到两个市场进行交易。米市设在旧米行街的沙坝（现曲江桥南头沙坝）；稻谷集中到三界庙兴仁里空坪（现解放路风度园内）。在各县，大致相同，如南雄县的粮食购销活动，也是逢圩日集中在两大市场，一是县城的关帝庙（现八一路八一小学）；一是农村的新田圩（现乌迳区新田乡）。据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广东年鉴》记载，前清年代在韶关市区设店经营粮食的，仅有杨耀南一户，他投资2000元（大洋），在北直街开设荣福米店，这可能是最早的了。至民国元年（1911年），有五户，其余大部分是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以后才陆续设店经营的。这说明了粮食集市贸易的习惯，一直保持至清代末年。

二、资本主义粮食商业的兴起和发展

随着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韶关市的粮食商业，有了巨大的变化。原有的谷米市场逐渐消失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粮食商业取而代之。从产需直接见面的自由贸易，转变为中间剥削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特别是1938年广州沦陷后，韶关市成为广东的战时省会，南雄、始兴、仁化、乐昌、乳源、连县、连

南、阳山等地均驻有省属机关。市区人口激烈增加，粮食销售随之增大。这时粮食商业，已为少数粮商所垄断。1942年，韶关市区共有大小粮店64户，总资本额为178,410元（大洋），其中同裕、利农、阜民三户粮行（兼米机）就占102,000千元，为总资本额的57.17%。又如南雄县城共有私营粮商133户，总资本额300,009,900（旧币）。一般中小粮商资本，是一两千斤谷至一万斤谷，绝大部分资本为农工、陈致记、朱以和、美丰等四大粮商所有，故有南雄“四大天王”之称。他们以资金多，有储粮仓库，对粮食有能吞能吐的优势，可以人为的制造粮食失调，进行抬价压价。新谷上市时就压价收购，大批地收购储存，待青黄不接的荒月时，就抬价销售，从中牟取厚利。根据曲江县粮食志资料载：民国二十九年六月（1940年），本市市场大米平均每司码斤国币0.16元，花生油每司码斤1.20元，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八月，粮食价格上涨已势不可挡，虽然当时政府采取限价销售办法，但粮食操纵在私商手中，加上国币连续贬值，大米价格每司码斤涨到国币58,170元，上涨36.4万倍；花生油每司码斤国币28万元，上涨23.3万倍。

由此表明，解放前粮食商业总的情况是错综复杂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三省边界粮食的交流，但由于粮源匮乏，一些私商操纵粮食市场，粮食价格剧烈波动，人民群众也曾经深受其害。

生活书店曲江支店琐忆

毛 丰

1938年秋广州沦陷后，韶关（曲江县府所在地）就成为广东战时省会了。它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

我先在长沙参加生活书店工作，后因湘北大会战，当局下令紧急疏散撤离。书店按总店指示，迁到曲江建店。书店经理为严长庆（解放初在上海书店工作，已离休）。我们书店设在韶关最热闹的风度中路。是一间后半部早被日机炸毁了的破房，但铺面还好。原店主人，不知逃往何方了。我们当时因陋就简，做了几个木书架，钉在两边墙壁上，同时做了两张长方书桌放在店堂中央。门面、门板及骑楼砖柱，全漆成黑色，写上“生活书店”标准白色字体，“曲江支店”也是白色美术字体，是黑白分明之意。这是全国所有生活书店统一的装置。

我们将长沙撤退时运来的书刊摆上书架，不择日子，不请任何达官贵人，不燃放鞭炮，布置就绪后立即开业。门一开，读者一下子挤满店堂。不但读者高兴，全体工作人员亦忙得不亦乐乎，连中午饭也忘了吃。

平日，只要天气晴朗，驻在广州的日军飞机常常出动，飞来韶关骚扰。韶关瞭望哨防空人员一高喊：“敌机×架，在银盏坳方向北飞”时，我们就关闭店门，和市民一起到郊外疏散躲避。只有晚上或阴雨天，才比较安静。但晚上电力

不足，电灯半明半暗，往往要加开煤油或煤气灯，很不方便。

当时的国民党当局，设了一个“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地点在风度北路×号院内楼上。该会向有关部门发出通知，通知规定，所有各地出版的书籍到韶关出售的，一律要先送审，待他们审查认可后，才能出售，否则后果自负。凡收到寄来或托运来的书籍，一律每种抽出一本送去待审，过几天后取回。他们认为书籍中某句话有问题时，就用笔蘸上红墨水涂去，我们就依送审样书模仿他们的做法，也是用毛笔蘸上稀释的红墨水涂上。这样，不但使读者能看清原文，而且起到更加提醒读者注意的作用。后来他们又不准用红墨水涂抹，而改用黑墨汁涂盖，但我们还是依旧炮制，用稀释的淡墨汁涂抹，使读者仍可隐约看见原文，这也是一种巧妙的斗争方法。再是新来的显眼的书籍而又数量不多的，我们就不送审，也不公开摆出来，待熟识的读者到店，便偷偷地介绍给他，他们都很高兴地买去。

生活书店是一个进步的书店，在它出版和发行的书籍中，一向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这对国民党反动派来说，是一件最头痛的事情。他们经过出谋划策后，就在生活书店对面，由第七战区政治部出面，开了一间“动员书店”，与我们争夺读者。动员书店开业后，门可罗雀，而我们生活书店照样兴旺拥挤，只可惜铺小容纳不下很多人。他们在发行上斗不过我们，便老羞成怒，使出最后一招——封门、抄店。他们抢走文件、信件，连店员私人的书信也被没收；我也被抓去关了一晚。审问我时，我坚持说自己是一个煮饭的，什么事情都不知道，第二天才被释放。经理严长庆，该晚因外出未被抓到，次日，他第一步就是到处奔走，想法营

救被捕的店内员工。第二步向当局交涉启封。他打听到原十九路军总参谋长蒋光鼐将军当时也在七战区司令部任参谋长，决定请他帮助。因“八·一三”淞沪抗战时，上海生活书店曾发动各界人民捐献财物，支援过十九路军抗日的一段历史。通过蒋光鼐将军出面与当局交涉，生活书店终于得到了启封。书店被查封后又得到启封的事，在蒋(介石)管区是没有先例的。但书店启封后不多久，却被日机投弹炸毁了。

以后，我去了桂林的生活书店。

民国时期韶州货币流通概况

金 戈

辛亥革命后，广东政潮迭起，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残余势力仍然统治着经济领域。韶州（韶关市）地处北粤门户，素为政治金融敏感地区。随着商品交往，货币市场华洋交错，币制紊乱，圆、毫、纸币汇集，低质圆毫充斥。纸币面值常因政治影响，屡起挤兑风潮，商民深受其害。现将民国时期韶州货币流通情况，见闻所及，简述如下：

金 属 货 币

广东货币自成系统，与中央素鲜联系，而自铸金属硬币，其重量、成色亦各有不同。

民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政府公布“新国币条例”，整顿和统一银圆，规定一圆银币为国币，即本位币。至此，中国的货币虽然在理论上已经统一，但因银两两制仍继续存在，遂形成两圆共用之双重币制。银圆因易于鉴别，交收方便，广为流通，但各省铸造版类不一，成色参差不齐，在流通中亦带来很多麻烦。

一、银圆

银圆，俗称大洋，是旧时使用大型银质铸币的通称，银本位铸币中的主币。粤省通用银圆，一为自铸，一为外地流入。银圆的种类不下几十种，形制多样，印材各异，“新国

币条例”规定，重七钱二分、成色银九铜一，后改为89%。韶州流行的银圆有如下几种：

大清银币，清季铸，正面有“光绪元宝”、“宣统元宝”两种，背面是蟠龙，故称龙洋，成色为902.70%。

袁头洋，亦称大头，币面铸有袁世凯头像，于民国三年十二月及次年二月在天津造币厂及江南造币厂开铸。“五四”运动后在金融市场上取代“龙洋”，起过主币作用。

船洋，又称孙头。民国十六年（1927年），北伐胜利后，国民政府禁铸“袁头洋”，改铸一面为孙中山像，一面为帆船的银圆。从此旧中国境内外国银圆渐被淘汰，而代之为“孙头”和“袁头洋”广为流通。

“烂版”，旧时钱商使用银圆时，在币面加盖硬印以示保证质量，每经一次手，便加一印，如是币面打满硬印，银圆逐渐失去原形，最后只得按重量计算其价值。

至于流入银圆，除各省流入者外，尚有由外国流入的，如墨西哥鹰洋、西班牙本洋、英国站洋、日本龙洋、越南银圆和香港银圆等，其重量及成色各有不同。外国流入银圆大部份在清康乾年间英商东印度公司为采购中国茶叶而输入，数达一亿元之巨。

二、毫洋

毫洋俗称银毫、毫子、小洋，有五角、二角、一角和五分。因其大小适中，交收方便，实际成为粤省通行的本位币。一切公私款项的收付和契约的订立，均以毫洋计算。在韶州流通的有清季龙毫、广东、广西、漳州和八属毫等。二角毫洋又称“双毫”，重一钱四分四厘，成色银七、铜三。广东双毫成色一贯较为保证，深为群众喜予乐用。八属毫俗称十三年毫，是桂军在钦州、廉江等八属地方私自铸造的，

成色只有41%。这批低质毫流入市场后，惹起很大风波，故予低折行使，这给货币市场，造成很大混乱。为此，民国十七年（1928年）四月，广东省政府决定将十三年双毫，按成色给价全数收回改铸，以保信誉。

三、铜元

铜元，俗称铜仙、铜板。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为广东首铸。因其形式新颖，颇受群众欢迎。每枚重二钱，成色紫铜95%、铅4%、锡1%，直径28毫米，圆形无孔。旧时韶州流行的铜仙，因受外省铜元的影响，兑换价依供求而定。后因铸造铜元有利可图，各省竞相鼓铸，使市面铜元大增，故与银圆的兑换率逐渐跌落。民国十六年（1927年）每枚双毫可换铜仙36枚，据韶州《民国日报》登载：“民国二十三年旧岁，由于湖南铜元大量涌进，韶州铜元大跌价，每双毫可换铜元60枚，若大批购买每千枚值银圆二元三角三分，因铜元之一再跌价，至使本市（韶州）专营找换铜元小贩即已绝迹”。

实行“法币政策”后，铜元也在禁止流通之列，规定铜元兑换价为每元兑二千文。从此银本位的金属硬币，随着币制的改革，退出了货币的历史舞台。

纸 币

广东发行的纸币，莫不以兑现为发行之保障，所谓兑现，实则准备金异常薄弱，且纸币之发行在粤省还政中央以前，向为政治势力所支配。特别是北伐军兴，支应浩繁，调拨接济任务，悉由广东独负，迫得多印钞票，致使发行与准备基金之间，差距愈拉愈大，成五与一之比强。因之人民对

于纸币之信心日淡，投机者每藉政治事故或谣传，而从中渔利。故政局每有风吹草动，即生挤兑风潮。银行初则维持，维持无效，则宣布停兑。停兑以后，另起币名又复发行。辗转循环，为害不浅。

广东流行纸币：一是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国币；二是中南、四明、中国、农工、中国通商、中国实业、中国垦业、浙江兴业等七家商业银行发行的法币；三是中央银行（广东省银行前身）兑换券，广东省银行银毫券、大洋（地名）券和广州市立银行凭票等；四是外国纸币，如港币、美钞和美金。前三者均为韶州流行的主币，后者在韶州外侨中（大部份是教会神职人员和涉外企业）如韶州飞机制造厂）的高级职员中偶尔见到，至四十年代后期，法币行将崩溃，斯时外币已泛滥成灾。

一、1914年，北洋军阀政府颁布《国币条例》，规定国币单位，定名曰“圆”。中、中、交三银行、后增加农民银行发行之纸币，乃旧中国规定银本位货币陆续发行之纸币。

1935年，国民政府废止银本位制，采用法币后，一般对法币仍沿称国币。其发行、流通、崩溃经过，成剑萍在《四十年代韶州金融概况》中已作粗略介绍（见《韶关文史资料》第七辑）。

二、全国七大商业银行发行的纸币，抗战期间该币在韶州大量流通，但纸厚质劣，规格比其它纸币略大些。迨于1944年间在韶州发现该币低折后，由银行陆续收回。

三、银毫券，广东省银行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五月十二日开始发行银毫券新币。为求统一全省币制，遂将前中央银行、广东中央银行所发行之兑换券全部收回，改兑银毫券新币。银毫券新币面额有一千元、五十元、五元、一

元、五角、二角、一角、一角七种。票版有美国钞票公司、华中书局、新华公司等版本。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八月为因应军事之需要，乃设立韶州支行南雄办事处驻庚兑换所，发行南雄大洋地名券。

货币改制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十一月四日，中央货币改制，七日，粤省陈济棠政府亦宣布货币改制，意与中央规定有所区别。禁止白银流通，规定银毫比率加二，大洋比率加四四。

货币改制，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项创举，放弃银本位，实行纸币制，为旧中国紊乱金融，切除了民国以来在货币流通中长治不遂的隐症。

广东还政中央之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六月二十日，财政部对广东银毫券颁布“确定比率完成币制统一办法四项”规定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一月一日起，所有粤省公私款项，及一切负责交易的收付，与各项契约之签立，均应以国币为本位”。广东省银行，广州市立银行所发毫券自即日起，由中、中、交三行及广东省银行，按照比率负责以国币陆续兑回销毁。省市银行所发毫券，自二十一起，以一四四法定比率折合国币一元。在年底前，按比率照常行使。

货币改制之后，旧中国金融出现一个新的形势，人心安定，物价平稳。在韶州，墟期农民出售早白米，国币一元可买十八斤；最大的油店慎安（现东堤横街一号），零售土榨生油每司斤国币三角左右；风度中路的张丽珍金铺，几年来在曲江《民国日报》连续刊登该铺黄金市价；民国二十三年（19

34年)五月八日黄金每两估出为160元,收入158元。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六月黄金每两估出150,收入149元。两者比较,韶州黄金价格,在货币改制前比改制后有所下降。

广东省银行为支援收买白银工作,调集银毫券二千万存放韶州支行,为粤北地区收买白工作,准备了充足的支付力量。为此,广东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莫雄密电训令“全区军警对这批钞票过境时应严加保护”。

韶州支行由改制起至国民二十五年(1936年)底止,共收买银毫96万余元,大洋73万余元,两者折合银毫券220余万元。

物价飞涨与对日斗争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同仇敌忾,为中华民族存亡抗战到底。

随着战争的深入,沿海港口,继则全国大片领土沦为敌占区,使中国的工业基地、税源基地、产粮地区逐渐丧失。另一方面,因战争向后方转移的人民愈来愈多,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的需求大增。为此造成物质奇缺,粮食匮乏,税源枯竭,从而迫使物价猛涨。

再因战场扩大,战线拉长,兵员增加,战费耗巨,使国库开支,跳跃上升,赤字惊人。政府为了应付庞大的战费开支,弥补资源消耗,除仅有的一些外援及在国内发行公债收入之外,只能靠增发纸币,或偶尔抛售外汇以弥补财政收支不足。因八年抗战期间法的发行量直线上升,发行增至5569亿,为战前的39484倍,法币面额由一元增至十万元,物价的涨幅平均为战前的三千倍,使法币频近崩溃边缘。中国人

民忍受着通货膨胀的痛苦，在两个战场上（军事战场、金融战场）与日本侵略者不懈战斗。

日寇为破坏广东货币，一是破坏法币与毫券之比率；二是搜括法币与毫券，套取我国外汇；三是伪造我国货币与假港币偷运入广东各地，从中破坏中国金融。

关于破坏毫券与法币的比价，敌人始则提高毫券比值，并将毫券区别为美版、中华书局版、大洋改用版及市立版数种，特别提高美版毫券价钱，低折其他各版，而其低折之程度，又视面额之大小而异，面额大者折度愈大，1939年八月间在港澳黑市场中，法币一元可兑美版毫券八毫半，因而内地此种钞票，均向沦陷区及港澳等地流出，其后人民多以此种纸币价高，不愿按照一四四比率放出，故收藏不用者亦不少，且毫券因面额小者之比价高，面额大者之比价低，以至面额小者之毫券，非被收藏图利，则为沉淀社会，使市面交易，至感不便。

广东省银行为打击敌人此项阴谋，即将被低折之其它各版券设法收回，尽量放出美版券，使各版毫券不发生差价，又陆续发行新省券，使毫券与法币法定比率，得以维持不变。敌人见计不售，一反以前政策，转而将法币提高、毫券压低，使毫券与法币之法定比值，低于一四四定率，因此省银行又改变方针，减少毫券流通量，并为防止敌人夺取我国外汇，规定凡持毫券向香港分行兑换法币者，一律发韶州分行汇票，以免落入敌手。

日寇破坏广东货币阴谋一败再败，民国三十年（1941年）复操纵银商转向对法币券身挑剔方面下手，利用中、中、交、农四行的差别、纸质新旧、直版与对折版的差别、同一银行而版样不同或颜色不同也有差别、连孙中山头像的

大小都有差别等不同样式，对钞票制造差价，妄图动摇法币本值。

广东省银行采取对策是：组织力量，从狮岩金库的库存法币中进行拣版整理，及时运送至接近沦陷区的基层网点，对敌人制造差价之券类进行相应的补充，使之平衡流通，差价没有市场。

日本侵略军在广州市汪伪傀儡政府中的中央储备银行、汪伪广东省银行、兴华商业银行发行的中储券和兴华券，强迫敌占区人民使用，以其从敌占区人民手中攫取大量的法币、毫券等现钞，用以向我国内地套购物资。

日本特务机关伪造法币、毫券与假港纸等，以广州为基地，在爱群大厦九楼“台湾银行出張所”内建立转运伪币据点，将伪币偷运入广东各地，企图从中破坏中国金融，在动荡的通货膨胀中，动摇抗战力量。笔者见到的伪币，全都印刷技术不精，图案不清，号码印字浮散，纸质粗糙，纸面过腊。这些赝品，稍有交收经验的工作人员，一识就破。

欧战发生之后，日寇对香港虎视眈眈，港中形势紧张，广东省银行对此高度警惕，当即将存港银毫券二千余万元分批空运桂林储存。由于早取措施，避免了一场损失。

1941年12月25日香港失陷，日本侵略军将香港汇丰银行印存港纸一亿一千余万元，强迫该行大班签字发行。这批“迫签”港纸扩散到广东各地，在韶州也为数不少。日本投降后，香港汇丰银行这批“迫签”港纸，未见采取处理措施。为此，当时韶城谣传各异，商民均予拒收，持币者深受其害。

日伪占领期的“储备券”

梁宗奇

曲江县城（现今韶关市区）于1945年1月沦陷给日寇后，市面上流通的日伪钞票是——“中国国民储备券”。据悉，该券是从日本国印制，而交给侵华日军带到中国国土占领区强行发行使用的。这种伪钞的纸质、图案、印刷技术，都是极其粗糙低劣的。说实话，群众讽刺它为“阴冥纸”。从“储备券”的粗制滥造，票额之巨大、纸质之低劣就不难看出，日伪当局的发行指导思想是：“用得一时得一时”，“得过且过”、“过了海就是神仙”、“过了桥就抽板”……完全没有长期、巩固、稳定的打算。从这里也可看出日本侵华的野心蓄谋已久，早已作好货币流通之准备。

“储备券”的纸质软薄，多摺几下子就会起毛坑，用手指弹之，也几乎没有什么响声。从图案来看，颜色单调，制版粗糙，且多是弯曲的花纹，容易仿造。从票额的数字看，数目巨大，完全没有考虑物质基础。

“储备券”的票额，分别为：10元、20元、100元、500元、1千万、1万元、10万元、100万元的。10元面额的票子是作零星找兑之用，票色为绿色，20元面额的为棕赤色，100元的为全鲜红色，张头较大。100万元的为深灰色。背面印有：“大东亚共荣圈”或“武运长久”等字样。

“储备券”的价值如何呢？笔者记得，当时买一市斤白酒需券1000元，白米一斤应付400元，鸡蛋一个竟要200元。

可见，当时“储备券”的10元、20元，相当于现在人民币的一两分钱左右。”储备券”在曲江发行的寿命很短，用至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时便作废，仅用了8个月。（北江区政协供稿）

（作者系韶关市北江区政协常委）

韶 州 的 食 井

据1934年3月西北区绥靖公署的调查公布，当时韶关（小总内）的食井及鱼塘的分布地点如下：

法院前食井一口	狮井头食井一口
南门沙食井一口	中山公园右边食井一口
豆芽井食井一口	广富新街食井一口
熏风路右边食井一口	民生路尾食井一口
漂布塘食井一口	风度北路邮局门前
皇帝殿（即第一市场）食井一口	食井一口
保安里食井一口	风度中路巷内178号
井巷街食井一口	食井一口
康王街食井一口	罗沙巷食井一口
风采路食井一口	东堤二小学后门食井一口
	升平路食井一口
	（共19口）

（鱼塘分布见115页）

旅居韶关外地人的职业情况

谢昌寿

韶关市系粤北重镇，与湘赣两省毗郊，交通便利，商业繁盛，因此，聚集了许多外地人。他们从事工商等行业，在韶关，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在外地人中，人数最多的要数来自珠江三角洲一带的番禺、南海、中山、顺德、东莞等地，韶关本城人一贯称他们为广府人。这些广府人迁来韶关定居，可追溯到明朝和清朝。他们在韶关多从事工商业，市区工商业有一半属广府人开设的。而且，其所开设的商店，亦多是较大型的。所经营的商品种类繁多，有粮油、食盐、京果、海味、什货、布匹、丝绸、金银首饰、苏杭洋杂、土纸、日杂等等。他们还开设钱庄、当铺、茶楼、酒店、代客行栈、洋货代销（如英美香烟、火水、洋纱）等。广府人的批发零售、进出口贸易的生意也很大，多以韶关为主，在附近县镇设立分店。如土纸生意，就在产区仁化的长江、城口和南雄等地设立收购点，办理出口和运销业务。每年新谷登场，便大量收购新谷、囤积起来，自己开设米机加工。如阜民、利农、同裕。食盐从产区汕尾、三亚盐场运来，再从韶关转运湖南等地销售，而从湖南返运粮食、食油来韶出售。

抗战前，韶关市区有三间广府人开设的当铺：北门的大生押、风度中的宜人楼，风度南的谦吉押。另曲江县属的马坝、桂头也设有当铺。开设的工业作坊有豉油酱醋厂、豆豉

铺等。

广府人一般信奉关帝财神爷，很多店铺都安放有这样的神位，早晚烧香点油灯、初二、十六做“牙祭”，剖鸡爨猪肉，敬奉关帝财神爷，相当虔诚。

由于广府人会做生意，经营有术，且人数众多，因此，财雄势厚，历届曲江县商会会长及同业公会理事长多由广府人充任。广府人邓子睦就有老会长之称。他们人数众多，财力雄厚，而且居住的时间很长，故广府人所办的同乡福利事业既多且好。既有为同乡赠医送药的“宏仁善堂”、“广生堂”、接收垂危病人的“养生所”，还在东河现烈士陵园及其附近设有义地等等，其福利事业为其他同乡会所望尘莫及。

福建旅居韶关同乡，亦可追溯到明清时代。他们来韶定居，人数远比广府人少。福建人绝大部分从事商业。解放前，韶关市区烟丝店清一色是由福建长汀、连城人开设的。而且，烟丝店的店主大都是姓江的，如江有源、江春和、江茂成、信隆、福兰、福成、妙兰等商店。他姓的很少。在我的记忆中，只知道一间叫中兴烟店的店主是姓黄的。曲江县属的一些圩镇，如桂头、犁市、重阳、龙归、马坝、大塘、枫湾等地，也有福建人氏开设的烟丝店，这些店还兼营咸什糖酒等，而市区的烟丝店，却没有兼营其他，独烟丝一味。店内员工（如刨烟师傅、售货员、炊事员等）全部雇用同乡人。此外，还有福建永定人开设的五金杂架兼福建条丝烟，四刀半烟纸，如杨福纶、杨福祥、福成昌等。以杨福纶开设的时间最长，属老字号，系股份生意，做了几代人。

福建人一般信奉的是天后娘娘菩萨，在同乡会里安奉有天后神象。每年农历3月23日是天后神诞，福建人在这天都

十分隆重地举行庆祝活动。他们请戏班来唱戏，并组织聚餐晚宴。当时福建的同乡会设在平治巷。

抗战前，清远人在韶关也是不少的。他们从事商业的很少，只有几间缸瓦铺、药材铺之类，是由清远人开设的。他们的绝大部分是从事建筑业，过去称之为“三行仔”，泥水木匠、搭棚锯板和造船。建筑店有潘灶记、潘兰记、范镜南、戚盛威等。抗战前韶关市内的许多骑楼店铺多由这些建筑店承建。他们崇拜鲁班师傅，每年的农历六月为鲁班师傅诞辰，老板工人共同庆祝这个称为师傅诞的节日，举行聚餐，相当热闹。师傅庙建在学宫街尾。

抗战前，其他地方客籍韶关的也不少。湖南因有铁路交通之便利，商贩往返频繁。在南门和火车站一带，开设不少小型饭店、旅馆、代客行。解放前，市内不少大小妓院老板和妓女，绝大部分是湖南人氏。而众多的其他客籍人，则从事走圩场（即哪个圩镇逢街日就往哪里去），专做小百货之类的小生意。极少数是做行庄大生意的。这部分人中，也有少数人伪装成做生意的，而暗中则偷运烟土，从云南等地运来韶关销售，或以韶关为中转，销往外地。

三见张发奎将军

饶纪寰

一、在始兴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1939年秋。那时我正在始兴中学初中二年级读书。记得在一个晴朗的下午，当我正和部分老师同学一起，参加挖拆始兴县城东门段的旧城墙（水阁楼附近）的一次劳动中，偶然听到前面有人高兴地大喊：“张司令长官到这里看我们来啦！”当时，正在劳动的师生们，都不约而同地停下了手中的活，把视线转到了“文明门”那边。只见一个身材并不高，穿一身朴素的绿色布军装的将军，在七、八个军官的簇拥下，健步来到了我们身边。原来他就是全国闻名的抗日爱国将领、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将军。他满脸笑容地向我们招手，并亲热地说：“青年学生参加点劳动服务好，锻炼体魄，将来多为国家效力。”他一边说一边作手势，指着离地面还有三尺多高的城墙说：“同学们继续努力干吧！把城墙拆平了，就是一条很好的环城马路了。”

又过了几天，校长范正基邀请张将军来校同全体师生见面和讲话。那天校门口张灯结彩，打扮得如同节日一般，门两边还用榕树叶和松枝衬托出一副特大的用张发奎的字“向华”二字作联首的对联，赞颂张将军抗日的勋劳。是日上午，张将军在县长吴种石等陪同下视察了学校，并向全体师

生作了抗日战争形势的讲话。最后，他勉励我们全体青年学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期望我们全体同学“勤奋学习，将来更好地为抗日救国出力。”他讲完话后，又兴致勃勃地同我们几百名师生一起在校门口照像留念。

二、在广州

那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秋，当时我正在迁回广州石牌复校不久的中山大学学习。由于一些始兴留穗同乡和知名人士的倡议，在广州中华中路（现解放中路）云台里南韶连同乡会内，举行了一次部分始兴留穗同乡叙谈会和聚餐。我作为始兴留穗学生代表之一参加了这次聚会。当天到会的有三、四十人。担任广州行营主任的张发奎将军和华振中师长等许多知名同乡，均于下午四时左右陆续来到会馆。是日，张将军身穿一套土黄色呢绒将官服，鼻下留着一撮黑胡子，神采奕奕，来到会馆。他谈笑风生地同大家一起照像后，缓步走上二楼大厅参加联谊会餐。厅里摆着四大圆桌，菜肴丰盛。当酒至半酣，张将军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简短地讲了抗战胜利后，大家都要努力建设国家和建设家乡的话。老一辈乡亲都频频举杯，互祝健康，万事如意。我年纪轻，又不会喝酒，就只好静坐一旁，默祝他们为祖国、为家乡多操心出力，多作有益的贡献。

三、在韶关

1948年秋的一个上午。在韶关市互励路（现韶关市熏风路）的省立志锐中学（现北江中学前身）内，校长林为栋陪

同刚就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不久的张发奎将军来到学校视察。这是张将军亲手创办起来的并对它富有特别深厚感情的一所学校。我是这年夏从中山大学毕业后来到这所学校任教的。这所学校的学生实行严格的军事管理和训练。高中学生统一穿灰色军训服，初中学生穿黄色童子军服。由于张将军要把亲手创办的志锐中学能按自己的设想锐意办好，所以，高初中学生都分别由军训教官和童子军教练管理，校风甚严。学生在校食宿，但规定要隔周星期日才准离校外出一次。是日，张将军来到学校，先同我们教师短时会见后，即巡视学生宿舍和教室，看望师生上课情况。我们那节没有课的教师就跟随在后面，训育主任陈德隆则忙着协助拍摄纪录片。记得该节下课钟刚响过不久，各课室的学生就先后齐声唱起了《我们是小铁军》的校歌。歌声嘹亮，表达了师生们热烈欢迎张发奎将军来校视察。同学们的歌声铿锵有力，张将军听了也显得格外高兴和满意。他微笑着同校长、老师们告别。那时，他也许还不知道就在这些“小铁军”当中已有了一批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中共地下党员和青年团员，他们正在茁壮成长。他们正是在伟大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培育下时刻准备着为“保卫民族，解放人群”而献身的精英。就在我担任班主任的高三甲班学生中就有不少这样的同学。其中有莫德炜（延茂），还是当时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呢！这些当年的“小铁军”不久就纷纷奔向山区，成了粤北人民游击队的生力军。他们在解放战争后期和抗美援朝战争中都作出了可喜的贡献。

一九八五年六月九日

（作者是韶关市政协副主席、民主促进会韶关市委员会主任委员）

儒将欧震

欧 美原作 古 衡整理

欧震将军，字雨辰，广东省曲江县龙归乡甘棠村人。龙归距曲江（现韶关市）约40华里，有韶连公路经其东入乳源，再经连县、连山至广西。甘棠村与龙归相隔一泷水，背山面水，景色秀丽怡人。村中欧氏宗祠的前方，遥对着象一面古代大帅旗的车角岭，左前面对着圆圆平顶的仿佛象一只大鼓的山冈。左旗右鼓，据当地人说，风水佳胜。欧震的父亲，是前清末叶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4）在当地颇有名气的秀才，名叫欧培藻。

从甘棠村爬过一个矮山冈，便是沐溪，韶连公路贯串其间。那里的成家山边，有一座北宋余忠襄公靖的墓地，这是雨辰将军童年时经常游玩的地方。余靖是北宋的仁宗时代，会同狄青讨平南蛮侬智高之乱的统帅，后来追封为相。其道德文章以及武功均为后人所钦敬，更为雨辰将军所崇拜。

民国5年（1916年），欧震毕业于广东省立韶州中学的第三届之后，旋执教于曲江县滨江之滨（离韶关33公里）的周田墟小学。墟旁的平甫山上，有唐代丞相张九龄祖父子胄公墓。每逢假日或课暇，欧震常带领他的学生来这里凭吊、或眺望附近相传舜帝南巡时，曾奏韶乐其上的韶石山景色。有时，他还兴致勃勃地讲述张、余两丞相的事迹给学生听。由于地理上及耳濡目染之缘故，欧震在青少年时代，已深受张、余两丞相的影响。

他在周田墟小学执教3年多。在这期间，痛感国内军阀之割据、国土四分五裂，乃立志报国。时适孙中山先生号召青年从军，以扫荡国内军阀、打倒列强、统一中国的国民革命。正值青年的欧震，乃毅然投笔从戎，追随孙中山。从此卸下儒服，穿上戎装，在粤军担任排连长。民国13年（1924年），在粤军讲武堂毕业。毕业后不久，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在师长张发奎部下任职。

民国15年（1926年），国民革命军由广东革命根据地出师北伐，以铲除国内军阀。战斗最为激烈的乃湖南平江之役。在这次战斗中，欧震率部向敌人迂回攻击，以果敢敏捷的行动，捣敌侧背，配合攻击部队迫使吴佩孚的守备部队，第五十混成旅旅长兼蒲（圻）平（江）镇守使、平（江）通（城）防御司令陆沅战败自杀。

接着又在汀泗桥一役，立下奇功。汀泗桥为武昌南面咸守县城的一处重镇。其前面是辽宽的湖泊，后面是崇山。南、西、北三面环水，粤汉路自东北至西南横贯其间，峻岭东峙，俨然是天然屏障。除了亦岗亭这一条路外，其余都是崎岖小径，是一处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地。是役，欧震在张发奎师长的指挥下，率部以出奇之偏师，夜袭敌军的主阵地，白刃相搏，于刀光剑影中，首先占领桥头堡，控制了进出武汉的战略要地。接着，北伐大军兵临武汉，围攻武昌，这时，欧震担任了奋勇敢死队队长，率领敢死队首先攻城。他身先士卒，第一个奋勇先登，爬上城墙，民国15年（1926年）10月10日，围攻月余的湖北省会武昌城，终于被北伐军攻破克复了。

克复武汉后，第四军援驰江西，欧震亦跟随张发奎将军前往，迎击孙传芳派来援鄂的部队，并于江西德安和马回岭

等地，打跨了孙传芳的马登瀛、颜景崇、卢香亭等部。民国16年（1927年）4月，欧震又随担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张发奎进军河南的上蔡、临颖、开封等地。在江西德安和河南临颖两役中，欧震都在战局危急之际，以有限的兵力，增援友军，把敌军杀得落花流水，挽回垂危的战局。

1932年至1935年，欧震参加了赣南围剿苏区的战役，也参与了追截红军长征北上的战斗，地经赣、湘、桂、黔、川五省。以后历任团长、旅长、师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欧震先后任第九十师师长和第四军军长，参与东战场淞、沪、无锡东亭诸役的对日作战。

欧震于少年时代，受其工诗擅文的父亲培藻老先生课读薰陶，孔孟经史，都颇精通。尤其是《论语》一书，他能倒置成诵，一字不漏，所以，其文学的根底颇深。他在戎马生涯之中，时作诗遣兴，故有儒将之称。

民国17年（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攻占天津，欧震驻军山东泰山。这时，第四军缩编，他便担任第十旅副旅长。在休整期间，曾偕同僚黄道南游览北京帝都，诗兴大发，作七绝一首：

北定中原稍息肩，偕游宫殿慰华年；
胡同艳事如陈迹，重整江山志益坚。

1937年冬，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向南京作大迂回。战争逆转，东战场各作战军旅，急切撤退，以免受日军之包抄。参加这一战役的欧震，在撤退中，感慨万千，欣然命笔，写出“撤退感写”七律一首：

湖上风凄晓月残，长堤远树路漫漫；
三军愤慨心头火，百姓仓惶泪暗弹。

国事已堪长太息，前途莫问几多难；
牺牲本是男儿志，血不空流骨不寒。

以后，又在江西省南浔线诸役参加对日作战，转战大江南北，保持过去第四军“铁军”勇敢善战的荣誉。在第一次保卫长沙的战役中，欧震率第四军回师百粤不久，于1939年秋，又由粤北上增援，以“驰师解长沙之围，挥戈扼新墙之险！”戍守湖北第一线。这期间，又写下不少诗作。

欧震在台湾逝世之日，恰值蒋经国飞往汉城与朴正熙会晤之时。蒋经国临行前嘱咐其下属有关人员，要好好为他办理丧事。欧震的丧殓大礼于1969年2月25日（农历二月初九）在台北举行。其在香港的同乡亲友、同僚部属，于同年5月4日在港举行追悼大会，对欧震将军的逝世表示深切的怀念。

注：原文题目为《书生出身的上将欧震将军》，由香港曲江同乡会供稿。

欧震关心家乡二三事

钟 健

原国民党广东省中将保安司令欧震，是韶关市武江区甘棠村（原属曲江县龙归）人。欧震青年时代，投笔从戎，参加过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当年他在戎马倥偬中仍惦记着乡中父老，曾数次回乡探亲，对乡中公益事业热心赞助，受到乡亲们赞扬。

甘棠村过去是个苦旱贫瘠的地方，当地有句民谚：“甘棠、沐溪，屙尿割鸡”。由于干旱，农民十种九不收，生活十分贫困。欧震将军对家乡人民这种疾苦十分同情，慷慨解囊，向沐溪乡人买了几十亩山坑田，兴修了面积80多亩的中山塘水库，解决了甘棠1200亩稻田的灌溉用水，约占全村稻田总面积1500多亩的百分之七十。为了使水库不致干涸，又出资叫乡民在水库附近的成家山上种植了一百多亩风景水源林（乡人称之为雨辰林），现已绿树成荫，山泉长流，使此地增添了秀色。

甘棠村与曲江县龙归墟相距不远，有一条小泥路相连，村民要下地耕种，或把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拿到墟里去卖，再买回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都必须走这条坑坑洼洼的烂泥路，如遇雨天，就更难行走。为了解决乡亲走路难的问题，欧震将军又拿出了一笔款作为修路的资助，在全村民众的支持下，修了一条从甘棠欧家祠到龙归河边两公里多长、一米多宽的石阶路，方便了乡人赴墟和种田。

在1942年间，欧震回乡省亲，看到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非常落后，群众饱受无文化之苦。他先后捐资兴建了两座小学校，一座建在龙归墟上，一座建在甘棠村中。两座小学校的面积是一样大的，都是八百多平方米，都有教室25间，还有老师宿舍、教务室、厨房等十多间。从此以后，龙归、甘棠的儿童上学方便了。几十年来，这两座小学培养的毕业生约有四、五千人，有的现已成为在国家机关工作和四化建设的骨干。欧震将军这种热心为桑梓办教育事业的精神，将永远留在乡亲心中。

尊老、济穷是中华民族的好传统。欧震在这方面身体力行，发扬光大。他每次回家，都到村中的老人家里拜访，邀请60岁以上的老人到他家里作客，对应邀者每人发给五元大洋；对穷困人家亦给予接济。如在抗日期间，每年旧历三、四月份，那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买回数万斤大米或面粉，委托村中长者分发给穷苦人家度荒。有一年，欧锡多的父亲去世，无钱埋葬，刚好碰上欧震回乡，他知道后，马上解囊相助。欧震对乡亲们为他家办一点事情，也从不亏待，也不占群众的便宜。欧震母亲去世，他回来办丧事，对全村欧、刘两姓的乡亲不分彼此，凡去吊唁者，每人给利市钱二元；办丧事工作人员，每人给利市钱八元，以作误工的补偿。他这种尊老济贫，不占群众利益的品德，当地老一辈人无不交口称颂。

欧震将军虽已在台湾逝世了，但他热心为家乡兴办公益事业、为乡亲群众做好事的事迹，至今仍在乡中传为美谈。

（作者是韶关市武江区政协副主席）

著名水利专家麦蕴瑜

文 萧整理



麦蕴瑜近照

半个多世纪前，为曲江桥的设计人、在抗战八年中留韶工作七年的水利老专家麦蕴瑜，1887年生，现已是91岁高龄了。他于1915年在广州中德学校毕业后，升入上海同济医工大学（德国人办）读土木专业。1922年到德国进汉诺和工科大学，专攻水利工程和水工试验。在学期间，参观了不少大型水库、河流发电站，

以及水泥构件制品厂、大型烧砖厂。1925年因德国币制改革，克服通货膨胀，外币失去优势，外国人生活受到影响，同时也想学点实际经验，曾到德国南部一个径流引水蓄能、装机容量2900瓦的水电站做实习工程师，学到不少蓄能电站的知识。

1927年夏回到广州，愿望从事水利建设而无法实现。为了生活，只得到广东省公路处工作，派为粤北韶坪公路工程处副主任兼技士（相当于今日的工程师），负责修筑韶关经乐昌至坪石的公路。韶关至乐昌段完成后，接着开始测量乐昌至坪石的路线。此段公路建在起伏的山峦之中，要跨过300多米高程的分水岭封门坳和鹅颈坳，工程艰巨，测量定线相

当困难。半年定线测量完毕后，被调回广州市工务局任建筑科科长，负责马路、园林等建筑工作。后以人事变迁，曾一度任广东南路公路分处处长、省立勳勤大学教授等职。1932年，广西政要李宗仁曾向广东勳勤大学借调他到广西柳州调查水力发电，到过龙江河、沙浦河、中渡河和柳州附近鸡喇勘探。认为柳州附近河流水力资源丰富，大有可为，提出应积极开发利用的建议，这是他回国后第一次接触到水利工作，原以为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但李宗仁心有余而力不足，虽想为广西建立水电站，毕竟限于经费，建议终成泡影。以后，又跟广东省主席林云陔视察潯江黄岗水电站址（即今日的长湖水电站），为广州市市长刘纪文建议兴建流溪河水电站，曾带瑞典洋行工程师前往勘察。其后，广州市由于时间、金钱关系，且急图近功，只兴建了西村火电站，解决了一时用电。使他三次想开发水利，都成了纸上谈兵。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他辞去湖北省建设厅技正之职返粤。当时广东局势紧张，敌机频频空袭，乃成立国防工程处，抢修由广州经新塘、仙村、增城至正果的防线，除挖掘战壕外，还兴筑钢筋混凝土堡垒。他任工程专员，参加设计督修工作。后来日军侵入广州时避开该防线，绕过正果，所筑防线，毫无作用。

1937年原陈济棠主粤时期建立的潯江兵工厂迁往重庆，改为兵工署五十厂。厂长是麦的同学，他知道麦在勳勤大学时教授过“防空建筑工程”，请他去重庆帮助建厂工作。为了防止敌机轰炸，他们把600千瓦和6000千瓦火力发电厂和样板厂都建筑在山洞内，其他厂房则分布于峡谷两旁。同时利用峡谷筑成一个小水库，专为火电站提供冷却水，即是将废弃热水排入水库上游，然后在土坝附近设抽水站，抽低

温的库底水供火电站使用，以代替高高矗立的冷却塔。这可以说是他第一次规划施工的水库。

广州沦陷以后，李汉魂任广东省府主席，将省府迁到韶关。请麦从重庆回来，派为省府秘书处技术室主任兼任韶关新村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汉魂对他很信任。原因是他于1931年任广东省北区绥靖公署委员时聘过他为顾问，曾义务地负责过设计过曲江桥。该桥已建成50多年了，经数次大洪水袭击，仍安然无恙（见另文）。

1938年至1945年，他一直担任技术室主任。李汉魂虽几次派他任省公路处处长、省农田水利处长等职，他都婉辞不就。留韶的七年中，他为抗战建设做了几件很有意义的事：

1. 建议省府请求重庆中央政府，将迁往贵阳的珠江水利局在韶关设办事处和派勘测队帮助勘测工作。曾查勘过海康特侣塘、信宜的江水、南江上游水道、英德潞江水电站址、粤北白沙水、乳源杨溪水、乐昌田头水。施工方面，1944年完成了仁化县董塘墟灌溉区受益农田19170亩和乐昌县指南乡西坑水灌溉工程，受益农田10840亩。

2. 建议省政府在省办高级工业学校，增加水利工程专业，多培养水利人才。

3. 建议省政府在韶关市郊区建设四条新村，疏散韶关市市民居住，便于走避日机空袭，以保安全。当时每日都发出空袭警报，有时还轰炸市区。

4. 建设英德县走马坪华侨垦殖区、连县龙塘华侨垦殖区，安置华侨。当时麦兼任广东省侨资垦殖委员会委员。

5. 建筑省政府合署和所属厅局临时办公厅、宿舍、防空洞、防空壕等工程。

6. 建议在省建设厅设立农田水利处，并颁发《广东省

小型灌溉工程贷款办法大纲》以促进水利建设。该处成立后曾兴办乳源县南水乡汤盆水小型水电站、曲江县火山乡枫湾水灌溉工程、曲江马坝中陂灌溉工程、曲江老碱水库和梅县、蕉岭、台山、惠阳等县的水利工程。

抗战胜利后，广东省府主席罗卓英、宋子文曾拟派他为建设厅厅长，他仍把“做官作为义务而不是权利”婉辞了，后改派他为省府顾问。1946年冬，被派为南沙群岛接收专员，随南京政府派去的四艘军舰与内政部人员前往南沙群岛，负责调查研究、测量、竖立碑石等接收工作。从1947年至1949三年间，调广州市工务局任局长，修筑了沦陷时期全市破烂路面，修理海珠桥，规设东堤、西堤、海珠桥北岸被日寇破坏的等灾区。

一个水利专家，不能一心致志于水利，不无遗憾的。他时有感叹：在旧社会由于水利失修，水患频仍，广东人民备受洪、涝、旱、咸、潮之威胁，可以说是“五毒俱全”。过去，粮食奇缺，每年进口洋米1千万担，每担毫银10元，因而每年损失白银1亿元，居全国缺粮省份之冠。在这漫长的岁月，广东水利建设方面，只修筑了一些堤围和建筑了北江芦苞水闸、西江宋隆水闸、东江寒溪水闸而已。

解放后，真教“日月换新天”。广东省人民政府叶剑英主席认为广东今后要大搞水利建设，曾派秘书长云广英访问了他，要他到珠江水利工程总局负责顾问工作，他衷心地感到，能发挥所学专长，真是梦寐以求。过去大总统府秘书长马君武介绍，我也得不到做专业工作，今日省人民政府秘书长亲临下访两次，委以重任，真是两种社会，两种遭遇，亲身体会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麦老从此大展鸿图。认为特别是50年代是广东水利建设

的“黄金时代”，也是他一生中备受信任，施展所学的时期。以后，他就全力以赴，投身于水利建设了。堵口复堤，联围筑闸，水库蓄水，水电站建设等等，20多宗较大的水库工程都尽了他应尽的力量。如流溪河水电站，于1958年建成。该站总装机容量42000千瓦，年平均发电量1.532亿度，灌溉农田40万亩。随后又于1961年完成广东最大的河源县新丰江水库、发电站，水库总库容139亿立方米，总装机容量292500千瓦，年平均发电11.72亿度，坝高105米，库容之大居珠江流域第一位，居全国第五位。对东江防洪、灌溉、航运起到很大的作用。认为能参加这样大型的水库工程，在德国留学时是梦想不到的。还作诗一首，以寄情怀。诗曰：

巍峨高坝锁绿波， 新丰江上出天河。

降伏蛟龙乘发电， 天公无语奈人何。

在连续兴建的大型水库中，令他感到兴奋的，还有粤北的南水水库。因是采用“定向爆破法”，用两三秒时间堆成大坝的绝大部份而建造坝高81.3米、总库容12亿立方米的堆石坝，真是“巧夺天工”。

麦老在建国以后，除了担任顾问、总工程师、广东水利科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务，兢兢业业于水利工程建设之外，还大力培养水利人才，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曾任水利工程训练班教师和主任、省土木水利工程学校校长、广东水利电力学院和广东工学院院长等职。1979年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成立，被聘任为顾问，参加一些会议，提供资料和意见。近年来，以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多在家中安享晚年之乐。但还谦虚地认为自己对整治西、北、东江河道，畅流洪水，减少洪灾，做得不够，深表遗憾，希望后起之秀，特别对防治北江特大洪水给予重视。他还积极地提出建议：

1. 龙滩、大藤峡、飞来峡防洪发电工程应早日促其实现，解决广州市和珠江三角洲的水灾和电力问题。

2. 大力加强改造中小型水利工程，如无闸门控制的溢流滞洪水库、病库、拦河滚水坝等阻水工程，挖掘防洪、发电和灌溉潜力。

3. 早日进行西、北、东江整治河道规划，规定各江河的治导线。同时，大力加固堤防，堤库结合、蓄泄兼施。

4. 整治口门，合理围垦，增加国土，畅通尾间，开发伶仃洋，以促进南海石油工业的发展。

5. 加强种草植林，建筑梯田、鱼鳞坑、环山沟等水土保持工程，以彻底减少河道的日益淤高。

6. 在珠江流域总体规划基础上，搞好中小河流规划，重视蓄水防洪，治理河道，以配合东、西、北江干流的整治。

.....

麦老的建议，可谓语重心长，他心里难忘的是一幅了如指掌的水利建设蓝图。

沈秉强任新会县长的几件政绩

何 坤 巽

1931年春，沈秉强任新会县长。他是广东省曲江县人。曾任十九路军高参。由于陈铭枢的关系，受命来主新会。在任不过半年时间。但是他为新会人民，确实办了几件好事。给新会人民留下深刻印象。

（一）他下车伊始，即延揽新会当地的开明贤达之士，参加县府工作。如任用谭碧初为县府顾问，林燥如为教育局长，施见三为文牍主任。他随员不多，前任旧人如果不是自动辞职，一律保留下来，或调整任用。没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旧官场现象。

（二）1931年3月1日，省府令飭江门市重归新会县管辖。沈秉强接收江门市后，鉴于会城河窄水浅，交通不便，而江门地理上为粤中五邑咽喉，是工商业重镇。江门的北街是海关所在在，有海轮通港澳，为对外交通港口。江门又是宁阳铁路的终点，也是新会和五邑的政治文化中心（五邑包括新会、台山、开平、鹤山、恩平等县），因此，江门是适宜为新会县治所在地的。于是沈秉强便将县治由会城迁到江门，县政府设在江门石湾祖庙。此举深得新会和五邑人民的拥护，足见沈秉强政治经济目光之远大，开新会县治改革之先河。

（三）沈秉强鉴于《新会县志》，自晚清光绪34年由谭饒主编《新会乡土志》以后，已中断20多年。在这期间，经

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大革命的关键性历史时期。为了保有新会在这些历史时期的文献史实，以为今后新会资治的借鉴和依据，有必要修编《新会县志》。于是，他指令成立“新会县修志委员会”，派谭碧初、施见三、林燥如等为委员，会址设在会城阁邑书院内，由谭碧初负责筹备编志工作。可惜沈秉强主理新会任期太短，未能完功。卸任后的历届县长，虽保存“修志会”组织，但徒有招牌，不过虚设而已。

（四）沈秉强对教育事业也很重视，履新之初，即任用在晚清废科举兴学堂时期，任新会的第一间学堂一求智学堂的堂长林燥如为教育局局长。所属的学校教育股，由陈恒业任股长。社会教育股由龙继禧任股长。督学四人，由林端尧、谢叔茹、陈国琮等担任。当时，新会区乡，开设私塾不少，对青少年教育妨害很大。沈秉强下令取缔封建私塾，禁止以《三字经》《千字文》为小学教材。推行奖励办学制度，指飭各区乡开办小学。他指示督学必须走出办公室，落到各区乡实地视察督导教育工作，并授权他们代表县长代拆代行；要带备盖有县长关防印章的空白公文纸，以应实际需要，行文指令各区乡学校实施。督学们手中有了这把“尚方宝剑”，有责有权，便不怕区乡的土豪劣绅和封建学阀的阻挠，大胆取缔私塾进行教学改革。

沈秉强又以县办各中小学校的名称混乱参差，认为江门既属新会，学校名称必须同新会一致。于是他把学校名称改变了，但校长原任不变。将原江门中学改名为新会第二中学，仍任原校长林鸿材为校长。江门共有市办小学五间，则改名为新会县立十一小学，十二小学，十三小学，十四小学，十五小学。

(五) 1931年秋，沈秉强卸任新会县长。新会在广东省是富饶的一等县，又是侨乡，为官僚逐鹿的肥缺。有些卸任县长，平日搜刮民膏，脑满肠肥，腰缠万贯。可是沈秉强卸任时却两袖清风。反之，还从县府额外节余款项下开支，多发职员一个月工资。他清廉自守，却关怀部属生活，使人感动。

(六) 沈秉强用人，做到选贤任能。对德才兼备，平日清、慎、勤的干部，常优礼有加，成为同事朋友。例如施见三，他来新会之前，素昧平生，在县府共事半年中，知道他是晚清最后一科秀才，在新会中小学任教数十年，道德文章，名噪新会；又曾参加大革命，主编过进步刊物，提倡语体文，推动新文化运动。经他教育过的学生，参加革命的就不少，素为新会人民所尊敬。在县府工作中，建树很多，处处以国家为重。其后，十九路军在沪淞抗战时，沈邀请施到上海参加抗战，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又邀请施参加工作。福建事败，施才返会城。由此可见沈秉强任用人员的作风，在旧社会是难能可贵的。

作者附言：本文资料，承林瑞尧同志供给，谨此致谢！

江子韶先生

潘 达

江子韶先生，乳源县城洲下街人。旧制高等小学堂毕业。生于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卒于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享年五十一岁。

乳源偏处于韶关市西北角，境内大山连绵，土地贫瘠。过去大部分地区交通，靠肩挑扛抬，经济落后，很少受外来政治影响。1927年（民国十六年间），江子韶独自经营一家车衣布匹店，商号叫“江源记”，生意颇为兴旺，被当地居民誉为殷实人家。他为人厚道，对人和蔼。1931年（民国二十年）间，成为地方绅士。开始接触郝耀铭、黄鹤森、许济化、陈荣魁几任县长。但彼等均非清廉官吏，他的心愿，无法实现，从此又一度离开官场，埋头经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次年（1938年）十月广州沦陷，乳源城连遭敌机轰炸三天，县城及河两岸居民，每天天未亮，就携男带女到城外躲避敌机轰炸。他的生意做不成了，把所有货物运进瑶山亲戚家寄存。一年过后，战祸未殃及山城，人心稍定，才把货物再运回来继续营业。但因通货膨胀，物价异常波动，一日之间，几起几落。他在山城消息闭塞，不知行情急剧变化，竟被投机分子把他多年积存的货物，以低价抢购一空。等到韶关进货时，却买不回原货物的一半，几出几进，几乎连血本也亏蚀殆尽。

1939年韶关人许苇航，来乳源筹备成立国民党乳源县党

部，拉拢地方人士，为他奔走呼号。江子韶因分不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终于在许苇航多次游说下，加入了国民党，并被封为国民党乳源县党部执行委员。

县内各种势力，都利用子韶的为人朴素、不损人利己、广有人缘的品德，他也稀里糊涂以为这就是帮人做好事。1941年春，刘德闻就任乳源县长，四月间成立乳源县临时参议会。选举参议员时，江子韶当选为副参议长。那年代政治黑暗，官场腐败，参议会实在没事可参，没事可议，只成为腐败政府一副掩人耳目的招牌。江子韶实际成为木偶傀儡。他不善言词、交际，与县内各种势力代表人物，毫无利害关系，见有鱼肉乡民的事情发生，只感到罪孽，但无能为力，徒呼奈何。

就在此时，乳源县城来了共产党，他在与共产党人包华的接触中，听到许多闻所未闻的新事物、新道理，开始产生崇拜景仰之情，认为包华是个有学问、见闻广博的教师。在这之后，黎庶、李家声、容华、潘达等中共地下党员相继来到乳源，不断与子韶先生接触谈心，他逐渐心明眼亮，认识了国民党反动政府腐败的根源，思想起了变化。在当时的条件下，他选定支持办好乳源抗日教育事业，才是真正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地方和国家的好事。他关心中共地下党员，接受他们的建议，支持他们艰苦办学，在客观上支持了中共乳源地下党的秘密活动。

从此，乳源县城的教育工作，顺利开展，学生人数骤增，入学读书的气氛浓烈，妇女也踊跃参加夜校。办学取得了成绩，江子韶很高兴，又进一步大力宣扬推广办好学校教育，就是为地方办好事。周围乡村在此推动下，也纷纷开办或复办停课学校。子韶先生积极向县政府教育科及各乡村介

绍推荐教师任教，帮助了乳源的中共地下党员、进步教师，得以深入农村工作。

经过一年多的对教育工作的努力，乳源有了第一批小学毕业生。后经包华的倡议，还开办了乳源县立中学。子韶先生说：“1940年时，县长陈荣魁任内，曾开会决定兴办乳源县立中学校，我是筹备委员之一，当时不受重视，没有办成，现在具备了条件，我当以现在的县参议长身份，主张开办中学。”他这一倡议，县参议会一致通过，县长刘德闻认为开办中学校，也属自己的政绩，不敢落后，立即批准。消息传出，全县群众莫不高兴。

办学得到群众的拥护支持，学校经费和设备，进一步获得解决和充实。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以及县府的教育科，就出面争夺学校，撤换校长、教师。这时，江子韶旗帜鲜明，站在进步的立场，当面指责教育科长黄锦麟破坏教育事业。他代表民意，以参议会副参议长名义，联合地方热心教育人士、学生家长，挡住了某些人的夺校意图。在校产租谷空罄之际，他也积极想办法，支持云峰镇中心小学校继续办下去。为了学校扩大班级、扩充校舍，他又积极发动捐献钱物，使洲街保校越办越好。

江子韶先生逝世时，李家声和韶关进步报刊——晨报的三位记者，都前往灵前吊唁，李家声还亲自石刻“江公子韶墓”墓碑，以资纪念。

韶关富商陈公言

陈业顺 文 蔚

陈公言（1903——1953），清远县人。其有兄弟9人，均以建字排名，故其在家名为建谔。陈在抗战期间开始在韶关从商发迹，到了1948年，已经是一个企业大户，全年营业额已达到3,100多万元，个人收入已在30万元左右，成了韶关颇有名气的富商。

爆竹业起家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陈公言的叔父陈炽南在韶关市区风度中路办起一家世昌爆竹店（在清远县城亦有一家同名的爆竹店，笔者估计，也是陈家所开），当时，陈业顺的三兄在该店为陈公言的叔父坐柜台及兼管钱账达11年之久。自入店以来，为避夹带之嫌，所穿衣裤皆无袋子。其叔父去逝之后，该店由陈公言接管。

世昌爆竹店，为三层的砖木结构。店的前半部作店铺，铺面宽敞，玻璃货架。年年都上油漆，使铺面保持常新如故。装饰华丽，商品五颜六色，成为颇具特色的商店。后半部为工场作坊，雇用女工30多名，靠手工操作，自制爆竹。由于产量不高，因而，大量的货物仍需从南海、佛山等地运来。

当时，一个仅有三几万人口的韶关，在市内竟有神庙2

多座。由于文化教育落后，广大民众受封建迷信的愚昧思想所束缚，许多人相信鬼神命运，导致迷信活动相当盛行。每逢农历初一、十五、诞辰、忌日、庙内烟火不断，爆竹声声震耳，求神拜佛者众。特别到了春节，人们又大量购置各种祀祭物品，大办各种迎神接福的年料（包括纸料、神像、香烛、鞭炮），因此，这种经营祭品物商店生意兴隆。由于此等“商品”没有成文的价格规定，买家一般不作讨价还价，因此，毛利率很高。按规律，一个春节期间的成交额，就足够商店大半年所需要的费用。本小利大，莫此为甚。

世昌爆竹店，设于韶关市最繁华的风度路中段，生意自然比其他爆竹店更胜一筹。市外许多边远山区、如仁化、乳源、曲江及湖南汝城、宜章等地的客商，常在该店批发货物，使该店生意兴隆、财源广进。每年为36万多元。毛利率不低于60%，全年纯利润达21.6万元。

多行业并举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省府北撤韶关。一时间，韶关山城机构林立，人口激增，从几万人的小城增至30多万。加之韶关是个交通要道，来往人员甚多。陈公言抓住这一时机，即将爆竹店的后半部腾出来，废工场而兴建旅店，取名为金华旅店（后改为平安旅店），并在南门（现在的解放路）开设青年旅店，在西堤横路开设青年支店。

所开三间旅店，都是一次性的投资，平时所需费用开支不大，加上每天开房率高，经常爆满，收益甚丰。这三家旅店，共有房间160多间（散铺不计算在内），年营业额为201,600元，每年毛利额80,600元。

抗战胜利后，英美烟草公司打入韶关市场，陈公言很快成了该公司的总代理，操纵该公司在韶关地区产品的推销权。当时该公司主要产品有三炮台、大前门、五华、老刀、哈德门等牌子的香烟，这些香烟均属中上价格。此外，还在靠近湖南的乐昌县城成立新中烟行，为英美等烟草公司的上述牌号的香烟设点批发，并兼其他产地香烟的批零。乐昌新中烟行的建立，成了向湘南一带推销香烟的桥头堡。

由于上述牌子的香烟是当时的名烟，陈操纵批发后，日推上述各种牌号（不包括其他牌号）的香烟平均1300条，年批量为1,170万元。年毛利额为35万多元；另乐昌新中烟行，日平均批零250条，年批零额为180万元，年毛利额为7.2万元。

言记贸易行，又是陈公言开设的另一行业，该行专为代客买卖的经纪人。他及时掌握市场的需求及货源信息，大买大卖，远买远卖。千方百计筹集资金，进行长途贩运，并兼搞出口贸易。重点放在粤北的土特产品，如生猪、烟叶、纸把的买卖上。运销的重点目标是广州。

这一贸易行的利润亦相当可观。仅以1948年为例。每月保持运销货物两批。该年的某月一次从江西吉安买入生猪2200头，从南雄购入烟叶1600草包。然后将生猪运至广州黄沙“穗兴”猪栏，烟皮运去广州一德西路南天行，当月的营业额仅此两项合计法币138万元，年营业额为1656万元，年毛利率为132.5万元。

除此之外，抗战胜利后，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繁忙，陈公言及时地在粤汉铁路主要站内开设代客报关运输业。分别在广州、韶关、衡阳、长沙、汉口、上海、南雄、赣州等地设立该运输行的总站、分站、办事处或卸货点。其业务的重

点是代客运输、装卸、中转、过境报关、押运货物等。

新中运输行主要承运广州与韶关两地往来的货物。日平均收运货物量约80吨，全年收入为115.2万多元。

管理的手段

陈公言在其发迹之后，将其亲属安插在企业的主要部位上去。长兄建谦在广州新中运输行任总行司理；弟建志坐镇韶关分行；最小的弟弟建访负责巡回督察；建新负责决断买卖的言记贸易行；其侄陈鲁三负责衡阳分行。他们的家属一般随夫在店生活，膳食开支均由店内负责，享受职工待遇。也有一部分分支机构是由其好友把持或由妻弟主管。如南雄办事处的李耀，赣州办事处的朱树风，金华旅店的郭焕勤、苏家强等。

平时，他还聘请一批远亲或知己做自己的参谋、顾问。这些人一般是无实职的“食客”。如古学者郑文海、黄慰平。有些也委以职务，如邓乃棉为副总经理，庾熙光为襄理。这些人均是出谋策划、制订策略的上层组织。

职工的变迁、调动较少，除在各所属企业之间流动外，相对较为稳定。他们的职务名称大致有：接运、站务、押运、打杂、管仓、内勤、外勤等。当时所属运输行的搬运工人，则采取常驻形式，但不入编制。以班组为单位，有任务时作计件工资，无任务时则在店门或店厅内听候差遣。这样的工人在广州新中行就有3个班约40人，其中总领队及班长4人。这些人由于赖以店行为生，故随叫随到，忠于职守。至于领取店行固定工资的职工，造册的约140人左右。连同长期驻店不负担工资的搬运工人在内约230人。

当时店行职工的工资，采取按职定值，但差距很小。工资大都以一个人在一个月的生活水平为准。总经理的工资比炊事杂工高出三倍，比高级职员（出纳也归入这一级）多两倍，一般的职员，如文书、记帐员则多一倍。职工的收入，主要靠营业额或劳务收入多寡提成、买货对方的回扣、搬运力资、搭卡蓬结算等。回扣的分配是这样的、凡有收入的门店，都设有一个铁箱，将回扣款投入箱内，半月当众启封一次。分成按照总经理各部门均占2份，其余职员则按所在单位分别占1.75份、1.5份、1.25份不等，工人最高为1份或0.75份，炊事杂工只占0.5份，所有比率一经确定后，不易变更。

职工各个年龄阶段都有。大都是横向进店的。进店前，进行体检，陈凭眼力选人，凭问答口试，不搞笔试。录用后，经理常搞些花样考验进店者是否忠诚，尤其是了解职工“手脚是否干净”。如在办公台下面放金条、柜台上放大额港币、借给店日息款故意多付等等，用以考察经办人是否有贪念。若经办人发现后，即刻交回去或经提示后交回的，可甄别为老实或比较可靠者。记得有个会计人员是从银行开除后进店的，有一次贪污黄金三两，发现后当即开除，绝不留情面。

陈公言对属下员工常施以恩惠。职工上班，供应早午晚夜餐。平时伙食，两荤一素一汤。初一、十五厨饮粥（炊事员买菜所剩结余，用以职工加菜），初二、十六老板肉（加菜）。节日前夕，由经理带队，具备礼物送到职员家里。记得1946年10月4日，陈在韶关大三元酒家包厅，将其所属职员110多人请来吃早茶。职工及其家属有病，可到陈公言妻子苏志良（广州光华医学院妇儿科毕业生）所开的诊所看

病，免收药费。有些病重的家属，她还上门诊医。职工婚丧大事，他也十分关照。1947年陈业顺结婚，其亲自带他到广州北京路高级洋服店订购一套英国箱绒西服作结婚礼物。遇有丧事，其又亲自前往慰问凭吊。而平时，他却常散布“饮水不忘开井人”的言论，意要职工知恩报恩，尽职尽责为其卖力。

职工们自然对工作亦不敢怠慢。计算劳动不是以时间（8小时）计，而是视所负责的工作是否完成来衡量。工作没干完，加班加点也要完成。搞财务的，每天要试算，结出余额，白天业务往来繁忙，结帐只好放在晚上；店员下班之后，还需打扫卫生，整理货架，还经常进行盘点、布置橱窗等；炊事员每日四餐，时间更不限于8小时了。这种长时间无报酬的工作，工人当面不说，暗地却很不满，说“经理一席酒，伙计半年粮”。有个接运员黎仲约竟把接来的运货交与别家运输行。

经营的头脑

陈公言在经营上，亦攻于心计。

第一，掌握信息灵。

陈平时专门养有几个从事“密探”工作的人。其职务名称叫做接运员。这些人除工资外，还拨给其本人工资3倍的交际费。他们的任务是打探市场的行情、物价的情况、金融比值的升降、货物运输、猪栏的成交价等等，然后及时作出判断与分析，送交上层决策人参考。

对于购入商品，通过所掌握的信息，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将当地的买价、连同商品流动全过程的一应开销费

用，与到达地市场价格相比较，看是否合算。然后在进货地拟出进货计划，最后成交。这一过程，都有人严格把关，以达到有利可图之目的。

为了掌握金融物价等方面的信息，总行每天都用特快加急电话与各地联系，基本做到早、午、晚3次。有大波动时，更是如此，所需费用在所不惜。

第二，资金周转快。

当时由于国民党当局政治腐败，至使整个国家经济接近崩溃，国家货币贬值速度惊人，港币几乎占领华南各地市场。韶关市场物价亦是如此，早晚升幅很大。为了适应这一情况，陈所经营的各店现金日记帐分成4种同时记帐。一是国币，二是港币、三是银圆、四是黄金。后三种相对稳定，唯独国币贬值惊人。所以，存库不过夜，用麻袋装好，迅速用车运往银行。一来减少损失，二来利于资金周转。

流动资金集中保存在世昌炮竹店中心办公室内。里面建有一银仓，墙体是耐火砖、水泥、钢筋结构。门是封闭式铁门，铁门内又另设有一重铁闸。整个银仓约6平方米。银仓前有5张办公桌子，职员在此办公如同银仓警卫。银仓备有两套锁。外门锁归当时任总会计兼总出纳的陈业顺掌管，内门锁归陈公言掌管。银仓进出要有两人配合方可。晚上职员一律住店，可算相当安全。平时交收资金，都有两名彪形大汉偕经办人前往。1948年9月，银仓最高峰期所存货币如下：黄金37市两；港币20万元；银元3000个以及少量国币。

对于闲散资金，陈公言采取多种形式进行筹集。除向银庄、亲友吸收日息、旬息、月息的资金外，大量收进免费汇兑。重点放在韶关百货、布匹行业。采用韶关收款，广州交款，有时还需贴息。对代客的买卖，除收取佣金之外，采取

延期付款的形式。那怕是延期一天二天也好。

第三、商业信誉高。

为了在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陈公言很重视商业信誉。所出售的商品，不斤斤少两，不掺假、不搭配、无伪劣，可退货，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虽然采取延期付款的形式，但一经商妥，一诺千金，准期不误。

各店职员不准与顾客顶牛，礼貌和热情待客，对客商交运的货物，可垫支来途去向的车船费，有一定货物量的，还可免费招待食宿，使顾客感到满意。

第四、应变能力强。

陈店经营范围不受限制，商品贸易，可以随时转移。重点目标，如贸易土产特产，每年均搞一二次板鸭、香菇、冬笋的出口贸易。在应变之前，均召集在家的主要职能人员商议决断，按说得对的办。商议时，不讲题外话，不讲究开会形式，有些重大决断，几分钟就解决了问题，争取了时间。

平时经常派员了解商品的流向，如茶叶、土纸、生猪、冬菇、红瓜子等。一经了解某项商品社会上需求迫切，就马上进货。陈一直坚持“人弃我取（进货），人取我弃”及“宁买当头涨价物，不买当头跌价货”的信条。在资金允许的条件下，也搞些投机买卖。如自己把持的香烟，有时故意地推波助澜，要涨价时，派员“抢”购，要降价时，派员推销，以此手段谋取暴利，挤垮小商贩。

对本企业的进、销、存货等经济情况，则注意保密，报价时多用代名词。如黄豆代黄金，朱砂代生猪，咸鱼代港币等等，使他人摸不着头脑，达到不泄露真情之目的。

1949年5月14日，韶关市火车站站道路的一场大火，把陈公言的新中运输行夷为平地。损失惨重，大量代客运输的货

物被烧，需向货主赔偿。经此一失，元气大伤。加上人民解放军直逼长江，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已全面崩溃，运输业处于停顿状态，言记贸易行、香烟代理等行业亦全面收缩。在这种情况下，陈举家逃至澳门去了。

1949年10月7日，韶关解放。12月，陈公言举家返回韶关后，他重振旗鼓，重开新中运输行；看到金华旅店各项家具未曾散失，便改名平安旅店后继续开业；世昌栈爆竹店也继续持牌营业。

以后，新中运输行加入合营社，该社亦因运输单位自办运输而于1954年停业。世昌爆竹店由于社会的进步，营业额每况愈下，难以支持下去。平安旅店也走向公私合营的道路。

陈公言在1953年因病于广州病逝。

七战区司令部生活漫志

陈方媛

高层膳食和机要尖端

国民党的广东部队，从陈济棠时代算起，它的膳食制度，校官以上每月交费十二元（广东毫券），尉官每月交费八元，但饭菜的品种质量是同样的。在陈济棠的总部里，他身边的高级助手、谋臣策士、弄墨文人、及一批在总办公厅工作的中校以上的官员，却另有两三席高质量的饭菜。那时，广州现在仍有人用来号召招徕的“市师鸡”，一碟鸡胸肉或鸡腿肉，任由选择，还要配上葱梗、蚝油各一小碟，只收毫洋两角。摆在陈氏总办公厅的这种高级膳食，具丰盛可口，是肯定无疑的。我国从春秋战国时代起，甚至比较后进的吴楚等国的头头，都懂得这一道理，对谋臣策士，锦衣玉食，备极尊崇。陈济棠的这一做法，并不新鲜，也是古已有之的。

1936年，陈济棠在广州倒台，继起的是余汉谋。对陈济棠的拿手好戏，带兵要像母鸡带小鸡一样，爱兵如子这一治兵要诀，余汉谋固然心领神会，如法炮制，就连高层膳食这一招，也原原本本地作为传统，继承下来。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余汉谋的总部迁到翁源县三华镇。尽管余汉谋被革职留任，他总部的总办公厅，高层膳食制度，却仍在继续执行。翁源是一个小县，三华是一个小镇，生活上的供给，特别在副食品方面，较之广州，丰歉之

差，幅度甚大。每天，副官处都要派出两辆卡车，分赶逢着圩期的圩镇，采购副食，供给这个总部，特别是高层膳食之用。经过一番苦心孤诣，惨淡经营，总未能踵事增华，倒也差可勉强旧制。

1939年，日军的海空力量大大削弱，无法控制海上交通，企图打通从广州北上的大陆纵贯路线。当它的前锋部队到达韶关南面的大坑口时，不图在后方的牛背脊，给余汉谋部下黄涛的一个军，打断了它的脊骨。兵慌马乱，仓皇后撤，日军乱作一团，吃了一个大败仗，抱头鼠窜，逃回广州。靠此一役，余汉谋不但复了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的职，而且升了官，当上了第七战区的司令长官。

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的司令部设在韶关。在此，总办公厅也升了级，不是十二集总部的总办公厅，而是新设的七战区长官部的总办公厅了。高层膳食制度，照旧执行，席设三张，每席八人。第一席，司令长官余汉谋、副司令长官蒋光鼐、参谋长王俊，这三个人是从不出席的缺席者。所以这一席，实际上只有五人：总办公厅主任曾友仁、高级参谋办公室主任赵一肩、政治部主任李煦寰、顾问张碌村和秘书长陈同昶。除陈同昶是一名少将外，其余四人挂的都是中将军衔。其余两席，就是总办公厅、高参室和秘书处中校以上的官员。由于私人应酬多，出差公干的也不少，每席都经常不是满员的。

由三华迁到韶关，副食品的供应难度，已大大缩小，膳食质量，理应提高。但事出意外，七战区总办公厅的高层膳食，却老是恢复不到当年在广州时的水平。相反，每况愈下，却好像走上了一条下坡路。一餐的四菜一汤当中，竟然出现了一盘煎荷包蛋，每人一只。一个中校慨然兴叹地说：“出到荷包蛋，厨房的黔驴之技，已图穷匕见了。”这位中

校是谁，且听下面道来。

七战区长官部的秘书长，秘书处长和该处的两个上校、两个中校，都是高要县人，系余汉谋的同乡。上面提到的那个中校是梁守坚。他专攻书法篆刻，但尚未籍籍有名。他又是一个瘾君子，镇日躲在一个小房子里，直竹横床，吞云吐雾，既是深居简出，当然便与外界绝无接触。他又别无一职掌，单管书写余汉谋给蒋介石的亲启信。因此，他有十足的理由，“闭关自守”，采取“锁国政策”。

余汉谋给蒋介石的亲启信，信稿全是秘书处长谢崧举起草的。谢氏通过考试，当过县长，对案牍书函，堪称老手。同时，余汉谋有两个私章，一个由总办公厅主任掌握，是官用的；一个在谢崧举手里，是专盖给蒋介石的亲启信用的。信一写好，加盖了这个私章，便可派人专送，或用火漆封口由军邮投递。这样的信，蒋介石一接到，核对一下笔迹私章，便可确信无疑是余汉谋发来的了。

七战区的总办公厅和秘书处，原都是该战区的机要部门。如重庆军委会电令七战区扣留乔冠华，后经赵一肩向余氏说项，不但未扣，反给乔旅费和通行证，让他跑到香港去一事。渝韶两地的来往电文，都是通过总办公厅和秘书处的。但蒋余之间来往的亲启信则不如此，总办公厅主任和秘书长一般都不过目，其他人就更不用说。因此，梁守坚虽仅仅是一名中校，他和谢崧举却同是七战区机要尖端的成员。所不同的是：蒋余之间来往的亲启信，其内容谢崧举全知，梁则仅仅知道一半，通过推测，至多也只是大半。因为，蒋介石的来函，他是看不见的。

广州解放前夕，谢崧举随余汉谋去海南岛，后又赴台。两人均已在台先后去世。

俄国顾问的胃口

韶关，帽子峰麓，原日是韶州师范学校，抗战期间，一度是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司令部的后面，有一条林荫小道。这里，经常出现两个穿着军装的外国人，但没有戴军帽，也没有束皮带。一个瘦长，一个肥矮，看上去，高低很不相称。但神志却同样悠闲，步子也两相协调、合拍，而且中节。这就是重庆国民党军委会派到第七战区的两个俄国顾问。

俄国顾问，这是整个战区尽人皆知的。但他们究竟姓甚名谁，出身经历，却没有几个人知晓。他们除了傍晚出来散步外，便老是躲在屋子里，和外部世界罕有接触。同样，对他们，第七战区也不顾不问，长年累月，两不相干。可是，他们的生活待遇，却是非常优厚的。

当时，帽子峰东北角半山腰有一个防空洞，深入山内约有一两华里。洞口有一块空地，约有八九百平方米。空地上建有一座钢筋水泥的两层小楼房，楼房对面，建有一列小屋——这就是第七战区最高指挥功能的运转中心。小楼房的楼上，一边是司令长官余汉谋、副司令长官蒋光鼐和参谋长王俊的办公室。一边是多用途的会议室。楼下，一边是七战区的总办公厅，一边是高级参谋办公室。总办公厅，名气很大，里面却只有几张办公桌子。其中的两张是总办公厅主任曾友仁和中将顾问张碌村的。另外三张，除秘书处一个上校科长和一个上尉总收发而外，笔者有幸，也占了其中一席。

曾友仁当这中将军长，办事精细，戴着老花眼镜，批阅

公文，连副官处的伙食报销单据，他都要亲自过目。一天，他叫那个上尉拨个电话，请管外事的少校副官何国勋上来。在战区司令部里，人们都管这个副官叫交际副官，俄国顾问就是他负责招待的。据说，他懂得好几种外语。

唰的一声，一个立正，何国勋已笔直地站在曾友仁面前。

“两个俄国顾问，每天午晚两餐，每人各吃烤乳猪一只，是吗？”

“是。”

“即使吃得下去，即使消化得了，可是，餐餐如是，长年月久，难道他们一点也不觉得吃腻了么？”

“不，他们一点也不觉得，从未提出要更换这一道菜的要求。不信，请问专管烧烤的那个炊事员和专管送菜的那个勤务兵，便一清二楚了。”

“好！为着给他们换换口味，从明天起，这一道菜，可用两只烤乳鸽，去取代一双烤乳猪。”

“是！”

何国勋退了下去以后，可以肯定，从第二天起，事情一定是照着曾友仁的口头命令办理的。

其实，按照七战区厨房的老规矩，所谓乳猪，是名副其实的还未断奶的猪崽子，身长不满一尺，烤好之好，切成块件，刚好盛满一个大盘子。一顿吃完，是不足为怪的。可怪的是，两个俄国顾问餐餐如此，总吃不厌。

半个月之后。

在总办公厅批阅文件之际，曾友仁突然发出一声冷笑，举起一张电报纸，暗示要大家前去看看。他说：“咄咄怪事，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众人走前一看，原来是重庆军委会发来的批评电报，里边说：“接莫斯科来电，该战区对俄国顾问招待欠周。此后应多加优礼，毋得怠慢。切切！”

大家恍然大悟：啊，原来如此，两个俄国顾问为了吃乳猪，向莫斯科告了状。

从此，俄国顾问每人每餐一只烤乳猪，又恢复了旧制。

这个故事说明，俄国人的生理胃口，确是独占鳌头，举世无匹。别的胃口，或别的时期如何呢？……恕不多赘，就此打住。

〔作者简介〕陈方绥，平远人，现年82岁。早年在国立北京大学毕业，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抗战时，曾任第七战区秘书处副处长。农工民主党成员。现为广东省文史馆名誉馆员。

乳源瑶族婚俗

丘 五

乳源瑶族，分布于县境西北崇山峻岭之中，长期以来，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和民族传统关系，在婚姻方面，有其独特的习俗。

解放前，瑶族婚姻关系只限于本民族，很少与外族通婚，特别是不与汉族通婚。婚姻关系一般在村之间建立，同村的结婚很少。同村的结婚，必须是不共房的（即不同一祖先的），同姓只要不是五服之内的血系亲属，都可以结婚。过去，瑶族青年早婚现象是比较普遍。女子15~16岁，男子17~18岁，就可以结婚。婚前同宿自由，女方父母概不干涉，甚至以酒肉热情款待，族中人也视为正常现象。婚后，夫妻不能再和其他人有不正当的交往。如果发现丈夫和别的女子有出轨行为的，其妻可用剪刀剪去那女子的头发、衣领或剃光上衣，让那女子示众，还要按乡规加以处罚；若丈夫发现妻子和别的男子有不正当行为，其丈夫可以在晚上睡觉时用手捏烂妻子的嘴角，让其无脸见人。

无论过去和现在，瑶族男女青年，一般是通过劳动、节日等活动，互相认识，进行恋爱。瑶族男女青年互相帮工，就是男女青年恋爱的极好机会。拜王、渡身或嫁娶等喜庆之日，更是男女青年恋爱的好时机。

过去，瑶族男女青年，一般都是自由恋爱，自由结婚的，也有一些通过媒人介绍，由父母包办结婚的。

一，定婚

男女青年双方经过一定的了解之后，两厢情愿，彼此便交换情物。姑娘将自己精心刺绣的头帕通过知己的人转送给情人；男子接到头帕后也找良机回送给姑娘手帕或雕花刀鞘、秧梳等物品。当男子把情物送给姑娘时，都含情脉脉地说：“今晚我到你家去还头帕。”姑娘听后，只把男子瞟上一眼，低下头，默默不语。这样，男子已意会到姑娘答应了。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男子便把婚事告诉父母亲，取得父母同意后，便托亲属或由父子两亲自到女方家求婚。求婚时，带上1只公鸡、9斤酒（一般是带自己酿制的苦爽酒）、9斤猪肉、2板豆腐及2元聘金。去女家，一般是傍晚时分。一进门，女方家人便倒水让男方父子洗澡，然后，准备好饭菜请男方父子用餐（瑶胞用餐是先吃饭后饮酒的）。席间，双方父母商量孩子的婚事。如果女方父母同意，男方父子就要用带来的礼物做第二顿饭。这时，姑娘可以帮忙，但她的父母不能帮手。吃第二顿饭时，男方父亲便问姑娘父母要多少身价？并商定结婚日期及询问姑娘出嫁时送亲的人数。接着男方父亲把两元聘金送给女方父母。这门婚事就算定了。如果姑娘父母不同意这门婚事，则不做第二顿饭，女方家不得收下男方家送来的任何礼物。

定婚后，男方要请师爷占卜，选择迎娶吉日以及新娘入门良辰。之后，男方家叫亲戚将彩礼聘金送到女方家，同时告知迎娶的吉日，以后就等着办酒迎亲了。

二，结婚

解放前，瑶族的婚宴是很隆重的，花费很大。婚宴一般是一至两天，也有两至三天的。结婚那天，男方家要派一女子到女方家带新娘。新娘要在出嫁当天凌晨四点钟走出家门，到邻居或亲戚家去等候，不能回家吃饭，表示已不是娘家的人了。在亲戚家吃过饭后，新娘子走在送亲的队伍前面，带亲女子陪伴新娘出门上路。新娘有嫂嫂的，由嫂嫂给新娘打伞，也有新娘自己打伞的。路上，如果要过桥，引路者要在桥头上放两毫银元，作为买路钱。

新娘到了新郎家村口，不能径直进屋，要等到黄昏才能进屋。入门时，新娘要拜门三次。送亲的每人要吃一块熏肉，喝一杯拦门酒，方可进门。男方家要在门口杀一只雄鸡，并斩去鸡头，把无头鸡放在门槛内。如果无头鸡往屋里钻，就说明新娘婚后如意，否则就不如意。女方哥嫂首先进屋，与男方哥嫂进行一段象征性的对话：

“你来干什么？”男方哥问。

“有一位不太漂亮的姑娘，你家的男子谁对她合适？”
女方哥哥回答。

“这姑娘几岁？”男方哥哥问。

“十七岁。”女方哥哥回答。

“我家有一个男子刚十八，这姑娘正合她的意。”男方哥哥回答。

于是，新娘收伞进屋，男方哥哥便端上一碗酒，若干块猪肉和豆腐给送亲者吃，并客气地说：“大家远道而来，没有好酒好菜，先喝碗酒解解渴吧！”女方哥哥便回答说：“万

千，万千！”意即感谢男方的盛情款待。

新郎把新娘带到厅前，听念家先名单，新郎新娘向祖先叩三个响头。然后，送亲者开始吃饭。男方家人将女方父母、哥嫂请到上席，双方亲家对坐，新娘坐在父母身边，新娘在席上要吃一串猪肉。席间，男方哥嫂要唱《新娘歌》，如果男方哥嫂不会唱，可请人代唱。歌词内容，是歌唱新娘婚后如何行事，教新郎婚后要和顺勤劳。

歌词有：

男人生来要掌家，女人生来要出嫁。男人生来要出门，女人生来要在家。有田不可乱丢荒，早饭要点火。

之后，双方互相认亲，新郎新娘分别向双方的父母敬一杯酒。

新娘出嫁时常带有一只或两只嫁箱，箱内放有父母、亲戚送的钱，叫做“私己钱”。嫁箱在婚宴上由女方哥哥边唱边开箱，把箱内的东西一一拿出给众人看。男方父母、亲戚也要将事先准备好并用红纸封好的钱放到箱里，作为送给新娘的“私己钱”。

婚后，新娘一般不穿婚前的衣服，不戴婚前的头巾，所穿的是新衣服，戴的是新置的直角硬帽。戴上了“角”，表示已是媳妇人了。

三，回门

新娘出嫁后的第七天，就要同新郎双双返回娘家，居留三至五天，多则十五天。带不带礼物，则由新郎家经济条件决定。如果新郎家境贫穷，可待到生育第一胎孩子才回娘家。这时回家，不能住夜，也无须带酒，以后回娘家就什么时候

都可以了。只是在过年回娘家有时间上的规定。如果新娘是长女，须在年三十晚回娘家，新郎也一起同往娘家过年；是二儿的，则在年初二回娘家，不能误时。清明节那天，新郎新娘也会被邀请回娘家祭拜祖先。

四，招郎入赘

解放前，乳源瑶族，普遍有这种婚姻形式。因为家中生的是女子，没有男子，可招郎进门，以继承祖业。或者家中丧夫，需要重新建立起家庭，养活前夫所遗下的子女，也可招郎进门。招郎入赘，所生子女须随母姓。

招郎入赘，首先要取得族中亲房同意，要由村中长者写好进门帖，说明男子入赘后，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入赘男子以儿子的身份继承女家的产业。

五，半路亲（马头亲）

男子娶了寡妇或离了婚的妇女为妻，婚姻仪式从简，只要取得女方父母或亲房同意就可以成婚。一般贫穷的男子都娶马头亲。

六，担名

解放前，瑶家有这一习俗，家里生的如全是女子或独生女，为了传宗接代，要选留一女在家。长大后，不招郎也不出嫁。父母任其与喜爱的男子交往。怀孕后，到临产时，做父母的便在本村或别村找一个男子担名，同姓或不同姓都

可以。这个担名男子，就是那个即将出生孩子的名义父亲，不属于私生子。此种婚姻没有什么仪式，只由女方把担名者请到家中吃一顿饭并送给5块银元就算完事。女方所生的子女随母姓，由女方抚养，成为女家的后代。所生的孩子称担名者为叔父，表示一种亲属关系。

解放前，乳源瑶族一直保持着这种传统的婚姻习俗。1958年，瑶山民主改革后，由于瑶族同胞精神文明境界的提高，对一些旧的婚俗也逐渐破除了。然而，对一些具有民族传统特色的婚姻习俗，至今仍然盛行。



韶 州 的 鱼 塘

米行街（即飞机场旁边）鱼塘一口
 塘一口
 左营街孖鱼塘一口
 牛屎塘鱼塘一口
 灯笼街鱼塘一口
 正隆街鱼塘一口
 熏风路右边禾塘
 底鱼塘一口
 漂布塘鱼塘一口
 第一市场鱼塘一口

谭公庙鱼塘一口
 学生里鱼塘一口
 黄泥塘鱼塘一口
 中山公园右边鱼塘一口
 北直街鱼塘一口
 罗家塘鱼塘一口
 新码头左边鱼塘一口
 民生路尾鱼塘4口

（共19口）

粉乡掌故漫录

嘉禾叟

慧能初至韶州

慧能，俗姓卢，先世为河北范阳人，其父谪官至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唐贞观十二年（638年）生慧能。慧能幼年丧父，移家南海。家境贫困，靠卖柴养母。有一天，慧能在市中，闻客店有人诵《金刚经》，便问此经何处得来？客人告以从黄梅东冯茂山弘忍禅师受持此经，遂有寻师之志。

咸亨初（约670年），他把母亲安顿后，即北行。到了韶州曹溪，遇村人刘志略，引其出家之姑无尽藏尼，持《涅槃经》来问字，慧能说：“我虽不识字，但还了解其义。”尼说：“既不识字如何解义？”慧能说：“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尼闻其言，深为惊异，遂告乡里耆老，竟来礼敬。即请慧能居于当地宝林古寺，称他为卢行者。

又至乐昌西石窟，从智远禅师学禅，智远劝他到黄梅东禅寺去从弘忍受学。……弘忍使慧能在碓房舂米，一夜召慧能，传与衣钵南归。

——节录《中国佛教》二、第49页。

韶州南华寺铜钟款识

目前所见常用最繁的数码，是我国商业用的数字：

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
萬。

以上商业用的数码，在我国唐宋以后出现，到现在大约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了。广东省韶州南华寺有一口大钟，上面刻着以下的文字：

“大汉皇帝惟大宝七年岁次甲子，正月一日戊寅，特造洪钟一口，重铜壹仟贰佰陆拾斤，于长寿寺，永充供奉。”

所用数字，除“仟”字略有不同外，其余与上述商用数字，完全相同。

目前会计上票证及重要证件、文凭编号，仍常采用这种数码，因为它字体较繁，不易涂改，可防弊误。

——节录《世界之最·数学分册》

第6——7页。

注：“大宝”为南汉年号，大宝七年甲子，为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南汉王刘鋹于宋太祖开宝四年辛未（971年）始降宋。

宋韶州木造象刻字跋

宋、历庆丁亥（历庆七年1047年），韶州南华寺造五百罗汉木象，背有款识。木刻字皆阳文，此独阴文为异矣。辛酉（民国十年，1921年）醉司命日装成，呵冻记。

——王国维著《观堂别集》卷二、

第17页。

宋苏东坡题韶州月华寺梁

东坡书画：东坡曾题韶州月华寺梁。

有“余尝见之，墨色如新”之语。

——据宋、罗大经著《鹤林玉露》——

乙编卷三。

注：《鹤林玉露》成于宋淳佑十一年（1252年）。

苏东坡为王平甫改诗

岭下保县昌沙水村进士徐信言：“东坡北归时，过其书斋，煎茗题壁。”又书一帖云：“尝见王平甫自负其甘露寺诗：‘平地风烟飞白鸟，半山云木卷苍藤’。余应之曰：‘精神全在卷字，但恨飞字不称耳’。平甫沉吟久之，请余易，余遂易之以横字，平甫叹服。大抵作诗当日煅月炼，非欲夸奇门异，要当陶沐出合用字”。此建中靖国元年（辛巳、1101年）正月三日甲子，玉局老书。而赵德麟以为陈知默诗，东坡必不误矣。

——据宋、胡仔《茗溪渔隐丛话》引
自《遗珠》。

注：岭指大庾岭。保昌县今为南雄县。

王平甫名安国，为王安石之弟。

余襄公落花诗评

余襄公有落花诗云：“金谷已空新步障，马搜徒见旧香囊。”可亚二宋。

——据宋、胡仔《茗溪渔隐丛话》引《三山老人语录》。

注：二宋为宋郊（营公）、与宋祁（子京）兄弟，在安州，作落花诗，营公一联云：“汉皋珮冷临江失，金谷楼危到地香”。子京一联云：“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此二联极为时人所传唱，三山老人见余襄公（余靖，曲江人）诗，以为可以为二宋诗之次。

邹志完在韶州学佛轶事

陈莹中北归，过南昌言：邹志完在韶州，极精进，闭门诵《华严经》，舍利生袖间，此真入信。他日诵《华严经》于观音像前，有修竹三根，生像之后，志完揭茅出之，不可；

乃垂枝复像，如世所画宝陀岩竹，今犹无恙。韶人肩锁之，以为过客游观。北还至永州淡水岩，有驯狐，凡贵客至则鸣，志完将至而狐辄鸣，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以狐鸣为言，志完作诗曰：“我入出岩亦偶然，初无消息与人传，驯狐戏学仙伽客，一夜飞鸣报老禅。”

——宋，胡仔《茗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7，引自《冷斋夜话》。

注：陈莹中名瓘，号了翁，沙县（今属福建）人，元丰进士，崇宁中以党籍谪编台州。邹志完浩名，晋陵（今江苏常州）人，元丰五年进士，官至吏部侍郎，坐党籍摘永州，大观初复直龙图阁。《冷斋夜话》为宋诗僧惠洪撰。所述多讽托之官。

祖心禅师遗诗

《许彦周诗话》云：“海堂心禅师初退黄龙院，作诗云：‘不住唐朝寺，闲为宋地僧；生涯三字衲，故旧一枝藤。乞食随缘过，逢山任意登；相看莫相笑，不是岭南能。’此诗清静平实，道眼所了，非世间文士诗僧之所能仿佛也。”

——据宋，胡仔《茗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7

注：宋，高僧祖心，始兴人。傅海机之教于慧南，住黄龙寺，名其方丈曰：“海堂”，黄庭坚（山谷）尝师事之。元符间示寂，谥宝觉禅师。《宋高僧传》有传。

宋嘉定时李元砺起义克南雄州

宋（嘉定三年）下诏招谕“群盗”，时连年旱蝗饥馑，贫民多起反抗。李元砺称江湖两路大都统，进克南雄州，旋为叛徒罗世传缚送宋军，被害。罗亦于次年被部下所杀。

——沈起炜著《中国历史大事年表》

注：李元砺在何处起义？待考。

宋嘉定时韶州黄福起义

.....

从内容上说，（指中华本·何竹淇编《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一书）……就我手头掌握的材料，下述农民起义尚未收入：

（按：作者列举了二十四宗起义事件，其中一宗为韶州黄福）。（嘉定三年）

——据《学林漫录》五集200—206页，李裕民评《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

注：嘉定为宋宁宗年号，三年庚午（1211年）。黄福起义情况待考。

明万历时，始兴李圆朗起兵败死

己丑年（按：万历十七年，1598年）广东始兴县人李圆朗者，习先天演禽，自言能剪纸为人马，飞剑斩人头，有起死回生之术。团结翁源人王子龙，称黄巢后裔，祖遗金十二窖，欲与人均用，因而聚众，托云弥勒下生；至龙南县，亦有从之者，因肆焚掠，攻南雄不下，虔抚秦耀徽兵讨捕，擒斩于阵。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9。

注：《中国历史大事年表》：李圆朗作李圆明，称之为僧。

明代韶州府志，仁化县志，翁源县志

韶州府志十卷，嘉靖廿一年（壬寅，1542年），符锡、

秦志道等纂修。

此志为前北平图书馆所收（天一阁明地方志）三十五部之一，今存台湾省。

天一阁现存明代方志中，有一百六十四种在《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为仅见之本，可称海内孤本。其中如：孤本除刻本之外，还有一些明抄本。如弘治《仁化县志》，嘉靖中《翁源县志》。卷末题记云：“此志因纂修《广东通志》的需要而纂修，一样二本，一本附县立案，……可知当时尚未梓行。这些抄本，今天尤为珍贵。

——《文献》第三辑。骆北平《谈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

永乐大典据宋会要增入之韶州府曲江志考证

按今广东省韶关市，唐宋为韶州始兴郡，元为韶州路，明清为韶州府，府治曲江县，明以前似不应当称府，然中华（书局）影印本《永乐大典》存《韶州府曲江三志》三条。张国淦先生《中国古方志考》云：“共通济仓条：岁收本路租税，又广州路推拨粮。”知是元志。曰韶州府，或修《大典》时所加。”据此，则《大典》所收为元志，然《宋史·艺文志》有南宋苏思恭所修《曲江志》，究竟出自哪一种？尚不易肯定。但《大典》所收元志名称，与“辑稿”所注（见选举九六二四页）相同；又“辑稿”此段注文，位于“以国朝会典”之下，这说明不是原《会要》的文字。从这些特点来看，都像似明初修《大典》时附入的元志。

——《文献》第三辑。王云海《永乐大典本宋会要增入书籍考》。

纪念张九龄诞辰1310周年

编者按：我国唐代宰相、贤明政治家、著名文学家张九龄，今年是1310周年诞辰。为了研究他的政治思想、文学成就，个人品德以及他为“开元之始”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我市有关部门拟于适当时候举办张九龄学术研讨会。为便于读者搜集、整理、研究有关问题，现将《张九龄年谱简编》以及其他有关资料选载于后，以供参考。



这是始兴城郊三塘头村保存的清光绪年间重修的《张氏族谱》五修本中的张九龄木刻画像。



这是始兴隘子湖湾的张氏祖祠。祠前还存有断残的麻石旗杆匾额。



这是始兴隘子湖湾的张文献公祠。

(江军摄)



左图为民国8年（1919年）李根源重修位于韶关市北部罗源洞的张九龄墓。墓碑写着“唐故尚书右丞相始兴伯张文献公墓”。

下图为张九龄墓地前的张文献公祠。

（江军摄）



张九龄年谱简编

张九龄（公元678—740年），字子寿，又名博物。韶州曲江人。曾祖君政，唐韶州别驾；祖胃，越州剡县令；父宏愈，新州索卢县丞。

唐高宗仪凤三年戊寅（公元678年）

1岁。生于韶州曲江。

中宗嗣圣元年甲申（公元684年）

7岁。知属文。

武唐天授元年庚寅（公元690年）

13岁。上出广州刺史王方庆，方庆叹赏之，言其必当致远。

武后天授二年辛（公元691年）

14岁。父宏愈卒。

武后神功元年丁酉（公元697年）

20岁。

武后长安二年壬寅（公元702年）

25岁。乡试进士，为考功郎沈佺期所激赏，举高第。赴试途中作《浈阳峡》诗，是九龄现存诗之最早者。

武后长安三年癸卯（公元703年）

26岁。九月，张说流岭南，过韶州，见九龄文章，更深提拂，厚为礼敬，是为九龄与张说关系之始。

中宗神龙元年乙巳（公元705年）

28岁。家居读书。沈佺期流岭南，九龄作《读书岩中寄

沈郎中》诗寄赠。

中宗神龙二年丙午（公元706年）

29岁。秋，赴长安应吏部试。有《初发道中寄远》、《商洛山行怀古》诗。

中宗神龙三年丁未（公元707年）

30岁。中材堪经邦科登第，授秘书省校书郎。

中宗景龙二年戊辛（公元708年）

31岁。夏，奉使岭南，就便归省。明年秋还京。有《使还湘水》至《南阴道中作》等七首诗。

中宗景龙四年庚戌（公元710年）

33岁。九龄在京任校书郎，久不调，有归思之作《高斋闲望言怀》、《秋怀》诗。又任校书郎数年间，有《送窦校书见钱得云中辨江树》等八首应酬之作。

睿宗太极元年壬子（公元712年）

35岁。玄宗在东宫，举文学士。九龄以嗣鲁王道坚之荐，应试道侔伊吕科，策高第，授左拾遗。

玄宗先天二年癸丑（公元713年）

36岁。守左拾遗，上书宰相姚崇，劝其“远谄躁，进纯厚”。崇复书嘉纳其言。又九龄官左拾遗数年间，作诗所存较多，计开元元年（即先天二年）至三年，有《别乡人南返》至《和苏侍郎小园夕霁寄诸弟》等十六首。

玄宗开元四年丙辰（公元716年）

39岁。守左拾遗，因封章直言，与宰相姚崇不协，乃于是年秋以秩满为辞，去官归养。家居期间，尝献状请开大庾岭路，诏委开凿。十一月，九龄奉使兴作，“曾不浹时，行可方轨”。作《开凿大庾岭路序》纪其事。又，本年春有《登东游望春书怀》至《通化门外送别》等六诗；秋，南归

时作《将发还乡示诸弟》至《南还以诗代书赠京都旧僚》等五首；抵家后有《叙怀二首》至《酬王六寒朝见贻》等四首。

玄宗开元五年丁巳（公元717年）

40岁。家居，与曲江县尉王履震、韶州司马王某相过从。作《酬王履震游园林见贻》至《钱王司马入计同用洲字》等八诗。又，本年夏秋之间，尝与王履震游广州，有诗纪之。

玄宗开元六年戊午（公元718年）

41岁。春，被召入京，以修大庾岭路之功，拜左补阙。九龄渐以才鉴见推当时，吏部试拔萃与举者，常令九龄与右拾遗赵东曦考其等第，每称平允。本年还京途中作《初发道中赠王司马兼寄诸公》至《登襄阳恨岷山》等五首。返京前作《和王司马折梅寄京邑昆弟》诗。

玄宗开元七年己未（公元719年）

42岁。改礼部员外郎。本年存诗《故徐州刺史赠吏部侍郎苏公挽歌词三首》。

玄宗开元八年庚申（公元720年）

43岁。四月，迁司勋员外郎。本年有《奉和圣制瑞雪篇》至《城南隅山池……故有此咏》四诗。

玄宗开元九年辛酉（公元721年）

44岁。是年，张说入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与九龄通谱系，亲重之。常语人曰：“后来词人称首也。”本年有《酬通事舍人寓直见示……》、《和许给事直夜简诸公》二诗。

玄宗开元十年壬戌（公元722年）

45岁。二月，转中书舍人内供奉。五月，张说往巡朔

方，作《奉和圣制送尚书燕国公赴朔方》。

玄宗开元十一年癸亥（公元723年）

46岁。春，从玄宗巡狩北部。有《奉和圣制早登太行山率尔言志》至《奉和圣制早渡蒲津关》五诗。本年尚有《钱王尚书出边》至《南郊太尉酌献武舞……》等三诗。

玄宗开元十二年甲子（公元724年）

47岁。本年有《奉和圣制南郊礼毕酺宴》至《奉和圣制途次陕州作》等八诗。

玄宗开元十三年乙丑（公元725年）

48岁。十月，从驾东封泰山。尝谏张说数事，不为所纳，后张说得罪，果如所言。本年有《奉和圣制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至《奉和圣制登封礼毕洛城酺宴》等四诗。

玄宗开元十四年丙寅（公元726年）

49岁。四月，张说罢相。九龄亦改太常少卿。六月，奉命祭南岳及南海，就便归省。秋，北还，绕道天台山访司马承祯。还京后，复以尝亲附张说，出为冀州刺史。九龄以老母不欲从之任所，表请罢官。本年初有《和韦尚书答梓州兄南亭宴集》至《奉和圣制喜雨》三诗；奉使祭南岳往返途中作《奉使出蓝田玉山南行》至《经江宁览旧迹至玄武湖》等十二诗；年末有《送赵都护赴西安》诗。

玄宗开元十五年丁卯（公元727年）

50岁。三月，改任洪州，授都督洪州军事、守洪州刺史。途中作《当涂界寄裴宣州》至《自彭蠡湖初入江》等八诗；抵洪州后有《忝官二十年尽在内职……》至《秋晚登楼望南江入始兴郡路》等十二诗。

玄宗开元十六年戊辰（公元728年）

51岁。守洪州刺史。有《岁初巡属县登高安南楼言怀》

至《洪州西山祈雨……》三诗。

玄宗开元十七年己巳（公元729年）

52岁。守洪州刺史。有《在洪州答蔡母学士》至《郡舍南有园畦杂树……》等六诗。

玄宗开元十八年庚午（公元730年）

53岁。七月，转桂州刺史、兼岭南道按察使。便道归省，与弟九皋、九章及家人欢聚。本年有《戏题春意》至《西江夜行》等八诗。

玄宗开元十九年辛未（公元731年）

54岁。三月，擢秘书少监、兼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入京。本年按察岭表有《送广州周判官……》等三诗；入京途中有《湘中作》诗；返京后有《钱陈学士还江南同用征字》、《和吏部李侍郎……》二首。

玄宗开元二十年壬申（公元732年）

55岁。转工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八月，兼知制诰。九龄累乞归养，玄宗深慰勉之，迁其弟九皋、九章官近州里，以时给驿归省。十月，从驾巡幸北部，奉命撰赦文，对御而作，初无草稿。玄宗益重之，以为有王佐之才。俄迁中书侍郎。本年有《龙门旬宴得月字韵》至《和裴侍中承恩拜扫……》等四诗。

玄宗开元二十一年癸酉（公元733年）

56岁。母卒，奔丧归里。十二月，玄宗遣中使起复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口敕敦谕，不许为辞。

玄宗开元二十二年甲戌（公元734年）

57岁。一月，奉旨抵东都行在，上表恳求终丧，不准。五月，迁中书令、集贤院学士知院事、修国史。九龄为相，尚事无巨细皆力争之。其大者，谏废太子，谏相李林甫，

諫赦安祿山。直气鯁词，有死无贰；彰善惩恶，见义不回。本年有《奉和圣制送十道采访使及朝集使》诗。

玄宗开元二十四年丙子（公元736年）

59岁。守中书令。李林甫嫉其能，与武惠妃交相潜构。十一月，罢知政事，充尚书右丞相。本年有《奉和圣制谒元皇帝庙》至《奉和圣制送李尚书入蜀》等四诗。

玄宗开元二十五年丁丑（公元737年）

60岁。四月，以所举监察御史周子谅获罪，林甫间之，遂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五月，至荆州。本年在京有《咏燕》至《眉州康司马挽歌词》等七诗。贬荆州后有《登荆州城楼》至《听箏》等十二诗。

玄宗开元二十六年戊寅（公元738年）

61岁。守荆州长史。有《立春日晨起对积雪》至《赠沔阳韦明府》等六诗。

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己卯（公元739年）

62岁。守荆州长史。有《三月三登龙山》、《始兴南山下有林泉……》二诗。

玄宗开元二十八年庚辰（公元740年）

63岁。春，南归展墓。五月七日，病逝于韶州曲江之私第。玄宗震悼，赠荆州大都督，谥文献公。本年有《答王维》至《照镜见白发联句》等五诗。

玄宗开元二十九年辛巳（公元741年）

冬，葬于洪义里武临原。夫人谭氏，一子名拯，仕至朝散大夫、太子右赞善大夫。孙名藏器。

——转自广东人民出版社版，张九龄著、刘斯翰校注《曲江集》

张九龄《曲江集》选注

李世亮

开凿大庾岭路序

先天二载①，龙集癸丑②我皇帝御宇之明年也。理及内外，穷幽极远③，日月普烛④，舟车运行，无不求其所宁，易其所弊者也。

注：这是第一段，歌颂唐玄宗登位后对国内交通的留意、整顿。

①先天，唐玄宗登位后第一个年号，（712——713）。

②龙集。龙，星名，集、次。龙集癸丑，即岁次癸丑。

③穷、尽。穷幽极远，即至隐蔽至远的地方。

④烛，照也。

初岭东废路，人苦峻极⑤，行径夤缘，数里重林之表⑥；飞梁岷嶷，千丈层崖之半。⑦颠跻用惕，渐绝其元⑧，故以载则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⑨，而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瞻江淮之求，而越人绵力薄财，夫负妻戴，劳亦久矣，不虞一朝而见恤者也。不有圣改，其何以臻兹乎？

注：这是第二段，讲大庾岭路之艰难险阻，十分不利于国内外人之交通往来。

⑤废路，废弃之路。竣极，险竣之极。

⑥夤缘、攀附也，行经夤缘，行路要左攀右附。重(chong)重复，表，外。

⑦梁，山间岩石架成的桥梁。岵，音业，山高貌。嶭，音截，山高峻貌。

⑧颠，颠仆、跌倒。跻、跻攀、攀上。惕，警惕。元，元元，平民。

⑨以，用。曾(ceng)、乃。用车载则容不下一部车，一定要运就只有用背负了。

⑩殷，富、多。小曰蛤，大曰蜃，皆介物、蚌类。

开元四载，冬十有一月⑩，俾使臣左拾遗内供奉张九龄⑪饮冰载杯，执艺是度⑫，缘磴道，披灌丛，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险之故⑬。岁已农隙，人斯子来，役匪逾时，成者不日，则已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⑭，转输以之化劳，高深为之失险。于是手矐耳贯胸之类，珠琛绝贖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⑯。宁与夫越裳白雉之时，尉陀翠鸟之献，语重九译，数上千双，若斯而已哉⑰！

注：这是第三段，讲自己奉命开凿大庾岭路的经过及成功的喜悦。

⑩开元四载，即公元716年。开元，唐玄宗年号。

⑪俾、使。开元四年，张九龄对策《遗俾伊吕科》高第，授左拾遗。内供奉、供奉，在皇帝左右供职的人。内工，内廷。

⑫饮冰，喻忧心。《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饮。饮冰载怀，言满怀惶恐忧虑。执艺、工作，《书经·胤征》工执艺事以谏。度、(duó)，谋度。

⑬相(xiàng)，看也。宜、适宜。故，原故。

⑭岁已农隙，岁末农间。人斯子来，斯、尽也。子来，人们如子女急于父母之事；不召自来。役匪逾时，成者不日，做没有多少时候很快就完成了。

⑮坦坦，宽平的样子。方，并也。很宽平地可以并行五部车。闾闾、车声。车可以四通八达。

⑯罽、穿耳物。罽耳、以物穿耳者。贯胸，古代传统中的国名，《山海经，海外南经》贯胸国在其东，其为人胸有窍。》罽耳贯胸之类，泛指一些海外诸国之人。珠，珍珠，琛、珍宝。绝贶，美好的礼物。京、高岗。坻(di)山坡。如京如坻，《诗、小雅、甫田》曾孙之庾。如坻如京。指谷米堆积如山，形容其多。

⑰越裳、古南海名。相传周公辅成王时，越裳氏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见《后汉书南蛮传》。尉陀，即南粤王赵陀。汉文帝元年初，遣大中大夫陆贾赴粤，南粤王赵陀复信称



南雄梅岭古道和关口

臣，并献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等物。见《前汉书赵陀传》。语重(chóng)九译，言展转翻译之多；数上千双，言上献礼物之多。

凡趋徒役者聚而议曰：虑始者功百而变常，乐成者利十而易业，一隅何幸，二者尽就^⑮况启而未通，通而未有斯事之盛，皆我国家玄泽寢远，绝垠胥洎^⑯，古所不载，宁可默而无述也。盖刊石立纪，以贻来裔。是以追之琢之，树之不朽。

注：这是第四段。说明开路成功的高兴和写序的缘由。

^⑮《商君书·更法》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本文两句意思是：开始计划的人，功很大而可改变常规；见到成功的人，利很大而可修治自己的事业。隅，边侧之地。就、成就，得到。

^⑯启，开也。通，畅通。玄泽，天子之恩德、寢、渗透。垠、边际。胥，都。洎、浸润。两句意思是：天子的恩德渗透得很远，很远的地方都浸润到。

请诛禄山疏^①

伏以春生秋杀，苍天之大权；^②罚罪赏功，圣人之巨柄。^③倘时令不中，何由万物化成，^④苟彰率失宜，尤难三军立绩。^⑤是以用命而战，固宜嘉勋；^⑥失律而逃，更当惩戒。^⑦

注：这是第一段，说明执政处事，应当怎样实行奖励和惩戒的意思。

①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63年），范阳节度使张守圭使平卢讨击使安禄山讨奚，契丹叛者，禄山持勇轻进，为虜所败。夏四月，守圭奏请斩之，执送京师。

按：安禄山，唐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南）人。本姓康，母嫁突厥人安延偃，改姓安，更名禄山。通晓诸族语言，饶勇善战，张守圭收以为养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冬在范阳起兵叛乱，先后攻陷洛阳长安，称雄武皇帝，唐肃宗至德二载（公元757年），为其次子庆绪所杀，享年五十余岁。②伏以，谦卑词。古人认为天下万物为天所生，春时生长，秋时凋谢。是有一定规律的。③圣人，这里指天子，皇帝。巨柄，巨大的权柄。④中，适中。化成，化育生成。⑤彰，表彰。瘳，憎恨。三军，泛指军队。立绩，立功。⑥用命，执行命令。⑦失律，行军无纪律，行军失败。

今节度张守圭有部将安禄山，狼子野心，兽面逆毛，既非类而偷生，敢持勇以轻进，为贼败衄，挫我锐气，必正法乎军中，庶章威于闾外。⑧兹其执送京师，请行刑典，岂守圭之故尔缓刑，是威福之未敢擅便。列上其罪，留中不行，皆云杀此，将谓赦之。虽陛下之弘仁，恐奸徒之漏网。⑨故穰苴出军，必诛庄贾；⑩孙武教战，亦斩宫嫔。⑪守圭所奏非虚。禄山不宜免死。况形相已逆，肝胆多邪，稍纵不诛，终生大乱。

注：这是第二段，说明安禄山行军失律，论刑当斩，不宜免死的道理。

⑧张守圭，唐陕州河北（今山西平陆东北）人。曾镇守瓜州（今敦煌县），连败吐蕃兵。镇守幽州，屡次战胜契丹兵。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卒。衄，衄的异体字，读

nú,挫败也。闾、郭门,国门。闾外,国外。⑨留中不行,把送来的奏章,留在禁中,不批示,不交议。⑩春秋时,齐景公正受晋,燕两国侵扰,晏婴荐司马穰苴为帅御敌,齐景公许之。司马穰苴请齐景公派出他的宠臣庄贾来监军,并约定明日中午会于军门。到时庄贾迟到半日,司马穰苴以庄贾违反军令。斩之以徇三军,众皆惧。于是军威大振,晋燕均退走。见《史记·司马穰苴列传》。⑪春秋时,孙武以兵法晋见吴王阖庐,吴王约以妇人小试兵阵,孙子许之。届时孙子以吴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行兵时,妇人大笑,军容不整,孙子斩王二宠姬,众惧,于是军中绳黑,无敢出声者。吴王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于是西破楚,北威齐、晋,显名诸侯。见《史记孙武列传》。

夫阳者发生之道,阳者肃杀之义。必肃杀而后能发生者,势也,苟秋肃不行,适为姑息之惠。欲发生而必须肃杀者,时也,惟春恩欲遍,无存养奸之弊。⑫系非细故,臣切大忧,是以率直犯颜,望行天怒,深听守圭之奏,立斩禄山之叛。斯逆一惩,底宁万邦,天下幸甚,国家幸甚。⑬

注:这是第三段,再进一步从时、势方面和不要姑息养奸方面立论,要求立斩安禄山,以底宁万邦。

⑭古人以阴阳来解释万物化生的通理。本文从时势两方面讲,应肃杀的就要肃杀,决不能单从施恩一面讲,而致姑息养奸。⑮犯颜,冒犯天颜,得罪皇帝。天怒,皇帝之怒。底宁万邦,底达到。宁,安宁。

奏劾林甫

宰相系国安危,林甫非社稷之臣也,陛下若相林甫,异

日为社稷忧矣。

按：李林甫、唐宗室。据《资治通鉴》称，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窥其际，好以甘言谄人，而阴中伤之，不露声色。凡为上所厚者，始则亲结之，及势位稍逼，辄以计去之，虽老奸巨猾、无能逃于其术者。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李林甫终之排挤了张九龄，而自已于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登上了中书令位。

《资治通鉴》又称：玄宗晚年自持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帝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嫉贤能，排斥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王太子以下，畏之侧足，遂养成天下之大乱，死后不久，安史之乱作矣。

李林甫主张重用番族人为将，使安禄山等掌重兵，任用安禄山为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史之乱之起，李林甫实负重大责任。（李林甫死于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他死后三年，即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即起兵作乱。）

劾牛仙客疏①

尚书，古纳言也。②我朝家法，多用旧相，不然，选德

望者为之。③

注：这是第一段，说明尚书地位的重要。①牛仙客，甘肃泾州人，原为县小吏，以勤于职务，累迁至朔方节度使，追隋李林甫，李林甫引为自己人，屡欲重用他。开元二十四

年（公元736年），唐玄宗拟加牛为尚书，张九龄上本疏反对。李林甫向唐玄宗挑拨说：“苟有才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十一月，唐玄宗赐仙客爵陇西县公，食实封三百户。②尚书，在皇帝左右办事、掌管文书章奏，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官员。唐代中央首要机关，分为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三省，尚书省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纳言，官名，掌出纳王命。《书·舜典》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传》纳言，喉舌之言，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改为侍中。③家法，家长统法家族，训饬子弟的法规。德望者，德高望重的人。

仙客，何湟一使典耳，令班常伯，天下其谓何？④且汉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汉法，又太宗制也。边将积谷帛，缮器械，固常职耳，何当裂土乎。⑤

注：这是第二段，说明牛仙客不宜加为尚书。

①河湟，指黄河，湟水（源出青海）两流域地。旧指西戎地方。使典，旧时官府中办理文书的小吏。班，位次。常伯，周官名，秦汉时称侍中。侍从皇帝左右，出入宫廷，应对顾问，修缮整理。裂土，裂土分封，古时封某人为某官，即让其食邑若干户。何当裂土乎，即不须提拔他，让他得到裂土分封的享受。

臣荒陬孤生，陛下过听，以文学用臣，⑥仙客擢胥吏，目不知书，⑦昔韩信淮阴一壮夫，羞与绛灌为伍，陛下必用仙客，朝士所鄙，臣实耻之。⑧

注：这是第三段。说明牛仙客文化程度过低，不能与朝臣同列，恐为朝臣所鄙，实不能提拔。

⑥阨(zōu)，角落。荒阨，荒野的角落。孤生，孤陋寡闻的人。过听，过于听信。⑦胥吏，同使典解。擢，升。⑧汉王刘邦既定天下，以韩信有反意。降信为淮阴侯，信知汉王畏恶其能，称疾不朝从，由此日怨皇，居常鞅鞅，羞与绛灌列。见《史记韩信传》。

按：绛为绛侯周勃，灌为颍阴侯灌婴，二人均原为小买卖者，随汉高祖底定天下。

又按：牛仙客于开元二十四年得封陇西县尉，食邑三百户后，开元二十六年，升为侍中，兼河东节度副大使。开元二十七年，仙客为兵部尚书兼侍中。李林甫为中书令。仙客既为李林甫为所引用，对李林甫所作所为，事事唯诺而已。牛仙客卒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

唐尚书右丞相中书令张公碑

（韶关市北郊罗源洞山张九龄墓侧碑刻）

唐故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令、集贤院学士、知院事修国史、尚书右丞相、荆州大都督、上柱国、始兴县开国伯、文献张公《神道碑》。

广州刺史、会稽县开国公徐浩撰。

有唐既受命，在太宗时，有若梁公房、郑公魏、卫公李，格于皇天。在高宗时，有若梁公狄，格于上帝。在中宗时，有若平阳王敬、汉阳王张、扶阳王桓、南阳王袁、博陵王崔，光复宗社。在明皇时，有若梁公姚、广平公宋，燕公、始兴公二张，中兴王业。夫以天柱将倾，大盗方起，一振纲纪，再阐皇猷，始兴公为之。公讳九龄，字子寿，一名博物。其先范阳方城人。轩辕建国，弦弧受氏，良位为帝师，华才称王佐，或相韩五叶，或佐汉七貂，代有大贤，时称盛族。四代祖讳守礼，隋钟离郡涂山令。曾祖讳君政，皇朝韶州别驾，终于官舍。因为土著姓。大父讳子胄，越州剡县令。烈考讳宏愈，新州索卢县丞，赠太常卿、广州都督。皆蕴德葆光，力行未举。地积高而成岳，云久蓄而作霖，是生我公，蔚为人杰，弱不好弄，七岁能文。居太常府君忧，柴毁骨立，家庭甘棠，数株连理。王公方庆出牧广州，时年十三，上书路左。燕公过岭，一见文章，并深提拂，厚为礼教。弱冠，乡试进士，考功郎沈佺期，尤所激扬，一举高第。时有下等谤议，上闻中书令李公。当代词

宗，诏令重试，再拔其萃，擢秘书省校书郎。应道侔伊吕科对策第二等，迁左拾遗。封章直言，不协时宰，拂衣告归，太夫人在堂，承顺左右，孝养之至，闾里化焉。始兴北岭，峭险巉绝，大庾南谷，坦然平易，公乃献状，诏委开通。曾不浹时，行可方轨，特拜左补阙。寻除礼部司勋二员外郎，加朝散大夫超中书舍人，封曲江县男，转太常少卿，出为冀州刺史。以庭闱在远，表请罢官，改洪州都督，徙桂州都督，摄御史中丞，岭南按察兼选补使。黜免贪吏，引伸正人，任良登能，亮贤劳事，泽被膏雨，令行祥风，属燕公薨落，斯文将丧，擢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时属朋党，颇相排抵，穷栖岁馀，深不得意。渤海王武艺，违我王命，思绝其词，中书奏章，不惬上意，命公改作，援笔立成。上甚嘉焉。即拜尚书工部侍郎兼知制诰，扈从北巡，便祠后土，命公撰赦对御为文，凡十三纸，初无藁草。上曰：比以卿为儒学之士，不知有王佐之才，今日得卿，当以经术济朕。累乞归养，上深勉焉，迁公弟九皋、九章官，近州里，伏腊赐告，给驿归宁，迁中书侍郎。丁内忧，中使慰问，赐绢三百匹，奔丧南归，附葬先茔，毁无图生，嗑不容粒，白雀黄犬，号噪庭茔，素鸪紫芝，巢植庐陇，孝之至者，将有感乎！既卒哭，复遣中使起公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口敕敦谕，不许为辞，闻命号咷，使者逼迫，及至阙下，恳乞终丧。手诏有曰：不有至孝，谁能尽忠？墨绶之义不行，苍生之望安在？朕以非常用贤，曷云常礼哀诉，即宜断表。赐甲第一区，御马一匹。寻迁中书令、集贤学士、知院事修国史。初公作相也，奏差择元戎，皆取良吏，不许入奏，罢常奏诸军兵，省年支赐，谏臣谗议，事竟不行。明年，公奏籍田，躬耕礼节，加金紫光禄大夫，进封始兴伯。又明年

千秋节，公卿皆进衣服，公上千秋金鉴录五卷，述帝王兴衰，以为鉴戒。公直气鯁词，有死无二，彰善瘴恶，见义不回。范阳节度薛王，奏前太子索甲二千领，上极震怒，谓其不臣，顾问于公曰：子弄父兵，其罪当笞。况元良国本，岂可动摇。上因涕泣，逐寝其奏。武惠妃离间储君，将立其子，使中谒者私于公曰：若有废也，必将兴焉。公遂叱之曰：宫阙之言，何得辄出？御史大夫李公尚隐，太府卿裴公仙先，不礼中官，皆忤上旨，必在殊遣公全庇焉。幽州节度张守圭，缘降两番，斩屈突干将，拜侍中凉州节度，牛仙客以省军用，将拜尚书，并触鳞固争，竟不奉诏。平卢将安禄山，入朝奏事，见于庙堂，以为必乱中原，固请诛戮。上曰：卿无以王衍知石勒，此何足言。无何，用兵为虜所败。张守圭请按军令，留中不行。公进谏曰：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子行令，亦斩宫嫔。守圭所奏非虚，禄山不当免死。再三恳请，上竟不从。边将盖嘉运筹上策，密发将士，袭平西戎，公以为不可妄举。结后代仇，非皇王之化也。上又不纳。及羯胡乱常，犬戎逆命，玄宗追叹曰：公歿后，不复闻忠谏言。发中使至韶州吊祭。其先见之明如此者。学究精义，文参微旨，或有兴托，或有讽谏，后之作者所宗仰焉。上表论事多机密，入皆削稿，人莫得知。常以致君，尧舜，齐名伊周，行之在我，何必古人。由是去循资格，置采访使，收拔幽滞，引进直言，野无遗贤，朝无缺政，百揆时序，庶工允厘，同侪见嫉，内宠潜构，罢公为尚书右丞相。初不介意，居之坦然。执宪者素公所用，劾奏权臣，豸冠得罪，借以为累，贬荆州长史。公三岁为相，万邦底宁，而善善恶大分，背憎者众，虞机密发，投抒生疑，百犬吠声，众狙皆怒。每读韩非孤愤，涕泣沾襟。开元二十八年春，请拜扈

，南归五月七日，遘疾薨于韶州曲江之私第，享年六十三。皇上震悼，赠荆州大都督，有司，溢行文献公。越来岁孟冬，葬于洪义里武临原，近于先茔，礼也。夫人桂阳郡夫人谭氏，循州司马府君海之子也。淑慎宜家，齐庄刑国，珮环有节，纂组皆工；幼作女仪，长为内则。太夫人乐在南国，不欲北辕，克勤奉养，深得妇礼。至德二年十月六日，终于私第，春秋七十有七。同茔异穴，卜兆从宜。公仲弟九皋，宋襄广三州刺史、采访节度经略等使。殿中监季弟九章温吉曹等州刺使，鸿胪卿，腰金拖紫，三虎为荣，立德行政，二冯推美。嗣子拯，居丧以孝闻，立身以行著，陷在寇逆，不受伪官，及收复两京，特制拜朝，散大夫太子右赞善大夫。孙藏器，河南府寿安尉，永保先业，克稟义方。侄抗殿中侍御史，文吏雅才，清公贤操，以兄拯早世。侄藏器、幼孤，未建丰碑，乃刻乐石，用展犹子之慕，庶扬世父之美。浩遇深知己，建以文章，礼接同人，惠兼甥舅。薄技效德，无愧其词。铭曰：

凤生丹穴，鹏翮南溟，天垂粹气，地发精灵，杰生我公，扬于王庭，甫称降神，说表骑星，学究经术，文高宗匠，再掌司言，爰立作相，忠义柱石，谋猷帷帟，王纲允厘，帝采惟亮，退居右揆，出守南荆，元鹤缉翼，青蝇营营，不瞑犹亲，虽歿如生，昭昭令名，千古作程。

原碑长庆三年立，久亡。宋天圣八年重立，石见存韶州中学校，剥泐已甚。予既修公词墓，爰重为镌石立之。民国八年己未秋，腾冲李根源识，曲靖孙光庭书丹。

（尹良校点）

梅岭张九龄祠

庄礼味

唐相张九龄的品德、风度为后世所崇仰，并于梅岭顶岭南之处建祠以祀。据《直隶南雄州志》载：“元大德间参政铁柱建观音阁，明改为张曲江祠，自是为过客留题胜地。”

张九龄开凿了梅岭驿道，功绩显著。梅岭路，是历史上北方与岭南交通要道，岭南都会广州，水路可溯北江入浚江至南雄城，陆路九十华里通梅岭达大庾，又可溯章赣江北上与北方各地联系。所以称梅岭为“百粤咽喉”“天南锁钥”。

张九龄曾留下《开凿大庾岭路序》，对梅岭路开凿的意义和作用，有精辟的论述（详见本辑所载之原文）。可惜此路碑序毁于“文革”中。

为使后人不忘张九龄开凿梅岭路的功劳，唐苏铤还写有《开大庾岭路铭》：“山崖崖兮石崑崑，嵌巖崕兮相齟亏。槎岑吼兮莽芊芊，噫兹路兮不记年。大圣作兮万物睹，惠吾人兮道复古。役斯来兮走上京，通万商兮重九译。车屯轨兮马齐迹，招孔翠兮来齿革。伊使臣之光兮将永永而无致。”

明光禄寺卿、番禺县人郭棐，作有《梅岭曲江祠记》：“初则山形嶮峻，行路崎岖，雨肠多艰，商旅告困，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内供奉左拾遗张九龄开凿成路，行者自后无道难之叹，于是立祠岭上以祀曲江公，报德也，念功也。……曲江公既开岭路，而往来轮蹄行之，使络绎不绝。宋嘉祐癸卯（公元1063年）广东转运使蔡抗与详刑江西兄挺，

陶甃各砌其境（以分水岭处为界），署其表曰‘梅关’。明朝正统丙寅（公元1446年），南雄知府郑述砌路九十余里，补植松梅。成化己丑（公元1469年），广东巡抚陈濂行，南雄知府江璞修砌岭路，并把重修梅关楼改为‘岭南第一关’，北面关楼额为‘南粤雄关’。正德甲戌（公元1514年）广东布政使吴廷举增植松梅万五千余株。而一路苍翠蓊郁舆马辐辏，益有以演曲江之泽于无教云”。

明大学士邱浚，琼山人，也作《开凿大庾岭路碑阴记》于曲江祠内，为张九龄作传记。

明清两代的名人骚客，在瞻仰张九龄祠后留下了百首以上的诗篇。如广东布政使吴廷举除增植松梅外，还在张九龄祠内刻诗云：

岭海于公百世师，云封我得拜新祠。玉环恩爱生无策，金鉴谋猷始见奇。斧凿贤劳山径稳，往来尸祝礼丈宜。老松挺挺风霜道，想象明堂正色时。

明状元伦以训，南海人，授编修，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路过梅岭谒文献张公祠留诗：

峻岭擎云泻碧川，先生风度故依然。勋名史外孤踪远，文献江南万古先。金鉴未磨天护宝，炉峰不动日烘烟。堂堂庙宇江湖拜，欲写孤忠媚远天。

清乾隆年间给谏胡定保昌（南雄）人，秋月梅关谒张文献祠也留诗：

素节登临怅钜公，当年运会几曾通。石岩易拓千寻路，金鉴难开尺五衷。藻吐轻嫌留雅韵，梅横瘦影见孤忠。云间岭庙南州壮，长使英豪气似虹。

古代有诗文歌颂张九龄开凿梅岭路功劳的，还很多，在此不作一一抄录。

民间还流传着张九龄妾氏戚宜芬为开凿梅岭路而献身的故事：

话说，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左拾遗张九龄奉诏开凿梅岭官道，全程30华里，限期三年完成。旧道是层岩叠嶂，荆棘阻塞，工程很艰巨。初时，在红梅驿段，进展较顺利，及至梅岭顶上，岩石坚硬，阻塞去路，今天凿开一点，明天又合拢了。第一个七天过去了，工程毫无进展。第二个七天过去了，工程仍无进展。张九龄每天到工地去察看，鼓励民工加倍努力，也没有效果，一直干到七七四十九天，还是毫无进展。

第五十天的早晨，张九龄如常到工地去，他呆若木鸡地站在梅岭顶上，注视着前面的那块巉岩巨石。突然间，有一位鹤发童颜老翁走近前来问道：“相公，为何在此站立？是想破开这巨石的吗？告诉你，这是山神所管辖的，要有孕妇祭祀就好办，否则，任你再干十年，也是白费心机。”

张九龄回来后，愁眉双锁，郁郁不乐。侍妾戚宜芬夫人见状就问张九龄：“官人有何心事，实告妾身，可代你分忧。”九龄说：“妇道人家，那能与我分忧呢？”夫人答道：“请你别看轻女辈，你快说吧！男人做不到的事，女人或许也能办到的呢！”

于是，张九龄直言不讳地把在梅岭顶上遇老翁的事说了一遍，并打算找浈昌知县商量，想个解决办法。戚夫人听了，低头不语，默默沉思。

等到深更半夜，夫人披衣起床，冒着凛冽寒风，悄悄地跑到梅岭巉岩巨石旁，手提长剑，撩衣袒胸，口中叨念着：

“皇天在上，我乃广东张九龄侍妾戚氏，身怀六甲，因梅岭道巨石处开凿月余，毫无进展，若皇天明鉴，愿将妾命献祭

皇天。”遂举剑剖腹而死。

第二天早晨，张九龄听见报讯：路上有夫人尸血洒地，不禁痛哭流涕，几乎昏绝倒地。这时，又报朝廷将派钦差大臣来查勘工程。张九龄忍住悲痛，第三天草草把夫人的尸体安葬后，继续带领民工上山凿石。说也奇怪，这天凿一点开一点，凿多少开多少，再也不会合拢了。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把路开通了。

张九龄为了纪念戚夫人，在梅岭建了一座夫人庙，设有戚夫人的塑像。这故事虽属神话传说，但它反映了人们开凿梅岭古道的意志，所以历代都有不少妇女因崇敬戚夫人的献身精神，并寄予求子托福的愿望，前往夫人庙烧香祭祀，络绎不绝。十年动乱中该庙被毁。幸得夫人庙的大钟，被群众收藏起来，成为宝贵的历史文物。

张九龄祠与云封古寺相联接，约有二百多平方米。其原貌在“文化大革命”中全被毁灭。但古籍中略有记载，如清乾隆年间岭南人李光廷著的《北程纪实》载：有一大门楼颜曰：“岭南第一关”。有联云：“红白花开两样雪；往来人占半边山”。后来清光绪辛巳（公元1881年），福建人李化经过此地，曾在关楼南北涂题联曰：“梅止行人渴；关防暴客来”。原此地岭南与岭北常为绿林所困扰，北面对联解放初期仍可见，现已剥落。又有题额曰“百粤咽喉”和“天南锁钥”等石碑。河间（山东）人李梦韶，于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侠粤日记》载：“云封寺门联曰：‘山中藏古寺，门外尽劳人’。又曰：‘驿使暂停花下轿，寺门深掩岭头云’。……东边为文献公祠，龛中塑像以金，风度端然，又有楹联曰：‘挂角何时，偶为岭上主人，犹想像千秋风度；举头欲问，可许山中置我，试管领万树梅花。’”

张九龄祠有一门联云：

金鉴著千秋，经济文章江上清风留梓里；
丹梯通百尺，山川人物天涯芳讯领梅花。

阶上有碑书：“风度淮岩”，“开清元勋”，“相业流芳”等碑刻。壁上还有许多题壁诗碑。可惜如今已荡然无存了。原梅岭南有136块碑，现只收存三块。如今张九龄祠原址，已长满杂草芒棘了。

（作者原是南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为南雄政协调研员）

韶关风度楼

古 衡

风度楼原位于府治南（现风度北路市教工幼儿园与曲江老干宿舍一带），是为纪念唐朝丞相张九龄而建造的。北宋天禧年中（1018年——1020年），为韶州始兴郡守许申（广东潮阳人）倡建。根据史料所载，唐玄宗于张九龄逝世后，每用人必问：“风度得如九龄否？”因此，当时郡人将楼命名为风度楼。

随后，邑人又将该楼移至较为繁华、通达的府治前（现风采路与风度路之十字路口）。原来的风度楼是比较简陋和矮小的。明朝嘉靖十九年（1540年），韶州知府符锡（江西新余人）再将该楼重新加高加大，使之更加雄伟。

清朝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韶州知府唐宗尧（辽宁辽阳市人），看到这座经历了一百四十多年的风度楼，已经“榱角萧然，薨檐半塌”，蛀蚀斑驳，风雨不蔽，一派荒废崩败景象而不可攀登。当年夏，即命曲江教瑜何嘉元（广东三水人）尽快修复。在唐宗尧等郡、邑官吏的支持下，修复工程于农历九月动工，将腐烂的梁木更换掉，屋椽屋檐下榫处重新支起，修复脱落的墙壁，粉饰柱子和门窗。第二年（1684年）农历六月完工。修葺后的风度楼，基本恢复了原来雄伟的面貌。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农历七月，一场冲天大火，又将仅仅修复一年的木瓦结构的风度楼烧毁。韶州人士为之痛心，纷纷要求重建。

风度楼的重建工作，仍由韶州知府唐宗尧负责；吴璧（湖北武昌人）负责佐助和策划；曲江知县秦熙祚（山西闻喜人）负责筹办。担任理事的有：孝廉陈昆圃、吴元跃，明经蔡候绥、疗煜英，文学疗燕生、黄遥和陈陞。几经商量，为“严前日之戒”，决定以石筑台，而楼则建于台之上。并考虑到经费短缺，为防止中途停工，除责成失火者出银若干外，采取募捐的方法，由所辖各县令、郡邑各大小官吏和绅士大夫等捐银若干。不足部分，由唐宗尧个人补足。

决定后，即请泥工石工削石砌台。平台建成后，木工、瓦匠用事先准备制作好的材料在石砌平台上建楼。只用了十多天的时间，就把楼体建起来了。然后，曲江教瑜何嘉元，负责大楼的装饰布置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施工，新的风度楼在瓦砾堆中又建立起来了。

火后重建的风度楼，比之火前显得更加雄伟壮丽。石砌平台下有四门，与东南西北街道相连通，以利行人往来；楼高且大，四面开有窗门，游人可登楼远眺韶城风光；楼内雕梁画栋，色彩艳丽，金碧辉煌。各项设计，皆出人意表，比过去的风度楼，更胜一筹。何嘉元在楼成之后，曾写下七律一首：

巍巍直节著三唐，轮奂重开有烈光。
风度俨留天子眷，几筵犹续老成觞。
千秋事业江山辟，一代文章馆阁扬。
烛影照余黄舍月，恍披金鉴在罍堂。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韶州知府扬本仁（陕西郿县人）；嘉庆十二年（1807年），韶州知府扬楷；道光十一年（1831年），分巡南韶连兵备道扬殿邦（安徽泗县人）；同治二年（1863年），曲江知县徐德度（江西龙南人）；同治

九年（1870年），分巡南韶连兵备道林述训（安徽和县人）等，都先后对风度楼进行过不同程度的修葺。

民国十七年（1923年），韶州市政局成立之后，即着手抓城垣的拆卸、马路的开辟等市政建设，并拟将风度楼等一批古建筑拆毁。曲江张氏合族代表张绍基等，向上力陈风度为曲江城之名胜，应予保存，并交出张九龄画像一张。后经广东省政府飭令“妥为保存，以留纪念，毋得拆毁”，使风度楼得以保存下来。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五月初，考虑到经历六十多个春秋的风度楼已经成为危楼，驻扎粤北的独立第三师师长兼西北绥靖委员李汉魂、独立第二师师长张瑞贵，发起重修此楼，并积极参与筹备。五月中旬，曲江参议会议长赖小清、扬伯履、余冠唐、主任张甫华、常务张澜卿，以及名画家许筠台，一起研究重建的风度楼图案等有关事宜。李汉魂派出罗、张两委员到会指导，参与筹划。此次修楼“规模甚大”，经费颇感困难。经研究，一面将已筹得的款项上缴，以备奠基之用；一面继续派员南下筹款。张瑞贵也在潮汕成立“筹建曲江风度楼委员会”，并筹得款项一万多元。

有了一定的资金，便开始备料动工。在韶关市内闻韶路（现东堤中路），设立筹建风度楼办事处（张维新任主任），储存大量的建筑材料。鉴于当时该处较为偏僻，曲江县政府特发布告，飭令警团加强该处一带的巡逻，以防止建筑材料被盗。接着，风度危楼被拆下来，开始重建。由于抗战形势日紧和经费不足等原因，新楼只建了一层四面开有半圆形拱门的水泥平台后，整个工程就停了下来。

1965年春，国务院副总理、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到达韶关，在视察市政情况时提起风度楼，他表示将拨专款继续

重修。拟在原来水泥平台的基座上，加建五层塔式的具有民族风格的楼阁。随后，还专门派了省内有的建筑工程师进行勘察和设计。可惜，“文化大革命”开始，此项工程没能付诸实施。

“文革”期间，这个风度楼的水泥平台基座，曾改名为红星楼。到了1978年2月，因整顿市内交通，将这一基座全部拆除。目前，市有关部门，正对重建风度楼进行规划。

本刊第11辑勘误表

页	行	错	正
5	21	招	遭
6	16	既	即
110	倒10	忧	尤
157	1	1945年	1944年
203	(作者)	谢华恩	谢恩华
208	倒3	南宋时	南朝宋时

封面设计：黄安仁

封面题字：柳 倩



韶 关 文 史 资 料

第 十 二 辑

韶 关 市 粤 北 印 刷 厂 印 刷

广 东 省 非 营 利 出 版 物 准 印 证

88 粤 印 准 字 第 116 号

邮 政 编 码：512002

工 本 费 1.50 元